

目 录

1	杜勒斯谈“太平洋公约草案”	(1)
2	统购统销	(2)
3	处理接收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	(4)
4	和平解放西藏	(6)
5	整党运动	(12)
6	湖南零陵特务纵火案	(16)
7	张伯苓逝世	(19)
8	实施劳动保险制度	(22)
9	彭德怀战场遇险	(25)
10	第一次全国组织会议	(28)
11	批判电影《武训传》	(32)
12	英国劫掠“永灏”号油轮	(36)
13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慰问志愿军	(38)
14	宋庆龄获斯大林国际金奖	(40)
15	谁是最可爱的人	(42)
16	麦克阿瑟被解职	(44)
17	关于农业合作社的争论	(46)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公布	(50)
19	基督教团体会议	(52)
20	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	(54)
21	摩萨台与伊朗石油案	(56)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
9
5
1
年
的
故
事

22	戏曲改革	(60)
23	黑人麦基被电刑处死	(64)
24	中共中央决定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 执行死缓政策	(66)
25	埃及反英怒潮	(68)
26	南非火炬大游行	(70)
27	欧洲煤钢联营	(71)
28	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	(73)
29	爱国捐献运动	(76)
30	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	(78)
31	全国合作社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工作会议	(80)
32	第一次全国中等技术教育会议	(82)
33	美英哈里曼山顶阳台会谈	(85)
34	1951 年朝鲜战场三大战役	(87)
35	抗美援朝作战方针和指导原则	(92)
36	板门店谈判	(98)
37	取缔“圣母军”	(102)
38	爱国公约运动	(104)
39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	(105)
40	中国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	(107)
41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	(111)
42	中华全国学生第十五届代表大会	(113)
43	第一期治淮工程完工	(115)
44	“钢铁”运输线	(117)
45	美军飞机侵入中立区	(121)
46	塘沽新港一期工程完工	(122)
47	“一个车轮上的许多轮轴”	(125)

48	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	(128)
49	对日和会与对日和约	(130)
50	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	(133)
51	改造知识分子思想	(135)
52	“自由世界的共同安全”	(140)
53	中美洲国家组织	(143)
54	兴建官厅水库	(145)
55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出版	(146)
56	推广郝建秀工作法	(149)
57	增产节约运动	(152)
58	美“共同防御援助控制法”	(155)
59	丘吉尔再次组阁	(157)
60	郭沫若获斯大林国际金奖	(159)
61	统一币制	(161)
62	文艺工作者为何要改造思想	(164)
63	艾登——艾奇逊巴黎会谈	(169)
64	“阿登纳滚回去”	(172)
65	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	(174)
66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76)
67	劳模李顺达	(178)
68	“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180)
69	人民法院	(184)
70	丁玲获斯大林科学和文艺奖	(186)

1 杜勒斯谈“太平洋公约草案”

1951 年 1 月 3 日,美国助理国务卿顾问艾利森拟了一份“太平洋公约草案”分送国务院高级官员审阅,并作为他们讨论用的文本。该草案中提出由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菲律宾、日本组成公约成员国,缔约的目的是确保这些太平洋国家能够协调一致地进行集体的或个别的自卫,缔约国中的任何一国如果遭到武装进攻,所有缔约国就应按照各自国家的宪法程序采取行动,对付共同的威胁。此外,草案还提出,为了执行公约而随时进行磋商,需要建立太平洋理事会。

4 日,杜勒斯就这份“太平洋公约草案”发表意见,他提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务范围应该是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这样一条近海岛屿链。同时,为了排斥英国,杜勒斯认为公约的成员构成应严格限于在太平洋地区拥有主要岛屿的国家。杜勒斯还说,太平洋公约与对日和约有互相依存性,即只有在其他国家同意签订对日和约时,美国才能参加太平洋公约和承担义务。一周后,杜勒斯奉命把美国对太平洋地区集体防务的想法告诉英国驻美大使奥列弗·弗兰克斯。当时在场的英国大使馆参赞听了忙问“英国是否包括在这种防务的安排中?杜勒斯冷淡地回答说,在我们的思想里,还没有考虑过英国参加的问题。接着,他明确表示,如果英国加入,荷兰、葡萄牙和法国以及它们的属地也会要求参加,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2 统购统销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 1951 年 1 月 4 日,发布了《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规定自 1951 年 1 月起,实行棉纱统购。自此,统购统销政策开始逐步实行。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国家财政经济工作开始统一,经济建设出现了新的形势。为了保证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所需物资的供应,打击、限制奸商抢购和囤积居奇行为,中央人民政府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八条关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的规定,决定对主要农产品实行有计划的统一收购和统一供应的统购统销政策。首先实行的统购棉纱政策规定,凡公私纱厂自纺部分的棉纱及自织的棉布,均由国营花纱布公司统购。1953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并实行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严格管制并禁止私商自由经营粮食的政策。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1 月 19 日政务院第 194 次政务会议通过,并于 11 月 23 日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规定了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 10 条具体办法。

主要内容是:由国家粮食部门统一地、有计划地在农村

收购粮食,而后统一、有计划地向需要粮食的城乡输送供应;收购和供应的价格,由粮食部门按照各地情况作出合理的规定。1954年9月14日,政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这样,国家就对粮食、棉花、油料等重要农产品做到有计划的统一收购和供应。为贯彻执行统购统销政策,国家还相继颁布了一些有关具体政策。对影响国计民生的粮食、棉花、油料等重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取缔了市场投机,在当时对整个市场物价的稳定,对保证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对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都起了保障和促进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农村统购统销政策发生了相应变化。农民承包土地后,在完成相应的国家征购和集体提留的前提下,剩余的粮食等归自己,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在集贸市场上销售,还可以加工成食品出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统购统销政策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3 处理接收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

为了维护中国人民文化教育和宗教事业的自主权利，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于1951年1月16日至22日召开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作出了将接受外国津贴的私立高等学校逐步转向公立学校的处理决定。这项工作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的一部分，当时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有燕京大学、之江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协和大学等20所，其中接受美国津贴的有17所。这些学校大都是30年代或40年代在外国政府或教会的扶植下兴办的，长期靠外国经费办学，学校的管理权与教育权均在外国人手中。

根据1950年12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接收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决定”而召开了这次会议。会议研究实施政务院的决定，拟定了处理方针。会议决定，除了政治上坚决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者外，一般采取履行登记的方法，督促其改造，使其适合中国人民利益的方针。处理的原则以维持学校的现状为准，一般不迁校址不合并学校，也不调整现有的院系。但是，原有的外籍董事长一律解职，外国人不得担任行政职务，对于反动有据者予以辞退，其余的外籍人员可以留任，不愿留任的可以离开。中国的教职员工不分宗教信仰，一般可以原职留用。院校的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按原来的标准拨付。具体

处理方案是将学校分为三种类型进行处理：①立即接收改为公立院校；②暂时维持私立院校，待条件成熟时改为公立院校；③继续由私人办理院校，但是要改组现有的董事会及院校行政领导，使其成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

会议期间，美国在中国的基督教大学联合会托事部向各校负责人发电报，邀其到香港商议汇款问题，各校均加以拒绝，表示中国人有能力办好自己的教育事业。

处理后改为公办的有燕京大学、津沽大学、协和医院等 11 所，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予以补助的有之江大学、沪江大学等 9 所。其后，在 1952 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规模调整中，私立的大学全部改为公办。有些学校并入了其他学校，如燕京大学的院系分别并入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4 和平解放西藏

1949 年底,按省区来讲,中国大陆只有西藏尚未解放。为完成国家的领土和主权的统一,巩固边疆,保卫国家,使备受苦难的西藏人民,早日回到祖国各族人民的大家庭,只有进行艰巨复杂的斗争才得以实现。

中共中央对西藏局势发展一直十分关注。可是西藏当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分裂活动,妄想搞西藏“独立”。面对这些倒行逆施,中共中央早有两手准备。

中央人民政府 1950 年 1 月通过外交部发言人,正式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5 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藏语向西藏人民,特别是西藏上层人士不断阐明通过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同时号召藏族进步人士为和平解放西藏出力。中共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深得藏族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支持,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活佛格达·洛桑丹增自愿请求入藏劝和。青海省也派出“藏族代表团”,入藏规劝西藏当局参加谈判,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

要想和平解放西藏,既要准备谈,又要准备打,方能言和。1951 年 1 月 15 日,刘伯承、邓小平召见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以及其他师以上领导人时,刘伯承指出,鉴于西藏这个地方的特殊性,我们的军队,要处处体现王者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张国华军长在十八军研究进军西藏的军党委会上强调,我军进藏的主要任务,是做好上层人士的

统战工作,是向广大藏族同胞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在此指导思想非常明确的情况下,进藏部队广大官兵,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民族团结、平等,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宁愿受冻住帐篷,不住寺庙和藏族老百姓的家,宁可忍饥饿也不动群众一粒粮食,还主动为群众做好事,送医送药、春耕播种、打柴、挑水。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以实际行动赢得了藏族人民的信任,几百名藏族青年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多次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团到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西藏上层分裂主义者,在帝国主义、扩张势力的支持下,在昌都杀害了劝和使者格达活佛,赴西藏劝和的青海藏族代表团,也被软禁。中央人民政府通知西藏地方政府,要求他们的代表团在9月上旬到达北京,西藏当局一再拖延,并在从西南入藏的咽喉要道,西藏东部重镇昌都,调集了 $\frac{2}{3}$ 的藏军和一些地方兵团共8000余人驻守在这里,阻止解放军进藏。妄图以金沙江为界,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地方当局,做到了仁至义尽,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只好运用军事手段打击分裂主义者的嚣张气焰。

人民解放军1950年10月6日渡过金沙江,发起了昌都战役。广大官兵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舍生忘死的精神,冒着风雪严寒,爬雪山、越冰川,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如神兵天降,藏军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面前,完全没有还手之力。12日,藏军第九代本主官桑格旺堆率部起义,其余藏军,于18日撤离昌都。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从昌都西南竹谷寺派人与解放军联系,并下令撤离昌都的藏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在这场被称为“解放西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藏的淮海战役”中，共歼灭藏军主力 5700 余人，胜利地粉碎了西藏地方当局用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的企图，大大推动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进程。昌都战役的胜利，扩大了共产党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促进了西藏上层人士的迅速分化，爱国力量逐渐增长，分裂主义分子孤立，更加惶恐不安。1951 年 1 月摄政大礼被迫下台，达赖喇嘛提前亲政。他们密谋策划想逃往国外，一方面争取外国支持，一方面等待时局的变化。1950 年 12 月 19 日，达赖喇嘛及其他主要官员从拉萨到达亚东，并建立了亚东噶厦，在拉萨还组成了留守噶厦。此时藏族一些上层人士和群众爱国热情高涨，纷纷要求达赖喇嘛派代表进行和谈。和平解放西藏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达赖等人在亚东寻求外国支援，但美国、英国、印度等国表示，和平谈判是解决问题的上策。这些国家的态度使达赖及西藏地方政府其他官员深感意外、失望。在争取外援来实现西藏独立的愿望难以成为现实的情况下，达赖等人决定进行和平谈判。

达赖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全权首席代表的 5 人和平谈判代表团。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桑颇·丹增顿珠 3 人从昌都出发，土登旦达、凯墨·索朗旺堆 2 人从亚东出发经印度前往北京。从亚东出发的两位代表途经新德里时，曾请印度总理贾·尼赫鲁对“和谈给予指导”。尼赫鲁对和谈形势进行了分析，他估计了三种可能：一是西藏回到中国大家庭；二是西藏外交由中国统一管理；三是解放军进驻西藏。尼赫鲁认为，前两条必须接受，否则没法谈判；后一条不能接受，接受了会对西藏今后的许多问题造成困难。4 月 22 日和 26 日，西藏和谈代表分别到达北京。周恩来、朱德以及北京各界人民对西藏和谈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这

1951 年的故事

使他们深受感动。5月1日,在天安门上,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中央人民政府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进行谈判。谈判开始,李维汉提出要以1950年5月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西南局拟定,经中央批准的《关于以十项条件为和平谈判及进军基础给西藏工委的指示》为基础进行谈判。这10项条件的主要内容为:驱逐英美侵略势力,西藏人民回到中国大家庭;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实行宗教自由;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西藏现有军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发展西藏民族语言文字及学校教育;发展西藏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的生活;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事业,完全按照西藏人民的愿望,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协商解决;对于过去亲英美和国民党的官员,只要脱离关系,不进行破坏、反抗,一律继续任职,既往不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

从亚东经印度来的西藏和谈代表与从昌都来的西藏和谈代表之间,不但对10项条件的认识有很大差距,而且彼此在思想上也存在很大分歧。从昌都来的和谈代表,对10项条件进行过仔细研究,认为10项条件很全面,符合西藏的实际,以此为基础,稍加修改就可以了。而从亚东途经印度的和谈代表带着西藏地方政府关于进行和谈的五项条件和内部掌握要点,还带有盖章的公开条件。其主要内容是:表面上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实质上要独立;坚持不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如果一定要派,就把藏军改作解放军的名义派出;中央人民政府派出驻藏代表,其随员只能带15人,不准带警卫等。这些内容与10项条件完全背道而驰,违背了祖国统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
9
5
1
年
的
故
事

一的原则,严重地影响了谈判。为打开僵局,阿沛·阿旺晋美在李维汉的帮助下,首先在代表团内部统一思想。他和从昌都来的代表,以其亲身感受、经历摆出大量生动具体的事实,使亚东来的代表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疑虑逐渐取消,对10项条件有了新的认识,整个代表团的看法趋于一致。有了增强汉藏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这个共同的基础,双方代表在谈判中经过充分协商,前9项内容谈判非常顺利。当讨论到解放军驻藏巩固国防一条时,西藏地方和谈代表团表示不能接受。中央代表团严正指出:西藏交通不便,一旦有事,很难将军队及时开进去,藏军战斗力不强,很难胜任保卫国防的任务。中央还确定,进藏部队由中央供给,不让地方负担。西藏代表团终于被说服。

双方代表团争论最大的问题,是要不要把班禅问题写入协议条款,几近使谈判破裂。在历史上,达赖喇嘛主持的噶厦和班禅主持的扎什伦布寺之间,关系十分融洽。找达赖灵童时,由班禅负责,找班禅灵童时达赖负责,已形成规矩。由于种种原因,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产生对立,积怨很深,彼此间的关系始终没有缓和。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此次谈判既要解决汉藏民族的团结问题,藏族内部的团结问题理所当然也要解决,而且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写进协议。西藏代表坚决反对,双方各持己见,使谈判僵持了好几天。后来中央和谈代表孙志远建议,把恢复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好时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写入协议。这是历史事实,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表示同意。

最后经过六轮协商谈判,双方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共17条,主要内容有 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

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开进西藏；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现有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西藏逐步实行民族自治；充分保证西藏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实现西藏民族内部团结；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及工作人员的经费由中央供给等。5月23日，双方全权代表在北京勤政殿举行了签字仪式。24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设宴款待西藏代表团。

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字的消息传入西藏，一些分裂主义分子企图以达赖出国来破坏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央任命张经武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藏全权代表。他专程到达西藏亚东，向达赖宣讲协议精神和党的民族政策，帮助他解除顾虑。达赖表示完全拥护协议，积极帮助人民解放军进藏。并于1951年8月17日返回拉萨。

人民解放军西南、西北军区的部队，严格遵守毛泽东发布的进军西藏的训令，经过艰难的跋涉抵达拉萨。10月26日举行了入城仪式。

1951年5月30日，班禅为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致电达赖。同年12月，达赖致电班禅，欢迎班禅回藏。1952年4月28日，班禅一行到达拉萨，在布达拉宫与达赖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见。这表明西藏民族内部团结局面已打开。西藏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5 整党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党的地位发生变化以及和平与建设时期的开始，在巩固和建设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中，中共中央注意到党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执政党的建设已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中共中央曾领导全党于1950年下半年开展了整风运动，以解决思想作风问题，端正党风。但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全党的580万党员中，有一半以上的党员没有经过系统的党纲和党章的学习，缺乏充分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有少数老党员发生了堕落性质的变化，由于党的发展工作上的疏忽，有许多觉悟不高甚至思想落后的人也被接收为党员。甚至有一些坏分子钻进党内。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不纯洁，削弱了党的战斗力。鉴于这种情况，1951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作出了在全党进行整党工作的决议。

中共中央于2月18日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通报全党。3月28日至4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研究和部署全党的整党工作。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所作的报告对整党的必要性以及整党的目的、内容、方针、政策和步骤作了详细的说明。会议最后做出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制定

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并对全党的整党工作作了规划与安排。刘少奇作的报告和会议的若干文件经中共中央批准和毛泽东同意后下达，整党运动在全党开展起来。

这次运动是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其目的是经过党的基层组织对党员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清除坏分子，并对不合格的党员做出组织处理。同时，对所有党员进行一次认真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以便继续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教育改造不完全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党员，在经过教育和组织上的整顿后提高党的质量和战斗力。遵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各地整党运动的实际进程分为两个阶段，即准备阶段和组织整顿阶段。准备阶段的整党工作主要是：①普遍对党员进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每一个党员都切实了解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并用以对照和检查自己。②训练整党干部。自1951年冬到1952年秋，按照经过考验、对党忠实、作风正派以及有整党建党知识和能力的条件，选调了10万名整党干部进行为期两三个月的训练，然后派遣他们到基层党组织去进行整党工作。此外，中共中央还派遣了4万名专职建党组织员也参加了这次工作。③进行典型试验。县市以上的党委都进行了整党的试点工作。

自1952年冬天起，整党运动大规模地在全党展开。此时，凡完成整党准备工作的党组织，先后进入组织整顿阶段。这一阶段一般要经过以下步骤：(1)进行党员登记。要求每个党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照自己是否具备党员的条件，考虑自己能否按党员的标准继续做一个共产党员。凡愿意继续做党员者，主动进行登记，过期不登记的，即认为是自愿退党。(2)对党员进行审查和鉴定。所有党员过去的历史和政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治经历须审查清楚,并按党员标准对党员的优缺点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3) 进行组织处理。把党员分为四类,即具备党员条件的;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或有较严重的毛病的;不具备党员条件的消极落后分子;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及蜕化变质分子。属第二类者,保留其党籍,等待一个时期(半年至一年)教育提高。对消极落后分子,教育改造无效者,令其退党。第四类人则一律清除出党。到1954年9月,全国原25万个党支部已有22万个整顿完毕,全国大规模的整党运动基本结束。

这次整党运动的重要特点是把整党同各项政治运动及工作任务结合起来,机关结合“三反”运动;厂矿、企业则把“三反”、“五反”运动与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同整党相结合;学校结合思想改造运动;农村结合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整党。各地在开展整党运动的同时,还进行了建党工作,大量吸收新的优秀分子入党,组建新的党支部。这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规模的整党运动,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由于有中共中央和各地党委坚强的领导,历时三年多的整党运动顺利健康地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经过整党运动,广大党员受到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和党的知识的教育,使他们提高了觉悟,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同时,党的组织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整党的过程中,全国有65万个党员离开了党组织。到1953年6月,全国新接收了107万名新党员。从1951年到1953年,党员总数由580多万人增加到626万余人,党的支部由25万个增加到31.4万多个。这样,大大提高了党员的质量和战斗力,使党能更好地发挥执政党在国家建设中的领导作用。这次整党运动还为社会主义时期执政党的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但是

整党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农村整党中反富农思想、反资本主义思想所出现的“左”的倾向及其消极影响。

6 湖南零陵特务纵火案

零陵县地处湖南，县城设在芝城镇，即今永州市。1951年2月20日，刚刚脱离战火摧残的古城又遭劫难。一场罕见的大火突然从“天”而降。

当天上午，零陵军民正在县城集会声援抗美援朝和欢庆元宵佳节。11时许，突然响起一阵阵凄厉的火灾报警声，给群情激昂的人们泼来一场冷雨。顿时，城内一片混乱，呼儿唤女，鸡飞狗跳转瞬间，弥天大火冲上天空。由于北风很大，火势迅速蔓延开来，一栋栋房屋在咣咣作响的烈火声中倒塌。

零陵专署专员于明涛接到起火报告，迅速赶赴现场。只见街道两旁的大火如两条火龙飞快地向地委、专署、县府奔来。在党政机关旁边还有一个装满粮食的仓库也面临着被大火吞噬的危险。当时地委书记不在家，地委决定救灾工作由于明涛总指挥。于明涛立即下令：一方面组织干部群众扑火，另一方面调动军队，实行全城戒严。据统计，这次大火共烧毁街道大约600多米，房屋500多栋、伤亡19人，全城近十分之一的人无家可归，财产直接损失达当时币值159亿元！

省委省政府立即组织了慰问团，随带10万公斤大米于24日抵达零陵，慰问救济灾民。同时决定由银行贷出巨款帮助灾民尽快恢复生产，进行自救。

政府一方面积极救灾，一方面紧急调查火因。

零陵军分区中午接到命令,立即调集一个营,配合驻城公安干警全面行动。几个城内巡逻战士在省立医院后院的干草堆里发现了大把火柴,他们立即跟踪追寻。又在医院围墙上发现一个人正翻越围墙逃跑。一个战士“砰!砰!”两枪,那人被吓得滚了下来。战士们冲过去,在他身上搜出了火柴盒。又一位执勤战士在兴隆巷的拐弯处,发现一个人正蹲在一堆干柴前,他走上去拍了一下那人的肩膀,一根燃烧着的火柴掉到了地上。

侦破小组根据综合起来的各种情况,认为这是一起有组织、蓄谋已久的故意纵火案。于是,顺藤摸瓜,立即审讯了吉小州小学校长黄建中和点火时被抓的艾某。他们招供出了河西纵火小组的一些成员。当晚,又审讯了在押嫌疑犯唐某,唐某又供出了同案的三人。这三人都住在城西杨梓塘。第二天拂晓,公安人员迅速赶赴杨梓塘。在路上恰好碰到要抓的三人中的王某,侦察人员首先借故请其带路去找另外两人,结果来了个顺手牵羊。三人同时被捉拿归案。在20日晚上,根据艾、黄二人的招供,连夜抓了15名案犯。20日下午,侦破小组召集有关人员开了个“诸葛亮”会,确定了“发动群众和以敌制敌相结合”的破案方针。并在第二天大力发动群众提供线索,检举揭发。根据对整个案情的分析和案犯的招供来看,在押的仅仅是该案中的少部分人,大多数主犯仍逍遥法外。如只对在押犯进行审讯,可能短时间内难有突破性进展。

在侦破过程中,侦破小组得到一条重要线索,有一个叫做张景星的人很有可能是该案的首犯。但是在押的案犯都不承认自己与张有什么关系。这就使得案件的侦破出现了短暂的困境。2月22日,侦破小组又得到一条线索,在押犯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王养吾与张关系密切。于是,重点审讯王养吾。当天晚上,王终于交待了张景星的许多罪恶活动。张景星很快落网。

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纵火案的全过程终于真相大白。在公安人员的努力下,结合群众的检举揭发,公安机关先后逮捕的96人。大都是原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和历史不清的人。在人证物证面前,大多数案犯对其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同时,有的还供出了他们的特务组织关系。司法机关认定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特务纵火案。其组织是“湘桂粤黔边区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零陵支队”,总部设在香港。

司法机关根据政策和法令对96名在押犯进行了甄别处理和定案。41名受蒙蔽的人经教育释放,33名协从作案人员被依法处理,22名罪大恶极的首犯主犯被处以极刑。至此,制造零陵大火案的特务组织被彻底摧毁。

7 张伯苓逝世

1951 年 2 月 22 日,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因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 84 岁。

张伯苓,名寿春。1892 年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几年以后他以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入北海水师当士官生。1898 年 2 月,英国提出租借威海卫,清政府很快就答应了。但威海卫当时被日本占领。英国施压,日本同意从威海卫撤兵。于是清政府派“通济”轮前往威海卫,办理移交手续。张伯苓随船前往。船到威海卫后,先降下日本国旗,升起中国国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国旗,升起英国国旗。张伯苓亲眼目睹这一屈辱性的接收和转让仪式,他深深感觉到:国家贫弱,必然遭受外侮,而要使中国自强,他提出了“教育救国”的理想,之后回到天津,开始从事教育事业。他先后在严修和王奎章的家学馆讲授英文及数理化各科,兼授体育等科。1904 年随严修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仿照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将严、王二家家学馆的学生、教员合并,扩大为私立中学堂,年底改名为敬业学堂,不久易名为私立第一中学。后到南开地区修建新校舍,1907 年将新校改称为南开中学堂。南开中学的巩固和发展,使张伯苓很受鼓舞,他决定进一步创办大学教育。他重视自然科学、体育、课外活动,对学生管教极严。1915 年增设英语专门科,第二年又增设高等师范科。1917 年张伯苓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并考察其私立大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
9
5
1
年
的
故
事

学的组织和发展。次年冬回国,着手募集资金筹办南开大学。1919 年正式开学,招生百余名,分设文、理、商三科。1927 年赴东北三省调查,回校后组织“东北研究会”,编辑东北地理,作为南开教材。到 1928 年,南开学校(包括小、中、大、研究所)已经规模齐备,共有学生三千多人。同年他在重庆设南渝中学,1938 年改为重庆南开中学。

张伯苓认为,中国要想在世界上生存,必先办好教育。他抱着“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的目的,创办了南开学校。为了实现此目的,他实行了“一是重视体育,二是注重学习科学知识,三是成立团体组织,四是进行道德训练,五是培养救国力量”的教育方针。他还十分强调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爱国救国思想的教育,他视“德育为万事之本”。他认为最大的公德就是爱国,用各种形式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他把人格的培养归纳为五个方面:立志、敦品、勤勉、虚心、诚意。他十分重视校风校纪的建设。为此,在南开中学专设大镜一面,上刻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他主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四者并进。提倡研究学术和生动活泼地学习,鼓励学生发挥特长。为此,他实行了教师聘任制、学生淘汰制,以提高教学质量。他还主张办教育要面向社会,让学生接触实际,了解社会。南开学校组织了多种多样学术团体,如东北研究会、天津研究会、科学研究会、政治经济研究会等。这些团体经常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充实学生的书本知识,扩大学生的视野。学校不断举办各种比赛,如演讲比赛,国文比赛等,并组织学生建立乐队、剧团,演出音乐、戏剧节目。学校还鼓励学生出版刊物和成立社团组织。他强调对学生

1951 年的故事

组织能力、决策能力、创造能力的培养。设立了多种奖学金，奖励在学习上有创见的优秀学生。他重视学校管理，知人善任，大胆起用青年。他制定了“校务公开，责任分提，师生合作”的办学方针，发动广大师生参加学校管理。辛亥革命后，他就明确提出：“教育宗旨不可仿造，当本其国情而定”，“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他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对新中国教育起重要的作用。

1938年后，张伯苓曾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北京清华大学教务长、齐鲁大学董事长、西南联大常务委员等职。1944年国民党政府褒奖他“为国造士”，颁发一等勋章。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并获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48年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解放前夕，他拒绝蒋介石多次“催请”，不去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向周恩来致电祝贺。1950年回到天津。1951年2月22日病逝。临终前叮嘱学生“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

8 实施劳动保险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为了保护广大工人、职员的健康,建立了以保险形式给予物质帮助的劳动保险制度。1951年2月23日,政务院第七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同年2月26日正式颁布施行。劳动保险条例关系千家万户,条例颁布之前,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与中华全国总工会组成了起草委员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人民政府应照各地各业情况规定最低工资。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保护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实行工矿检查制度,以改进工矿的安全和卫生设备。”同时考虑到全国各地职工的要求与意见和目前工厂企业的实际情况,拟定了该条例的初步草案。然后召集有关机关及工会组织进行反复研究,修改20余次,形成草案,提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查,1950年10月27日,政务院第56次政务会议初步讨论通过。后经过全国各地的热烈讨论,政务院据此对草案进行了修改补充。1951年2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3年1月2日再次公布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并宣布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共分7章34款。根据

该条例规定,在工业、交通运输、邮电、建筑等企业的工人、职工享有集体劳动保险的权利。凡因疾病、工伤、残废、年老、死亡和生育等事项,均按照一定条件和标准,享受补助工资、医药费、补助金、退休金、抚恤金的待遇以及疗养、休养和其他集体福利。工人、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患病或死亡时,也享有一定的劳动保险待遇。保险费用按工资总额的百分比由各企业单位行政拨付。条例公布后,首先在工业、交通运输、邮电、建筑等企业建立了项目齐全的劳动保险制度,当职工本人在疾病、伤残、死亡、生育以及年老不宜继续劳动的时候,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物质帮助。随后,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中也陆续建立各种单项的保险制度。后来保险条例的实施范围又扩大到所有国营企业,大部分集体所有制企业也基本参照执行。到1984年,中国90%以上的职工,在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年老退休的时候,都获得了可靠的物质帮助,免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些保险待遇所需要的费用,按照规定都由国家和企业负担,职工不缴纳款项。与此同时,政府、企业还为职工兴办了大量免费或少量收费的集体福利设施。建立了生活困难补助、职工宿舍冬季取暖补贴;上下班交通费补贴、职工探亲路费补助等制度。这些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因而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有力地促进生产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与此相关联,政务院于1952年发出《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表明,1954年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即达400万人,1955年和1956年又分别比上年增长5%和11%。1957年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人数达657.2万人,1958年达687.7万人。1956年,国务院通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
9
5
1
年
的
故
事

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这些条例、指示和办法,使劳动保险制度渐趋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劳保制度在党和政府重视下不断完善和发展。1952年,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事业单位的保险福利费用开支的9.5亿元,相当工资总额的14%,平均每位职工享受的保险福利费为63元。到1983年这方面的费用增加到179.6亿元,相当于工资总额的24%,平均每一职工为208元。到1988年底,全国离休、退休、退职职工已达2087万人,与在职职工之比为1:10.15,负担重的地区如上海,有3.4个在职职工负担一个退休职工。1988年一年支付的离休、退休、退职金为213.4亿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9.2%,而且此后仍然是增长的趋势。因此,要继续加强职工劳动保险工作,就需要改革劳动保险制度,加快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使之向社会化方面迈进。通过试点,向全省统筹过渡,最后实现全国统筹,建立社会化的劳动保险体系。

9 彭德怀战场遇险

1950年10月19日,党中央决定志愿军从安东——辑安线渡鸭绿江,进入朝北作战。彭老总双手抱拳,对送行的军政领导说:“同志们,再见!”然后,他的吉普车冲上了鸭绿江大桥。他带着一个秘书两个警卫员身先士卒首批入朝,进入朝北战场。那时,美军及其同盟军已疯狂地长驱直入到达朝北山区一带。彭老总在新兴州与朝鲜外长朴宪永会面后,在敌情不明的朝北山区奔波了两天两夜,到达北镇西北的小山沟大洞,与金日成会面。这时,大洞已成为敌后,敌人的大炮声清晰可闻。敌人一部分已经进到大洞东北的桧木洞了。中路敌人由熙川到了楚山。西路敌人由龟城到了大馆洞、新安州。两位统帅处境十分危险。

美军根据电台信号密集程度能很快判断出志愿军司令部的位置。志愿军司令部曾经多次遭到美机的轰炸。

毛主席、周总理多次来电要求他把指挥所应建在可靠的防空洞,但是彭总就是不躲飞机。其他领导同志让他到防空洞,他质问:“来朝鲜是来躲飞机的吗?”问得大家无言以对。1950年11月24日清晨,天刚刚亮,志愿军党委根据昨天敌机活动情况,决定机关干部全部上山,只有彭老总不上。洪学智叫他,他说:“哪个要你多管闲事!”洪不说三四,且拉且拽,又有别人帮忙,总算把他挟持上山。刚刚上山,只见敌机直飞志愿军司令部,对准彭总房子和作战室扔下凝固汽油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
9
5
1
年
的
故
事

弹。他站在洞外，亲眼看到美机把他的房子夷为平地。

在朝鲜战场上，彭老总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全，有时候，哪里危险，他偏到哪里去。二次战役三十八军打了一个漂亮仗。他考虑我军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条件下，大胆迂回，包抄分割，靠的就是勇敢不怕死的精神！未出国前，讲这些作战原则，还比较抽象。现在好了。有了成功的战例。准备在三十八军开现场会，总结经验，鼓舞全军士气。当时，志愿军司令部到三十八军驻地还有200多公里呢！沿途天上有敌机轰炸，地下有流动之敌和敌人埋下的地雷，路途很危险。彭总说：“邓华和洪学智在家，我到三十八军去。”邓、洪听了，这怎么行？很不安全呀？彭老总问：“我不安全，你们去就安全了？”洪学智说：“老总与我们不同呀！关系重大呀！老总是统帅，不能去冒这个险。我代表你去吧。”彭总说：“我用你代表！”邓、洪坚持彭老总不能去，要去的话，得请示中央。这样，彭老总才算改变了主意。

四次战役后，志愿军司令部从金化转移到了上甘岭西北百余公里的空司洞。管理处同志在彭老总住房的门口，给他挖了一个小防空洞，直对着他的房子。一旦敌机来轰炸，彭老总可以很快地进入那个洞子。洪学智发现这个洞于是直筒子，敌机直接就可以扫射到洞子里去。他连夜叫工兵连把洞子加深，并在洞口用沙袋堆了隐蔽墙。第二天，彭老总进到洞子后，敌机像是知道内情一样，超低空飞来，对着彭总的房子和洞口劈劈啪啪猛扫一样，房子被打坏，沙袋上打了70多个子弹眼儿。事后，大家都说好险呀！那时，美机飞行员技术很高，能从很远的距离对准洞口的小亮点子直扫射。

五次战役后，彭老总在回北京面陈关于朝鲜作战见解时，觉得有必要就树立持久作战思想，同金日成同志交换意

见。当时,敌机不停地对我后方封锁轰炸,企图瘫痪我后方。2月天气,大同江冰封雪盖,彭老总乘吉普车乘着天黑从大同江的冰层上开过去了。第二天,彭老总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并取得一致的意见。

黄昏时刻,彭老总一行与金日成告别,走向回程。不料,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大同江上厚厚的冰层被美机炸开了,大小不等的冰块在汹涌的江水上漂动。这怎么办?说不定,美机马上就转回来了。大同江上没有桥梁,更没有摆渡。中国军队的统帅也犯愁了。秘书杨凤安更是感到十分惶恐。正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从上游漂过一块大冰块。彭老总一看,说把车开上去!司机一踩油门,吉普车居然开到冰块上了。这块大冰像无指挥系统的军舰似的在冰冷的江水上顺流漂动。彭老总和杨凤安希望它能靠上对岸,可是眼看着靠上去了,又漂走了。这样,让彭总高兴了几次,又失望了几次。天无绝人之路。忽然,这块大冰以巨大的速度向对岸撞去。彭老总像指挥作战似的,让司机赶快发动汽车,并加大马力向岸边冲去,果然成功了!杨凤安事后才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冷汗。彭老总回到志愿军司令部,立即向解方参谋长交待,司令部要向前移动,要靠近第一线各军,以利与各军能直接通电话,直接掌握战场的情况。

10 第一次全国组织会议

中共中央第一次全国组织会议于1951年3月28日—4月9日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21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共有490人出席了会议。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了党的状况,他指出:我们党现有580万党员,160多万人在武装部队中,20多万人在其他工业中,70多万人在国家行政机关、企业机关及其他机关学校中,300多万人分布在农村中,还有20多万人分布在其他的方面。所有的这些党员,在全国各方面建立了25万个基层组织——支部。但是,在这些党员中大部分是近几年发展的新党员,两年以下的新党员占了党员总数的将近一半。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我们国家的政党。针对有很多人愿意加入我们的党的现状,投机分子、破坏分子,也想用各种办法钻入到党内来,这就增加了对党的危险性。又由于我们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在过去对于接收党员的工作没有实行严格的控制与检查,就使不少的地方接收党员过多,以致有一些不够党员条件的人,觉悟不高甚至思想落后的人,也被接收到党内来。还有一些坏分子也乘机钻入党的一些组织;一些党员有较严重的毛病,不求上进,作风不正派,官僚主义,自以为是,脱离群众等;还有一些党员认为中国革命业已“完成”,一心只想如何去发展他们的私人事业,享受革命胜利的果实。他们的毛病

发展起来,并和党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对于我们党的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是完全必要的。他对整党各项内容作了详细的说明,并强调整党是一件十分负责的严肃的工作,各级党委必须采取慎重严肃的态度去进行。会议对刘少奇的报告进行了讨论。最后,刘少奇作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报告。

会议对整党工作进行了部署。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完成党的基层组织的整顿工作。并对整党工作的方针、步骤和方法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了决定。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关于整党工作的重要性。决议指出:必须克服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不纯洁现象,不然,党将很难顺利地领导与团结全国人民,完成新的更伟大的历史任务。整党工作的方针是:认真地、谨慎地对党的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关于整党的准备工作,包括训练干部,对党员普遍进行一次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的党员都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进行整党的典型试验,取得经验后进行整党。

决议还规定了关于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是:

①一切党员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②一切共产党员必须有为彻底实现党的最终目标,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决心。③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下定决心,终身英勇地坚持革命斗争,在任何情况下,不退缩,不叛变党,不投降敌人。④一切共产党员的斗争和工作,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积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极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和建设工作，并在人民群众中起模范作用。⑤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私人的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⑥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经常地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并及时加以纠正。⑦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及时向党反映，并把党的政策向人民群众做宣传解释，使党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领导群众前进。⑧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努力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决议关于整党的内容指出：在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时，首先应对于所有的党员，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发现和清除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对于有缺点和错误的党员和根本不够党员条件的消极分子，应采取热情的与人为善的态度和治病救人的精神，帮助他们提高觉悟，改正错误和缺点。对于拒绝党的教育，或教育改造确已无效者，应经过妥善的办法，使他们退出党的组织。关于发展新党员的有关问题。决议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分布是很不平衡的。老区党的组织已经发展得很大，新区党的组织却还很小。农村党员数量很大，产业工人党员数量很少。鉴于这种情况，决议规定：老区目前以整党为重点，暂时停止发展；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新区农村和工厂、矿山、企业、机械和专科以上学校中，党的组织必须有领导有计划地采取慎重的方针来发展党员。目前首先应该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吸收新党员与建立党的组织。同时，又必须严防各种坏分子钻到党内来。

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党的组织工作会议。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次重

要会议,它确定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方针、步骤和具体任务,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总结了两年来整风建党的经验,纠正了在发展党员中降低条件的倾向,落实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会后,整党工作逐步展开。

11 批判电影《武训传》

武训(1838—1898),山东堂邑(今聊城)人,因排行老七,名武七。武训的“训”字,是他逝世后,清朝政府为表彰其“行乞兴学”而赐给他的名字。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父亲去世后,武训随母乞讨为生。长大成人后给地主张老辫当长工,张老辫欺他不识字,赖掉他3年的工钱,并被毒打赶出门外。武训自此悟出一个道理,穷人只有识了字才能不受地主的欺侮。他为了让穷人的孩子都能上学识字,决心乞讨攒钱兴办义学。经过30年乞讨,在武训50岁之后陆续在堂邑柳林集、馆陶、临清办起三所义学,他在行乞中度过余生。清朝皇帝曾旌奖武训“乐善好施”,被尊为“义乞”、“乞圣”。

《武训传》电影文学剧本写成于1947年秋,电影《武训传》是孙瑜编导的一部以清朝末武训的生平事迹为内容的传记影片。国民党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由赵丹主演。拍摄1/3后,因经济枯竭被迫停拍。1949年1月,昆仑电影公司购买了该片的摄制权和已拍摄成的胶片。因上海解放,摄制人员离散再次停拍。1949年11月底,昆仑电影公司再度准备摄制,并对原剧本作了修改。1950年初开始拍摄,12月正式上映。电影分上下两集,系统地描写了少年武训的苦难生活和他从青年时代起由“行乞兴学”而终于获得“苦操奇行”、“千古一人”的美誉的一生经历。电影歌颂武训“无拳无勇”、“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而30年如一日进行为谋取穷

孩子上学识字的坚持精神，即武训精神。电影中的武训，他的头发几乎全部剃去，只在左边蓄着一根小辫，肩上背着布褡子，手上拿着铜瓢，疯疯癫癫地边走边唱：“我扛活受人欺，我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我早晚修个义学院。”他为了讨几个钱，他装着笑脸到处给人下跪磕头。他用拳头捶着胸口叫喊：“打一拳，两个钱 踢一脚，三个钱。”他甚至用学狗爬，让人当驴当马骑，表演喝脏水、吃瓦片、屎尿、蛇蝎等行为来引起人们施舍。

《武训传》上映后，北京的《光明日报》、《新民报》，天津《进步报》，上海《大公报》、《大众电影》等报刊，发表了 40 多篇称颂《武训传》和武训的文章。有的文章赞扬武训是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典型地表现了我国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上海的《大众电影》还公布了《武训传》为 1950 年最佳影片之一。1951 年 3 月底开始，逐渐出现了相反的意见，否定《武训传》和武训。如晴籛的文章认为，武训“是歪曲中国人民斗争，反现实主义的人物，”不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好传统。由此，对《武训传》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人民日报》1951 年 5 月 20 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指出，不应当向人民歌颂武训。“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泽东在社论中明确提出：不应该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号,和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样的人物。如果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毛泽东又严肃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毛泽东说,电影《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即应当用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观察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泽东还提醒全党:“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某些共产党员丧失了警惕性。提出应当重视和“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同一天,《人民日报》党的生活栏刊登《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一文,指出《武训传》的放映及其所引起的评论,不但证明了文化思想混乱,而且证明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确实侵入到战斗的共产党。要求党的领导帮助党员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武训、《武训传》以及有关武训各种赞扬文章的反动错误的思想进行系统的批判。若忽视对错误思想的批判工作便是取消了党对思想工作的领导。要求歌颂过武训和《武训传》的,一律要作严肃的公开自我批评 而担任文艺、教育、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干部,还要作适当的结论。

全国各报刊转载毛泽东社论的同时,发表了大量的批判

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中宣部、教育部等,要求把这一运动普及到每一学校每一教育工作者和每一个文化工作者,还要联系实际检查自己,肃清“武训精神”的影响,澄清思想上的混乱。电影《武训传》的编导演、与此片有关的领导干部及发表过赞扬文章的人员都被迫做了检查。以武训命名的学校,立即改名。有一些学校还出现了人人过关,批判“小武训”,“活武训”的现象。这场批判运动中,逝世多年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被公开点名批判,他光辉的教育思想也受到指责。一些人发表文章,批判陶行知和教育思想,并涉及到郭沫若等一大批民主进步人士。形成了建国后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批判运动。在批判运动高潮中,中央文化部和《人民日报》联合组成“武训历史调查组”,江青参加了领导工作。调查组在武训故乡堂邑、临清和馆陶等地进行了 20 多天的调查,写成《武训历史调查记》,连载于 1951 年 7 月 23 日至 28 日的《人民日报》。“调查记”实际上为这次批判运动作了总结。调查团目的就是为武训已定的罪名找罪证。武训被扣上“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三顶帽子。武训买过几百亩地,这地都归义学所有,他不曾剥削群众,过地主生活;他积攒了万贯钱财,借过债,也得了一些利息,这些钱也都花在义学上。至于“大流氓”的罪名,更是毫无根据的揣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 1985 年 9 月 5 日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对当年的批判作过一个结论,他说 1951 年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

12 英国劫掠“永灏”号油轮

“永灏”号油轮是建国初期中国最大油轮之一，载重15000吨，1948年7月交托香港英商黄埔船厂修理。1950年4月1日，该轮全体员工宣布起义。6月29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中国油轮公司予以接收，属国营上海中国油轮公司。

1951年3月，台湾当局勾结黄埔船厂，向香港法院提出产权问题，想劫夺该轮。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发表声明，提请香港英国政府注意，尊重并负责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留港财产不受侵犯。3月21日，“永灏”轮在香港代理人招商局往香港海事处结关，拟将该轮拖回国内。但海事处故意刁难，借口需要各种证件，阻挠该船结关出口。4月4日，全部证备齐，香港海事处仍拖延不予签发。4月7日，香港英国政府妄称为了“公众利益”，宣布将该轮“征用”。中国油轮公司驻香港代表邵良及“永灏”轮船长左文渊对于英方的这种无理措施，当场加以严正拒绝，指出“永灏”油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财产，香港英国政府无权“征用”。“永灏”轮全体60多名船员，团结一致，坚守在船上，严拒英国政府人员上船。然而，香港英国政府竟于4月8日下午，横蛮地派遣香港水师警署武装水警16名登船，监视“永灏”号油轮。4月12日12时，香港警署水师轮多艘，满载武装警察，突然包围“永灏”轮。香港海事处向中国船员发出最

后通牒,限令全体员工半小时内离开油轮。在遭到中国船员的拒绝后,他们便强行登占该轮,擅自扯下中国国旗,胁迫船员离船。当国旗被强行降落时,全体船员愤而落泪。在离船时,他们高唱国歌,情绪激昂,对英国政府卑鄙行为表示愤怒的抗议。随后,该轮便驶离香港,交给英国海军。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据路透社伦敦报道,英国殖民地大臣葛里菲斯在他的公开谈话中,透露了香港政府“征收”“永灏”号油轮的目的是,为了在朝鲜的英国及联合国军队的安全,决不让“永灏”油轮回到中国去。

香港英国政府蓄意劫夺中国油轮之事,引起了全中国广大人民极大愤怒。4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发表声明指出,英国政府无理劫夺永灏轮的行动,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开挑衅,应对此承担一切后果。4月30日,政务院发布命令,决定征用英国在中国境内各地除总公司和分支机构的办公处及推销处以外的亚细亚火油公司全部财产,并征购其全部存油。

13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慰问志愿军

自1950年10月入朝作战到1951年4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进行了四次战役,把敌人从鸭绿江赶回到“三八线”附近,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及海空军方面均不及敌人,所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所取得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是付出很大代价的。

为了给在艰苦环境中与美帝国主义英勇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以精神鼓舞,为了表达全国人民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大力支持和亲切慰问,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决定派遣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赴朝慰问。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由廖承志为团长,陈沂为副团长。慰问团包括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阶层、各界、各地区、各民族及人民解放军代表。从1951年4月初到5月中旬,慰问团的八个分团深入到朝鲜战场最前线 and 最后方的地区,普遍地慰问了中朝人民军队的各兵种部队、各后勤部队,慰问了朝鲜各阶层、各界人民,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党、政、军首长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致敬,向他们表达了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意志,并分送了大批的慰问信、锦旗及共值人民币500多亿元的慰劳品及慰劳金。随团的文艺工作者为朝鲜前线与后方军民表演了许多艺术节目。慰问团

全体团员在这次慰问工作中，认真地完成了全国人民交付的任务。

在朝鲜战场慰问过程中，有廖亨禄、常宝堃、程树棠、王利高等四位同志光荣牺牲。

14 宋庆龄获斯大林国际金奖

1949年为纪念斯大林70寿辰而设置于“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以表彰对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有卓越功绩和平战士,是当时国际上最高的荣誉奖之一。

1951年4月6日,“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委员会作出决定:“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宋庆龄在维护与巩固和平斗争中因有卓越的贡献,特授予她‘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

宋庆龄早年是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她一直站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继续不遗余力地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妇女儿童的解放事业奔走呼号,作出很大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和世界人民的尊敬。

9月18日,“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颁奖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黄炎培及许多中外宾客均前往祝贺。颁奖典礼由“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委员会副主席郭沫若主持。他在致词时盛赞宋庆龄“对于中国儿童的解放、中

国人民的解放，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都有很大的贡献”，并说“这是宋庆龄先生个人的光荣，也是中国人民集体的光荣。”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亲自把刻有斯大林像的金质奖章和奖状授予宋庆龄，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辞：“您的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使一切正直的人们——不论他们生活在哪里，都得到鼓舞。您的一生值得作为崇高的榜样。在黑暗势力气焰万丈，胆怯者卷起旗帜或投靠敌人的年代里，您挺身而出为保卫人类的尊严，保卫正义与和平而英勇战斗。在最黑暗的年代里，您始终忠实于孙中山先生的伟大遗训。”

沉浸在欢乐之中的宋庆龄致答词时说：获得奖金，在她人生的历程中“是一件无限荣幸的事，特别是能够和斯大林的伟大名字连在一起，能够和那些为了保卫和平的斗争而将他们的名字写在历史的光辉书页上的人列在一起，更是一个特殊无上的光荣”。“这将是终生难忘、永远珍爱的一个时辰。”她还一再表示，“这个光荣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我是以中国人民的一个代表来接受这个奖金的。”她的答词一再引起全场的热烈掌声。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1971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热烈的掌声中朗诵献诗。

宋庆龄接到这笔奖金（10 万卢布）的汇款单时，立即在汇款单背面亲笔写下批语：“此款捐赠给中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1952 年，中国福利会用这笔奖金在上海西区建立了我国第一所综合性的妇幼保健院——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15 谁是最可爱的人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通过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

文中作者满怀深情地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如二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军隅里敌人的逃路。当他们赶到书堂站时,逃敌也恰恰赶到那里。先头连抢占了公路边的一个小山岗,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以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勇士们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击退。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战后打扫战场时,看到烈士们的遗体保留着战斗的姿态,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的,有的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个耳朵。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却消灭敌人300多名,更重要的是他们牵制住了敌军,使我军主力部队能赶上来聚歼敌人。又如在汉江北岸,作者遇到一个年仅21岁名叫马玉祥战士,是黑龙江青冈县人。他原是炮兵,当他目睹美国侵略者的暴行后,就要求去步兵连,想法只有一个:“离敌人越近,越觉着打得过瘾,越觉得打得解恨!”一天,他从阵地下来,进村时赶上几架敌机空袭。一名朝鲜男子倒在院子里,敌机投下的燃烧弹点燃了房屋,浓烟中传来孩子的哭声。他想起了祖国的人民,于是冲

进烈火封门的房间，救出了孩子，再去救孩子的母亲时，她已经不行了。他紧紧抱着这个无父无母的孩子。我们的战士住的是防空洞，吃的是炒面和雪，为的是祖国人民“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我们的战士对祖国、对朝鲜的惟一要求就是希望得到一块“朝鲜解放纪念章”，戴着它回到祖国去！这就是我们的战士美丽而宽广的情怀，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50年代初期，作家魏巍亲赴朝鲜战场，写下了一系列优秀的通讯报告。影响最大的一篇是《谁是最可爱的人》，它激发了人们支援战斗，发奋生产的热情。文章发表的第7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两封读者来信，信中表示要加紧生产，支援志愿军的英勇战斗。郭沫若认为，好的作品是“把人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谁是最可爱的人》发掘出了志愿军战士无比高尚的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因此，其影响范围远远超越了一般文学作品的读者群，在全国人民中激起巨大反响，而“最可爱的人”也成为人们对志愿军最亲切的称呼。

16 麦克阿瑟被解职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美国五星上将，长期在军界担任要职。朝鲜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侵略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1951年1月下旬，由于朝中人民部队开始进行第四次战役并不断取得胜利，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和整个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这也把美国国内的外交政策大辩论推向了高潮。杜鲁门反对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蒋介石军队，并试图用外交手段解决朝鲜战争，而麦克阿瑟等主张放蒋出笼，宣称要公开霸占台湾，并把侵朝战争失败的责任推到杜鲁门身上，鼓吹发动对华战争。麦克阿瑟于1951年3月24日，又越权抢先发表与总统即将发表的声明背道而驰的政策讲话，声称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这进一步加深了上述矛盾。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对此提出非正式抗议，并要求撤换麦克阿瑟，在美国内部也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决定解除麦克阿瑟的指挥权。

4月11日午夜刚过，华盛顿各通讯社、报纸、电台、杂志的编辑部电话铃声大作。白宫新闻处通知，将于凌晨1时举行“记者特别招待会”。当记者们纷纷赶到白宫时，得到的第一个文件是杜鲁门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声明。声明说，由于麦克阿瑟不能够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联合国的政策，决定免去麦克阿瑟的各项指挥权，并任命李奇微接替他的职务。4月12日，麦克阿瑟在东京美国大使馆被撤掉

了驻日盟军最高统帅、远东美军统帅、远东美国陆军总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四个职务。

4月16日,麦克阿瑟回到美国,日本政府为他组织盛大的欢送仪式,机场鸣礼炮18响,18架喷气机在上空盘旋,4架“飞行堡垒”编队掠过机场。在夏威夷,在旧金山,人们排成长队夹道欢迎,机场上的群众以一种几乎是歇斯底里的狂热来接待他,马歇尔等还来不及向他致意,12000名群众已冲破了警卫线蜂拥在麦克阿瑟的座机周围。20日纽约有75万人上街排成19英里长的队伍欢迎他,欢迎队伍向麦克阿瑟抛掷的五彩纸屑铺天盖地,纽约满城纸屑,仿佛经受了一次暴风雪的袭击,车队在队伍中足足开了6小时25分钟,弄得欢迎者和被欢迎者都筋疲力竭。

17 关于农业合作社的争论

围绕山西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1951年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问题,实质是涉及当时老区农村或土改后的农村要不要开始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山西省委于1951年4月17日向中央、华北局写了一个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有三部分:问题的提出;省委的主张;几个具体问题。报告说:在山西老区,一部分农民已达到富裕中农的程度,加之战争转向和平,就使某些互助组织中发生了涣散的情形。实践证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如果不注意,会有两个结果:一是互助组涣散解体;二是互助组变成富农的庄园。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的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会后退。山西省委主张,扶植与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引导互助组走向更高一级的形式。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农业生产合作社按土地分配的比例不能大于按劳力分配的比例,并要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地加大按劳分配的比例。这两个进步因素逐步增强,将使老区互助组织

大大前进一步。

在这以前华北局对山西省委的观点已有所了解。华北局关于互助合作运动的观点是：要求在尚无互助组的地区，应广泛发展各种形式的互助组。在已有互助基础的地区，则应在农副业结合的基础上，进而与采用新农具大农具及其他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的工作相结合，充实新的生产内容。至于在互助组合伙买公共农具等现象，华北局认为，只可在农民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较高的地区适当提倡，但不能普遍推广，更不可强迫一般互助组照办。因此，在得悉山西省委意见之后，华北局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4月17日，山西省委送上正式报告后，为慎重起见，刘澜涛再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明确表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4月下旬，华北局召开五省市互助合作会议，讨论山西省委意见。

华北局5月4日正式批复山西省委并报告中央。批语指出：山西省委抓紧对互助组领导，注意研究新发生的问题是对的。但是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任务只能动摇封建私有、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官僚资本主义私有；一般动摇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提高与巩固互助组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以满足农民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要求，而不是逐渐动摇私有的问题。这一点必须从原则上彻底搞清楚。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省只能试办几个作为研究、展览和教育农民之用。即使试办，也要出于群众自愿，不能强行试办，更不宜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推广。刘少奇接到华北局批转山西省委的报告和华北局领导人的汇报之后,连续在几个场合对山西省委报告的观点提出批评。

7月3日,刘少奇批印山西省委报告“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开始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和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和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7月5日下午,刘少奇给马列学院学生讲课。讲稿中对山西省委报告也提出批评,指出:目前的互助组或供销社都不能逐步提高到集体农场。集体农庄是另外一回事,要另外来组织,而不能‘由互助组发展到’,也不能由供销社发展到。”

7月25日,华北局向中央作了《关于华北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陈述了“四月会议及以后的一些情况,争论和解决的问题。”报告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刘少奇对报告作了多处修改,尤其对争论部分改得更多。再次申明自己以前的观点。

随后,毛泽东主席找刘少奇、刘澜涛和薄一波谈话,明确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而不支持华北局和刘少奇的观点。毛泽东针对刘少奇和华北局的观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9月,毛泽东倡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草案肯定了土改后农民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10月17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转发高岗10月14日关于东北农村互助合作的报告的通报,认为高岗报告中所提方针是正确的。高岗报告认为,随着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指导互助合作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是农民的自发倾向。11月21日,毛泽东起草中央批语,批转河北省委向华北局的报告,认为河北经验可在各地广泛施行。即大力发展农村的互助合作。12月15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印发9月会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通知,要求各地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把农业互助合作当做一件大事去做。

就这样在1952年,全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有很大发展。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公布

海关是设在关境上的政府行政管理机构，职责是依据国家法令对进出国境的货物、邮件、旅客行李、货币、金银、证券和运输工具等进行监督检查、征收关税，并执行查禁走私任务。因为历史上国际商品贸易大多利用海运，所以这种管理机构被称为海关，并延用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于1951年4月18日正式公布，5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是中国第一部统一的海关法律。

该法明确系统地规定了海关机构的组织、任务、职权及统一的海关工作方法，以及进行对外贸易和运输的业务单位和私人对海关规章的责任、义务和海关与他们的互相关系。该法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的基本任务是对进出国境的货物、货币负责执行全面的、实际的监管，以保证对外贸易许可制度的有效实施和进出口外汇全部由国家金融管理机关掌握 按照政府公布的税则征收关税 同走私作斗争。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设有海关。中国在记载西周时期政制的古籍中，就出现了“关”的名称，以后随着封建统一国家的形成，一些水陆要道设立了类似的机构。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式在江、浙、闽、粤四地，设立了海关。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陆续夺取了中国海关的关税和行政管

理权。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旧中国海关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开始着手对海关进行改造和建设。1949 年 6 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设立了海关总署筹备处;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作为政务院的一部门,随着新中国宣布成立而诞生,并开始陆续颁布有关法令法规。1951 年 3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举行第 17 次政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统一的海关法律宣告诞生,这在中国海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自从《暂行海关法》公布实施后,许多配套的法令法规相继建立,多年来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加强进出口关境的监督管理,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以及海关本身的建设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海关法制建设也日趋完善。1987 年 7 月 1 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正式施行,《暂行海关法》同时废止。

19 基督教团体会议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于1951年4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根据政务院1950年12月29日发布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以及郭沫若副总理报告中提出的“接受美国津贴之中国宗教团体，应使之改变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政府对于他们的自立、自养、自传运动，应予以鼓励”的原则召开了这次会议。基督教各全国性团体、区域性团体、地方性团体和个人代表共151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由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邵荃麟致开幕词。会议听取了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陆定一的报告，吴耀宗报告，邵荃麟副秘书长《对于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处理办法草案》的报告和郭沫若副总理的报告，吴耀宗致闭幕词。

陆定一在向大会作的报告中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爱国的宗教徒，包括基督教在内，在政治上团结的基础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伟大的共同纲领。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团结起来，把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的事情办好，把肃清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影响的事情做好。接着他从历史上揭发了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全世界和新中国的阴谋。最后，他号召全国的基督教徒积极拥护和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

运动,并普遍深入地开展三自革新运动,彻底割断和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

吴耀宗在关于《八个月来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中国基督教革新运动的发展,是一个与帝国主义尖锐和长期的斗争。绝大多数爱国的基督教教徒是拥护三自革新运动的。到今天为止,全国在革新宣言上签名的基督教教徒已经超过了 18 万。为了使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深入发展,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1) 以抗美援朝作为我们的中心任务。(2) 彻底地、永远地、全部地肃清教会内部美帝国主义的影响。(3) 认真检举并肃清潜藏在教会里的帝国主义分子和甘心做美蒋匪特的教会败类。(4) 拥护土改,加紧农业生产。(5) 加强时事学习,提高我们的政治认识。(6) 广泛深入展开革新宣言签名活动。(7) 号召全国教会拟定三自运动计划并成立一个全国性的领导机构。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讨论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的办法,以便实行中国基督教会彻底割断与美帝国主义的关系,会议通过讨论并通过了《对于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处理办法》和通过了全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到会代表还一致同意组织“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并推选吴耀宗为筹备委员会主席。大会授权该委员会在筹备工作完成后即宣告正式成立。

20 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

为保护国家货币、巩固国家金融,打击伪造货币、变造货币、散布流言或者用其他方法破坏国家货币者,1951年4月19日政务院公布了《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

该条例的主要内容有:所谓的国家货币指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以反革命为目的伪造国家货币者,其首要分子或情节严重的处死刑,情节较轻者处无期徒刑或15年以下7年以上徒刑,并没收其财产的全部或一部。以反革命为目的变造国家货币,或贩运、行使伪造、变造国家货币者,其首要分子或情节严重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情节较轻者处15年以下5年以上徒刑,并得没收其财产全部或一部。意图营利而伪造国家货币者,其首要分子或情节严重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15年以下3年以上徒刑,均应没收其财产之全部或一部。意图营利而变造国家货币,或贩运、行使伪造、变造国家货币者,其首要分子或情节严重者,处无期徒刑或15年以下7年以上徒刑,并得没收其财产之全部或一部,其情节较轻者,处10年以下1年以上徒刑并酌处罚金,情节轻微者处一年以下劳役或酌处罚金。散布流言或用其他方法破坏国家货币信用者,处5年以下徒刑或罚金。但以反革命为目的,处15年以下5年以上徒刑,其首要分子或情节严重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并没收其财产全部或一部。凡误收伪造、变造货币,在收受后察觉为伪造、变造者,应立即

报告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或公安机关,明知不报而仍继续行使者,视其情节轻重、处1年以下劳役或酌处罚金,或予以教育。对犯该条例所规定各罪的预备犯、未遂犯,视其情节从轻处罚,自首悔过者,减轻或免除处罚,自首悔过并协助破案者,免除处罚;凡伪造,变造的货币全部没收;供该条例犯罪所用的机器、原料及其他物件均应没收,但属第三人所有而不知其供犯罪使用的,不在此限。对犯该条例所规定各罪者,视其情节轻重,附带宣告剥夺政治权,但误收伪造、变造货币者不在此限。

《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的颁布,对于巩固国家金融,打击破坏国家货币的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

21 摩萨台与伊朗石油案

伊朗丰富的石油资源是国家经济命脉,却一直被英帝国主义垄断。1947 年底伊朗政府开始向英国提出修改 1933 年石油协定的要求。1949 年 7 月 17 日,伊朗政府在美国的恐吓下,与美国签订对 1933 年石油协定的补充协议,仍保存了原协定的权利。因此引起了伊朗全国人民的空前愤怒,石油国有化运动迅速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议会于 1950 年 11 月 25 日拒绝通过“补充协议”。1951 年 3 月 15 日,伊朗国会一致通过石油国有化的方案。

此后,反英浪潮不断,1951 年 4 月 25 日数万人参加的伊朗南部石油区工人的罢工斗争胜利结束。在争取石油国有化运动中,英伊石油公司工人在 1951 年初多次罢工。4 月,当阿巴丹炼油厂停产时,英国增派两艘巡洋舰和其他舰只驶抵波斯湾,英国新任外交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公开威胁说,要采取“最恰当的行动”来保护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并要伊朗政府对英国公民和权益可能受到的损害负全部责任。英国的武力威胁和政治讹诈只能激起伊朗人民更强烈的反抗。在德黑兰、伊斯法罕、古姆等地,群众纷纷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声援公司工人的斗争。此时,英伊石油公司董事长福莱塞不得不与政府有关部门洽商,并于 4 月 26 日将讨论结果提交伊朗首相,主要内容有:英伊公司租借权可“转让”给一个新的英国公司,伊朗在这个新公司的董事会里将有适当代表

1951 年的故事

权,利润则由公司和伊朗政府均分。伊朗方面不愿接受这个建议,晚上,伊朗石油特别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实施石油国有化的9点方案。

4月29日穆罕默德·摩萨台出任伊朗首相。摩萨台于1881年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大地主家庭,早年在法国和瑞士攻读法律。1915年,他当选为议会议员,1917年出任恺加王朝的财政副大臣,以后历任司法大臣、法尔斯省省长、阿塞拜疆省省长。巴列维王朝建立后,摩萨台与前国王礼萨发生冲突,1928年被迫隐居,1940年6月被捕,直到1941年9月礼萨国王逊位时才获释。1944年3月他再度当选为议员。摩萨台顺应伊朗民族主义的发展形势,积极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及英伊石油公司对伊朗的经济掠夺。他于1944年组织并领导民族阵线,主张石油国有化。议会内成立石油特别委员会时,他所领导的民族阵线占了1/3的席位。摩萨台政府1951年6月决定实施石油工业国有化法案,英伊并就石油问题在德黑兰举行谈判,伊朗政府代表在谈判开始时,要求英伊石油公司承认伊朗石油国有化法律,并把该公司自国有化法通过以后的收入的75%交给伊朗政府,其余约25%存入双方同意的银行。伊朗政府要求英伊石油公司承认这些条件后,再进行谈判。英伊公司的代表于19日提出一反建议,表示英伊石油公司愿意在谈判期间先付给伊朗政府1000万英镑,但双方协议的基础则应是由英伊石油公司成立一新公司,允许伊朗政府派遣若干代表参加该公司的董事会。伊朗政府代表拒绝这一建议,认为它与伊朗石油国有化法相抵触,英方代表则立即退出会场,谈判因而破裂。

美国驻伊朗大使格拉第在谈判期间曾数度拜访伊朗首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相摩萨台企图干涉谈判。19日在最后一次谈判举行之前,格拉第又要求摩萨台不要采取“轻率的行动”,以便使“这个巨大的工业可以继续留给西方国家使用”。但在伊朗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下,伊朗内阁于20日决定立即接收英伊石油公司的一切设备,并宣布“英伊石油公司已不存在”。21日,前英伊石油公司总办事处房顶上升起了伊朗国旗,该公司招牌被“伊朗国营石油公司”临时董事会的招牌所代替,该公司在各城市的招牌也被拆除。最后由于英方代表拒绝承认伊朗石油国有化的法律而宣告破产。之后,英国转而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申诉。7月5日,海牙国际法庭不顾波兰和埃及两国的反对,非法决定受理英国的申诉。伊朗政府坚决拒绝国际法庭这一干涉内政的决定。

9月12日,摩萨台要求前来斡旋的哈里曼把他的最后通牒转给英国政府。在通牒中,他重申伊朗政府不能接受英国的建议,但也提出了4点建议:①由伊朗和中立国家的代表组成混合执行委员会,共同管理伊朗国营石油公司的行政和技术事务;②对英伊石油公司的赔偿可按股票市价,或按其他国家的先例,或按双方互相同意的其他办法作为基础;③伊朗每年卖给英国1000万吨石油供其国内消费;④上述石油可售予英国指定的公司和运输行业。如果英国政府在15天之内不能对这项建议作出满意答复,伊朗政府将吊销南部油区的英籍职员和专家居留证。但在9月15日,哈里曼致函摩萨台,拒绝把摩萨台的信转达给英国政府,至此,哈里曼的斡旋活动以失败告终。

英国不甘心退让,便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此事,企图对伊朗政府再度施加压力,10月15日安理会讨论英国——伊朗石油案,伊朗摩萨台出席会议,他登上联合国讲坛,阐明

伊朗政府的立场。他重申国有化纯属伊朗内政，国际法庭和安理会均无权审理，惟有伊朗人民有权处理，理由很简单，它是伊朗人民的财产。

摩萨台指责英国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沆瀣一气，利用1933年租借协定践踏伊朗主权，还向国际法庭和联合国无理告状。摩萨台讲到悲愤处，用手猛击讲台，说得心酸时，声泪俱下。听者无不为之动容。他说：英国断言，国际和平与安全要求伊朗石油工业继续在英国管理下经营，这种论点不值一驳。如果英国指的是我国石油工业国有化危害了国际和平，那么我们不明白，为何不把本国许多工业国有化的英国政府拖到安理会上来，指责它动摇了和平的基础呢？如果含义并非如此，伊朗又在哪方面威胁了世界和平呢？他说，伊朗许多人生活极端贫困，其预算微不足道，只有2500万美元，没有发动战争的潜力。它的陆军和空军仅仅能够维持国内秩序，它的海军只限于沿海巡逻，要说像伊朗这么弱小的国家可能危及世界和平。这种说法不过是恶狼与羊羔的寓言的再版罢了。最后，摩萨台愤慨地指出，伊朗在英国泰晤士河没有一兵一卒，威胁和平的不是伊朗而是英国。摩萨台的讲话自始至终将矛头指向英国。他也呼吁西方大国支持伊朗的国有化。

摩萨台的这篇维护国家主权的讲话受到多数代表的欢迎。在这次会上，苏联代表查拉普金明确支持伊朗，法国代表拉科斯特则建议安理会暂停辩论伊朗问题，留待国际法庭作出判决。

22 戏曲改革

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表《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决定对戏曲进行改革。指示说，人民戏曲是教育广大人民的重要武器。我国戏曲遗产极为丰富，继承这种遗产，加以发扬光大，是非常重要的。由于这些遗产中许多部分曾被封建统治者用作麻醉毒害人民的工具，必须分别好坏加以取舍，并在新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发展，才能符合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在1950年11月所召集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检查了各地戏曲改革工作的情况，提出了以后的工作方针，并作了以下指示：①戏曲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凡宣传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表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曲应予以鼓励和推广，反之，凡鼓吹封建奴隶道德、鼓吹野蛮恐怖或猥亵淫毒行为、丑化与侮辱劳动人民的戏曲应加以反对。②戏曲改革工作应以主要力量审定流行最广的旧有剧目，对其中的不良内容和不良表演方法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修改。对旧有的或经过修改的好剧目，应作为民族传统的剧目加以肯定，并继续发扬其中一切健康、进步、美丽的因素。戏曲改革是改革旧有社会文化事业中的一项严重任务，不可避免地将要遇到许多复杂的问题，因此，戏曲改革工作必须有步骤地进行。③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

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地方戏尤其是民间小戏,形式较简单活泼,容易反映现代生活,并且也容易为群众接受,应特别加以重视。今后各地戏曲改进工作应以对当地群众影响最大的剧种为主要改革与发展对象。中国的曲艺形式,如大鼓、说书等,简单而又富于表现力,极其便于迅速反映现实,应予以重视。

④戏曲艺人在娱乐与教育人民的事业上负有重大责任,应在政治、文化及业务上加强学习,提高自己。新文艺工作者应积极参加戏曲改革的工作,与戏曲艺人互相学习、密切合作,共同修改与编写剧本、改进戏曲音乐与舞台艺术。

⑤旧戏班中的某些不合理制度,如旧徒弟制、养女制、“经励科”等制度,严重地侵害人权与艺人福利,应有步骤地加以改革,这种改革必须主要依靠艺人群众自觉自愿。

⑥戏曲工作应统一由各地文教主管机关领导。各省市应以条件较好的旧有剧团、剧场为基础,在企业化的原则下,采取公营、公私合营或私营公助的方式,建立示范性的剧团、剧场,有计划地、经常地演出新剧目,改进剧场管理,作为推进当地戏曲改革工作的据点。

1951年5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重视戏曲改革工作》的社论。社论说,我国戏曲遗产极为丰富,每天影响着千千万万人民的精神生活。因此对于旧的戏曲不应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而必须采取积极改革的方针,我们既反对拖延不放,也反对粗暴的改革,改革既然牵涉到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问题,那末对自己民族文化遗产必须爱护、尊重,分别好坏加以取舍,而不能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改革既然牵扯到数十万戏曲艺人的生活,必须认识艺人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他们中间虽有不少人沾染了旧社会的习气,但就他们的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实际社会地位来说,他们是在旧社会中被侮辱被歧视的脑力劳动者,必须爱护、尊重他们,团结教育他们,他们是能够而且愿意进步的,不能对他们采取轻视和排斥的态度。人民有理由喜爱自己民族传统的艺术。对人民的爱好、趣味和欣赏习惯,必须尊重,不能任意加以抹杀。因此,戏曲改革工作,必须依靠对广大艺术工作者的教育与合作,而一般地不应依靠行政命令与禁演的办法。戏曲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依靠与广大艺术工作者合作,共同审定、修改、编写剧本。对旧有戏曲必须以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历史的、艺术的观点重新加以评价和审定。旧有戏曲大部分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在民间传说中,包含有一部分优秀的神话,它们以丰富的想像和美丽的形象表现了人民对于压迫者的反抗斗争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孙悟空大闹天宫》等,就是这一类优秀的传说与神话,应加以保存与珍视。对旧有戏曲中一切好的剧目均应继续发挥其中一切积极的因素。对旧戏曲中颠倒或歪曲历史事实,侮辱劳动人民的东西,应坚决加以修改,在修改剧本的同时,对舞台形象上一切野蛮恐怖的、猥亵的、奴化的、恶劣的表演,也必须坚决地加以革除。由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国土广大,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多样,全国大小剧种约在百种左右,各种地方戏都带有各地方的语言、音乐和风俗的特点,是千百年来全国各地人民的创造,大大丰富了中国民族的戏曲遗产。对如此众多的地方戏、民间小戏和曲艺,应普遍地加以发掘、采用、改造与发展。建国近两年来,京剧和其他各种地方戏都作了许多改革的努力,是有成绩的。经验证明,凡是勇于革新,勇于创造,勇于随着观众的进步而进步的剧种,一定受到观众的欢迎,其本身的艺术生命,也得到新的

发展。新中国建立以后,全国各地戏曲艺人提高了政治觉悟,积极地参加了戏曲改革事业及各种社会政治活动。艺人的社会地位与以前完全不同了。他们受到了国家和人民的尊重。他们在娱乐与教育人民的事业上所负的责任也就更大了,必须在政治、文化、业务各方面更进一步提高自己。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新文艺工作者和戏曲艺人应团结起来,为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而共同奋斗!所以,这个指示和社论对全国戏曲改革工作,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23 黑人麦基被电刑处死

1951年5月8日,美国黑人卡车司机,4个孩子的父亲威利·麦基在密西西比州劳莱尔的电椅上被处死。

5年前,密西西比州当局用捏造的“强奸”罪名逮捕了麦基,并且草率地把他判处了死刑。其妻子和美国民权保障大会曾尽一切办法替他申冤,他们提出了确凿的证据证明麦基无罪,并且指出了判决的非法性。抗议的函电从全世界各地涌向白宫,涌向美国最高法院和美国司法部,这种抗议迫使美国司法当局不得不几次延缓行刑。但当局最后还是处死了麦基。麦基在临刑前发表了遗书,他说,他们正在准备杀死我,我不知道你(指麦基的妻子)和别人能不能把我救出来,你知道我是无辜的,要一遍一遍告诉人们我从来没有犯过这个罪。告诉人们,他们所以要剥夺我的生命,真正原因是他们想镇压住整个南方的黑人。如果你和孩子们继续斗争,他们是做不到这一步的。绝不要忘记告诉孩子们,他们的父亲是为什么被杀死的。我知道你会实现我的请求。告诉人们必须继续斗争。

麦基赴刑的那天夜里,美国进步人民在民权保障大会领导下,在白宫外面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高举着抗议陷害麦基的标语牌,慢慢地走着,直到深夜。在西德,加尔斯卢合的美国占领军中,一批黑人士兵在接到麦基被处死的消息后就提出了抗议,并且与一群白种主义的士兵冲突起来,结果有

40 人受重伤。英、法的报纸对麦基的被处死刑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5 月 8 日有 5000 人签名致书杜鲁门斥责这种法西斯行径。

24 中共中央决定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执行死缓政策

1951年5月8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及分局、省市区委、各大军区及各省军区、中央及军委直属各部门、各特种兵司、中央政府各党组下达指示,决定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执行死缓政策。

指示指出,中央已决定,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者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估计在上述党政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的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数,大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他们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

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的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不是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因此,中央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果这些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主动权操在我手里。下面是东北军区保卫部在军区系统逮捕第一批 204 名反革命分子的报告,发给你们阅看,请东北军区即照上述原则处理。各地党政军教经团中清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请各地均照上述原则处理。其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

此外,中央还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

25 埃及反英怒潮

1936 年英帝国主义者诱使当时的埃及政府签订了“英埃 20 年同盟条约”，虽然从表面上承认埃及独立，但根据条约英国仍可继续侵占埃及一部分领土，并干涉埃及的内政。1950 年埃及政府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宣称要采取坚决措施，以加速英国撤出苏伊士运河地区。1951 年 5 月初，埃及议会绝大多数议员主张取消 1936 年英埃条约。同年 7 月英国外交大臣发表声明，表示英军要继续留在苏伊士运河区。于是，埃及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坚决要求英国军队撤出埃及领土。在纪念英国炮轰亚历山大港 69 周年和 1936 年英埃条约签订 15 周年时，埃及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运动达到高潮。

10 月 8 日埃及首相穆斯塔法·纳哈斯帕夏在议会宣称，埃及政府决定废除 1936 年英埃条约和 1899 年英埃共管苏丹的协定。受到埃及人民普遍支持和拥护。此外埃及议会还通过了苏丹宪法，宣布法鲁克是埃及和苏丹国王，并设置了一个立宪会议和苏丹内阁，国王保留外交、国防、军事和发行货币的大权。10 月 9 日，英国外交部声明，不承认埃及单方面废除英埃条约，坚持其在埃及的特权。艾奇逊也发表声明，称埃及问题影响到重要的中东地区的安全和防御，美国主张通过双方协议而不是以单方面的片面行动来改变这种义务。11 日，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又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的

步骤，保持英国在运河区驻军的权利。

10月15日，埃及议会在全国人民一致支持下，宣布1936年的英埃条约和关于英埃共管苏丹的协定无效。随后在亚历山大和开罗举行了先后有20万人和百万人的示威游行，要求把帝国主义赶出埃及，取得国家完全独立；全国展开了抵制英货运动。埃及政府开始从国家机关中辞退英国职员，埃及议会批准了关于严惩与英国占领者合作的法令。埃及人民的“解放军团”向苏伊士运河区的英国军队展开了游击战。埃及人民的这场斗争风暴极大地促进了埃及封建买办势力的崩溃和民族的独立。

12月3日，英国武装部队在苏伊士运河附近向埃及警察挑衅。英军使用装甲车和自动武器向市区猛攻，埃及警察和平民多人死伤。4日，英军又出动3辆坦克和7辆装甲车向该城15000人的送葬行列开火，打死15人，打伤34人。埃及当局5日晚宣布，在3日、4日两天中，苏伊士运河区埃及人民被英军打死的共43人，杀伤的98人。这是10月中旬埃及宣布废除1936年订立的英埃条约和1899年订立的英、埃共管苏丹的协议以后，英军在苏伊士运河区所制造的最大规模的暴行。

埃及各地人民对于英军的暴行表示极大的愤怒，开罗的学生和工人在4日、5日两天连续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呼“血债要以鲜血偿还！”“我们要武器！”亚历山大港的学生和工人在4日、5日也连续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喊着：“我们要报仇，给我们武器，让我们把英国人赶下海去！”的口号。

埃及人民的反英活动，沉重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大大加速了埃及的民族独立。

26 南非火炬大游行

1951年5月28日晚,南非联邦10万人民在开普敦举行了南非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火炬大游行,愤怒抗议马兰政府奉行种族歧视政策。

前来参加示威的有从南非联邦各地赶来的各种肤色、各个民族的人民,而以50000名退伍军人为前导,他们坚决地表示反对议会于上月通过的马兰政府所提出的剥夺有色人种现有有限选举权的法案,示威者高举象征胜利的火炬和写着“拯救宪法”的标语牌,在全城游行达4小时之久,队伍所经过的街道两侧,都站有三四排人为示威者助威。

之后,示威者在议会门前举行了抗议大会,退伍军人空军上校麦朗在会上发言,斥责马兰政府破坏宪法、强使议会通过卑污的法律的罪行。他强调指出,今天在南非当政的人正是昨天祈祷纳粹胜利的人。他号召南非人民为反对马兰独裁政权而加紧斗争。会上并宣读了来自德兰士瓦、桔河、纳塔尔、好望角省东部和西南非洲各城的抗议决议。这些决议,特别是改选议会的要求受到与会群众的热烈欢迎,接着,示威者选派了代表把这些决议送交议会中反对派“统一党”的领袖们。

南非政府派遣了大批武装警察密布在议会大厦四周,企图阻止人民代表进入议会。警察挥舞警棍殴打群众,企图冲散大会,他们打伤了好几十个示威者。

27 欧洲煤钢联营

1950 年 5 月法国外长舒曼提出“欧洲煤钢联营计划”，并建议由愿将本国经济中的煤钢部门的管理权委托一个独立机构的一些国家，成立煤钢共同市场。

4 月 18 日经过将近一年的磋商谈判，从舒曼计划到欧洲煤钢联营条约的过程终于完成。当天下午，欧洲煤钢联营条约的签署仪式在巴黎凯道赛街法国外交部的钟厅举行。法国、联邦德国等 6 国的外长代表本国政府签订为期 50 年的《欧洲煤钢联营条约》，欧洲煤钢联营正式成立。由于 4 月 7 日和 18 日条约还作了一些修改，致使法国国家印刷所无法及时印就条约文本，外长们只得在白纸上签字。签字按法文字母顺序进行，阿登纳代表联邦德国第一个签字。

欧洲煤钢联营条约包括序言、100 条条款和若干附件。

条约写明，联营的使命是在 6 国间建立取消关税、商品数量限制和其他歧视性措施的煤钢共同市场，以发展经济，扩大就业，提高生活水平。条约进一步规定，联营必须逐步创造条约，在最高生产率水平上，对生产进行最合理的分配，同时又不致引起失业和经济混乱。联营的机构是高级机构、共同议会、部长特别理事会和 1 个法院。高级机构由 9 位委员组成，其中 8 人由 6 国政府一致同意任命，另 1 人则由 8 人选举产生，但至少得要 5 票，同一国籍的委员不得超过两人，委员任期 6 年，连选连任，高级机构设主席和副主席各 1 人，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由6国政府一致同意指定。高级机构的议决方式是多数通过制。高级机构是一个超国家的机构,他们不请求也不接受任何政府或任何组织的指示,高级机构有权决定联营的生产规模、资源分配、价格制定、税收课征、投资和补助的提供以及授权企业的合并和集中等。高级机构的决定具有约束性,对于违背条约规定或拒不执行高级机构决定或建议的机构、企业或个人,高级机构有权加以处罚。

共同议会由参加联营的各国议会每年指派或选举78名代表组成,其中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各18名,荷兰、比利时各10名,卢森堡4名。共同议会依据条约行使监督权,每年召开1次年会。但它的实际职权只限于听取和讨论高级机构的年度报告和可以以超过议席半数的三分之二的表决票迫使高级机构委员集体辞职。部长理事会由6国政府成员各1人组成。主要职权为协调高级机构与各国政府的行动,并充任高级机构的政治顾问。法院由成员国政府共同协议任命7人组成,专司联营内部的纠纷问题。

到1954年,煤、焦炭、钢、生铁和废铁的贸易壁垒几乎全部消除。制订了一系列共同规章,监督卡特尔及调整企业合并。中央执行机关决定价格,规定生产限额,并被授权对违反条约规章的企业罚款。1967年,它的部长理事会和委员会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相应机构合并。

28 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 群众路线

1951年5月,毛泽东就如何镇压反革命撰文《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文中他着重谈了实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五方面内容:

(一) 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和复杂的斗争。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召开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做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凡是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没有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错误的。凡是大体上遵照了这个路线,但没有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大体上正确但不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这个工作路线是继续深入镇压反革命工作和取得完满胜利的保证。在今后镇反工作中必须完全遵照这个工作路线,其中最重要者为严格地审查逮捕和判处死刑名单,广泛地做好宣传教育,做到了这两点,就可以避免犯错误。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二) 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这里的原则是:对于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此外还应明确地规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三) 为了防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发生“左”的偏向,决定从六月一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处理。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

(四) 对于“中层”和“内层”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从现在开始,有计划地加以清查。决定遵照中央指示,在今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其目的是弄清情况和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其方法是学习镇反文件,向着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号召他们中间有问题的人(不是一切人)用真诚老实的态度,交清历史,坦白其隐藏的问题。这种坦白运动必须由首长负责主持,采取自愿原则,不得施行强迫。每一单位时间要短,不要拖长。其策略是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以待冬季的进一步清查。对于首脑机关,公安机关及其他要害部门,则须首先加以清查,并取得经验,以资推广。在政府系统、学校和工厂中进行此种清查工作时,必须有党外人士参加此种清查工作的委员会,避免由共产党员孤立地去做。

(五) 全国各地,必须在此次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普遍地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此项委员会,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为单位经过人民选举组织之,委员人数少者三人多者十一人,必须吸收可靠的党外爱国分子参加,成为统一战线的保卫治安的组织,此项委员会受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的领导,担负协助人民政府肃清反革命,防奸、防谍,保卫国家和公众治安的责任。此项委员会,乡村须在土改完成之后,城市须在镇反工作开展之后,有领导地进行组织,以免坏人乘机侵入。

毛泽东的文章,为更好地镇压反革命指明了方向。

29 爱国捐献运动

为加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战斗力,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在一切方面都能完全压倒敌人,困难的只是我们的飞机、大炮等武器还不够多。为了使我国志愿军,能够以更小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早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以更多的飞机、大炮、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等武器供给前线。因此总会号召全国各界爱国同胞们,不分男女老少,开展爱国的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运动,用新增加的收入的一部或全部,购置飞机、大炮等武器,捐献给志愿军和解放军,来加强他们的威力,巩固我们的国防。

6月7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的《关于捐献武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具体办法的通知》。强调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必须不分城乡、阶层和信仰进行充分的宣传和细致的组织工作。要求运动在工厂同增加产量、降低成本相结合 在乡村同深耕细作及发展家庭副业相结合。所有捐献,一律以人民币计算,委托各地人民银行代收,并由人民银行汇集上解。为便利拟定捐款人民币 15 亿元,即作为战斗机 1 架,50 亿元作为轰炸机 1 架,25 亿元作为为坦克 1 辆,9 亿元作为大炮 1 门,5 亿元作为高射炮 1 门。并为各地捐献的武器,将冠以捐献单位的名字,作为光荣纪念。11月16日,中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关于争取按期完成武器捐献缴款工作,并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的通知》指出,由于全国各界同胞发扬爱国主义热忱,及各方面的有力领导和配合,截至11月15日,全国人民认捐总数已达4万余亿元。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公布关于加强抗美援朝工作决议约半个月时间,即收到捐款1万余亿元。根据总会1951年12月27日《关于进行结束武器捐献运动工作的通知》中由“抗美援朝总会发布各大行政区、各省和各大城市的捐献总数”的规定正式公布,截止到1952年5月31日的收款数总计为5565062306834元人民币,折合战斗机为3710架,(每架15亿元计算)。正如总会《关于全国人民捐献武器运动的总结》中指出的,经过一年来全国各界爱国同胞的努力,已大大超过原定计划,胜利地结束了。

这次爱国捐献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加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威力,使之建立起一支实力日益强大的空军,加强了自己的火力,更有效地打击美国侵略者。与此同时,由于坚持和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相结合;坚持和深入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又加强了国家的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提高了人民的爱国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加强了全国人民的团结和国际主义教育。

30 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

1951年6月1日,政务院第八十七次政务会议通过了《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

该条例共20条,其规定的国家机密包括:一切国防及军事计划 and 建设设施;一切武装部队的编制、番号、实力、装备、驻防、调动、部署及后勤兵工建设等机密事项;外交机密事项;公安机密事项;国家财政计划,国家概算、预算、决算及各种财务机密事项;国家金融计划、贸易计划、海关计划及金融贸易、海关事务等机密事项;铁路、交通、邮政、电信之机密事项;内务和人事等机密事项;国家的各种经济建设计划及经济建设事业之机密事项;资源调查、地质勘探、气象测报、地理测绘等机密事项;科学发明、发现,文化教育及卫生医药之机密事项;立法、司法、检察和监察事务之机密事项;民族事务和华侨事务等机密事项;档案、密码、印信及一切有关国家的机密文件、电报、函件、资料、统计、数字、图表、书刊等;一切有关国家机密的机构编制、仓库、场所等;一切未经决定或虽经决定尚未公布的国家事务;其他应该保守国家机密的事务。条例还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武装部队均须成立保密组织,负责领导保密工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机关、学校、工厂、矿山、仓库等,得视其需要建立保守国家机密的制度及保密组织;以上各机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保守国家机密;各单位应注意对所属人员进行保守国家机密的教育;经

管及承办国家机密的工作人员须经过人事部门切实严格审查,选拔确实可靠者担任。

该条例还对重要会议的内容的保密,密码、无线电台的设置,国家大政方针的新闻报道,党政军机关刊物的保密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条例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的监察机关,须将保守国家机密的监督工作列为经常性任务之一。对于泄露出卖国家机密的人员,均以反革命罪论处;因疏忽泄露国家机密或遗失国家机密材料的人,视其情节轻重给以处分;凡为保守国家机密作出成绩的人,则均给以表扬或奖励。

该条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制定的关于保守国家机密的法律。它的颁布施行,对当时提高全国人民保守国家机密的认识,确保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健全法制均具有重要意义。

31 全国合作社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工作会议

全国合作社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工作会议于1951年6月6日—26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手工业的生产情况。根据会议的统计,1950年全国有生产合作社1300个。这些合作社经营的生产事业有纺织、针织、食品加工、农具制造、服装制鞋、日用品制造和小型矿产等。这些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的已经建立了经济核算制度、技术管理制度、较合理的工资制度,并订立了劳动公约,组织了生产竞赛,因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产量,降低了生产成本,积累了生产资金,改进了生产,举办了文化福利事业。但是,由于各地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对于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还不够重视,对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方针、政策认识不统一,干部经验也还不够,致使许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还没有走上正轨。

从上述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手工业生产在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占着不可忽视的比重,而且还正在发展着。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原因是:土地改革完成,城乡交流扩大,农民购买力迅速提高,农民对工业品的要求大大增加,而近代化工业生产的速度一时还赶不上农民购买力的增长。所以发展手工业,用手工业品交换农产品,以减少工农产品剪刀差价的扩大,保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当前迫切需要

解决的重要问题。会议代表认为,应该重视手工业生产合作事业。但是,由于干部、技术条件和工作经验不足,目前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应当稳步进行。已有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应加以巩固,总结经验。未成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地区,应立即有重点地试办。

为避免过去的缺点,会议确定今后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是:①过去大多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为了解决大、中城市失业工人的生活困难而组成。今后应把工作重点放在组织中、小城镇和农村中的独立小手工业者和家庭手工业者上面,以改变工作被动,困难很多的局面。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当前任务是:组织供销业务,通过供销业务发展生产,不应过早地组织集体生产和机器生产。会议规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今后的努力目标是:统一供销业务;统一计算盈亏;盈余按社员劳动的多少来分配;统一产品规格;统一原料、成品的定量标准,实行社员按期交货责任制;统一计件工资标准和支付办法。

此外,会议还草拟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交各地试行。

32 第一次全国中等技术教育会议

为培养适合新形势的建设人才,为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作准备,中央教育部于1951年6月12日到6月22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中等技术教育会议。

教育部部长马叙伦致开幕词。他说,这次会议是和我们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有重大关系。目前,全国中等技术学校学生远远赶不上各建设部门的需要。这种情况是与我们国家建设需要极不相称的。我们这次会议主要地要解决的问题:第一,要明确规定中等技术教育的方针和任务,第二,我们对中等技术学校的领导关系和经费问题应作明确的规定,同时要拟定出一个专业设置计划的纲要来。第三,目前中等技术学校的课程,还没有统一的规定。因此,对学校的课程原则,普通课的科目和教学计划都需要在这次会上讨论,应该作出明确的规定。针对各类中等技术学校都感到师资缺乏的问题,因此师资的来源与培养,也希望大家多多交换意见。他最后说,中等技术教育问题,关系方面很广,问题很复杂,必须各方面通力合作,从全局着眼,从实际出发,才能逐步地得到妥善的解决。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作了《积极整顿与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目前中等技术教育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指出:中等技术教育的基本方针是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政策,从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整顿与发展中等技术学校。学校的任务应该是用

理论与实际相一致的方法,培养大批具有一般文化、科学的基本知识,掌握现代的生产技术,全心全意地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初、中级技术人才。因为国家急迫和大量需要初、中级技术人才,所以我们对中等技术教育应该采取积极整顿和发展的途径,应该多种多样地发展各类和各级的中等技术学校。对解放前原有的中等技术学校必须加以整顿。对私立中等技术学校,必须积极扶持、整顿改造。对于解放后新创办的技术学校,也必须加以提高。他强调我们的国家是由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必须重视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初、中级技术干部,最后他提出了对领导关系、课程教材、1951 年设置计划和加强领导技术性的私立补习学校等几个方面的具体意见。

这次会议明确了全国中等技术教育以调整、整顿和有条件地发展为当前的实施方法。会议认为目前首要的任务是对现有中等技术学校应切实地加以调整、整顿,使之改造提高,以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但是具备了一定条件的地区,部门或学校则应作适当的发展。关于中等技术教育的学制问题,会议确定大体上分为初级与中级两种,以发展中级为主,还要大量举办多种多样的短期训练班,以适应当前建设的迫切需要,对中等技术学校分类、分科问题,会议认为要逐步走向专门化、单一化;但在目前生产事业还不太发达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培养综合性人才。对领导关系问题,会议认为教育部门和有关业务部门之间必须贯彻统一领导、分工负责、互相帮助、密切配合的精神,把学校办好。为便于学校的发展,便于理论和实际结合,各类各级中等技术学校以改归业务部门直接领导为原则;对各地现有的私立技术补习学校,应加强领导,使其能适合实际工作的需要。会议决定在中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央、各大行政区、省或直辖市分别成立中等技术教育委员会，负责研究处理各项重大问题。会议还指出，吸收工人、农民及革命干部学习技术，使他们成为技术人员中间的骨干力量，这是培养国家生产建设干部的重要环节。

1951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短评。短评认为，积极地整顿与发展中等技术学校，为国家建设事业培养大量中级技术人才，尤其是重视从革命干部和工农劳动模范中集中一批青年来学习技术，把他们培养成为技术人员的坚强骨干，是合乎我国的性质和需要的正确的方针。中等技术教育有很多问题，不可能通过这次会议一次都能解决。但只要能解决中等技术学校的办学方针、任务、领导关系、经费等重大问题，那么新中国的中等技术教育就会有正确的方向。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会议讨论了妥善安置数以百万计的高小毕业生问题，一致同意自下而上逐级包下来，用各种办法使他们学得一技之长。会议修正通过了《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中等技术学校暂行实施办法》、《关于加强领导私立技术补习教育的指示》、《各级中等技术教育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等几个草案。

33 美英哈里曼山顶阳台会谈

1951年6月21日伊朗接管英伊石油公司后,英国政府要求国际法庭约束伊朗政府在作出判决前,不得实行国有化计划。可伊朗不但根本不承认国际法庭有权审理伊朗主权范围内的事务,而且还拒绝派代表出席国际法庭的审理会议。同时,伊朗要求各油船船主在伊朗国营石油公司的收据上签字,否则,立即停止装油。英伊石油公司还阻挠伊朗政府留用英籍职工。与此同时,英国派遣军舰在波斯湾游弋,对伊朗进行武力威胁。

伊朗局势发展使美国政府顿感紧张。艾奇逊当即电告伦敦,英国的强硬做法“将引起一场灾难。我们将面对这样的可能性 在伊朗发生经济崩溃,共产党发动政变,以及西方失掉伊朗的石油,同时也有这种可能性,即一旦英籍人员撤退,他们将永远不再被允许回去。”而6月30日,英国政府公开宣布要撤走油船和进一步关闭公司设施,阿巴丹炼油厂停工在即。这时,艾奇逊确信,事态继续恶化,将有利于苏联,他说:“我确信双方正在这场俄国的轮盘赌中把自己的命运推到自杀的地步。”在这种背景下,艾奇逊要求与刚从伦敦归来的弗兰克斯大使会谈。

1951年7月4日下午,艾奇逊、白宫对外政策顾问哈里曼、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保罗·尼采、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吉等人与英国大使弗兰克斯在哈里曼那幢俯瞰波托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
9
5
1
年
的
故
事

马克河景色的山顶阳台寓所讨论“由伦敦政府的威胁所造成的后果”。弗兰克斯说,英国政府和公众把英伊争端看作是一群伊朗狂人有意掠夺英国,是对体面、合法性和理智的横蛮挑衅。他认为事态严重,令人气忿。同时,他也怀疑对摩萨台加大压力是否妥当。经过讨论,双方作出了某些一致的结论,即如果英国在阿巴丹从南部进行武装干涉,很可能导致苏联在阿塞拜疆进行武装干涉,以支持他们对石油开采权的要求,因为那是伊朗政府曾经谈判过,但被议会所否决了的。即使伦敦有些人可能对于在伊朗划分势力范围并不感到震惊,但是这种做法既不能使英国获得对油田的控制,而且将在联合国内引起一场争吵。如果摩萨台或者比他更为极端的政府邀请俄国出面干预,希望迫使双方外国军队都撤出时,结果可能是英国人离去和俄国人进来。总之,武装干涉只会造成极大的麻烦。会议结束时,艾奇逊提议为了制止“外来干涉和可能引起的灾难,哈里曼应该前往德黑兰,作一次恢复谈判的尝试”。

7月8日,杜鲁门致函摩萨台,说希望能找到既承认国有化原则又符合英国利益,对双方都有好处的解决途径。杜鲁门还认为,英伊谈判破裂促使石油营业趋于停顿,这不仅给伊朗,还给整个世界带来损失。所以,他建议为了避免这场灾难,愿派遣哈里曼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前往德黑兰,就当前形势进行磋商,促使英伊恢复谈判。

34 1951 年朝鲜战场三大战役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从 1950 年 10 月 25 日到 1951 年 6 月 10 日,连续进行了五次大的战役,把美国侵略者打回到“三八线”以南,稳定了朝鲜战局。其中,后三次发生在 1951 年。

第一次战役,从 1950 年 10 月 25 日开始,到 11 月 5 日结束。此次战役共歼美李军 1.5 万余人,将北进之敌赶回到清川江以南。这一胜利,粉碎了敌人在感恩节前占领整个朝鲜的狂妄企图,鼓舞了朝鲜军民的斗争信心,使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站稳了脚跟,并取得了同美李军作战的初步经验,为尔后的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次战役,从 1950 年 11 月 25 日开始到 12 月 24 日结束,历时一个月,共歼敌 3.6 万余人。不仅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全部地区,而且还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部分地区。

第三次战役,从 1950 年 12 月 31 日开始,至 1951 年 1 月 10 日结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协同下,对占领朝鲜“三八线”阵地的“联合国军”发起的进攻战役。第二次战役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迫撤至“三八线”附近地区,一面利用其既设阵地进行防御,重点放在议政府和汉城地区,兵力共约 20 余万人。同时,又抛出“停火建议”,企图争取时间调整部署,重整军队再行北犯。为粉碎敌人的这种阴谋,中朝人民军队决心不予敌以喘息之机,集中 31 万余人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的兵力,发起第三次战役,突破“三八线”,并歼灭部分敌军。1950年12月31日17时,中朝人民军队发起进攻,各突击集团实行正面突破、穿插迂回、分割围歼的战略战术,迅速突破了敌军的阵地。之后,志愿军右翼集团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向东豆川、汉城地区实施主要突击,至1951年1月2日拂晓,突入敌防御纵深达15至20公里,前出到议政府以北的汶山、仙岩里地区,正面敌军惧歼南逃。志愿军左翼集团向加平方向实施突击。1月1日,歼灭南朝鲜军第二师两个团和第五师一个团的大部。2日,先后攻占了加平、春川。在东线发起进攻的朝鲜人民军一部,向洪川、横城方向实行渗透迂回,前出到新岱里地区,迫使南朝鲜军第三师南逃,人民军继而向原州等地发展进攻,有力地配合了整个战线上主力方向的作战。1月2日,“联合国军”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开始全线撤退,中朝人民军队乘胜扩张战果。3日,在高阳、议政府以西地区歼灭英国皇家奥斯特来复枪团第一营、英第八骑兵团直属中队及英第二十九旅两个连。1月4日,在议政府以南水落山击溃与歼灭美军一部,并解放了汉城。5日,中朝人民军队渡过汉江,至8日,占领了水原、利川、骊州、原州一线。这时敌军已撤至“三七线”附近。中朝人民军队识破了敌有计划向南退却,诱己深入待机反扑的企图,加上运输线延长,供应困难,遂于1月8日果断地停止追击,战役即告结束。这次战役,共歼灭“联合国军”1.9万余人,解放了汉城及“三七线”以北较大的地区,粉碎了敌军固守“三八线”既设阵地,以“停火”为幌子,准备北犯的企图,扩大了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

第四次战役,从1951年1月25日开始至4月21日结束,历时87天。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朝鲜

“三八线”南北地区进行的防御战役。“联合国军”在中朝人民军队第三次战役的打击下，败退到“三七线”附近地区。为挽回其失败的影响，缓和内部矛盾，稍经整顿补充，于1月25日以汉城为主要突击方向，对中朝人民军队发动全线进攻。这次进攻由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官马修·李奇微统一指挥，集中了16个师另3个旅、1个空降团和大量航空兵、炮兵、坦克兵共23万余人，采取了稳扎稳打、齐头并进、主力靠拢的战术，企图乘中朝人民军队连续作战未得休整补充的机会，将中朝人民军队打回到“三八线”以北地区。

中朝人民军队为制止敌军进攻，争取时间掩护后方二线兵团的集结，在未及休整补充的困难情况下，对进攻之敌实施积极的防御作战。整个战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月25日开始，中朝人民军队以三个军在汉江南北地区依托野战工事进行防御作战。抗击了“联合国军”在大量航空兵、炮兵和坦克支援下的凶猛进攻，使其14昼夜只前进了18公里，将进攻之敌阻止在汉江以南的内飞山、文衡山、武甲山、扬子山一线，有力地钳制了敌人主要进攻集团。2月11日，东线南朝鲜军第八、第五、第三师进至横城以北、以东地区，孤立突出，侧翼暴露。中朝人民军队乘机发起反击，一举歼灭南朝鲜军第八师及美军第二师一个营。中朝人民军队又乘胜以一部兵力向砥平里之敌发起进攻，另一部兵力向原州方向发展，并于前进中歼灭南朝鲜军第三、第五师各一部。至15日，由于攻击砥平里受挫，“联合国军”的援兵已到，其另一部已在原州集结，中朝人民军队遂停止进攻。第二阶段，2月17日，中朝人民军队在全线转入运动防御。此时此刻，中朝人民军队采取在兵力配备上前轻后重、火力配备上前重后轻的战术原则，对敌实施宽正面、大纵深的节节阻击，大量歼灭了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进攻之敌。3月14日,为了保持主动,中朝人民军队主动撤离汉城。随后,又主动地逐步转移至“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至4月21日,将“联合国军”扼制在开城、涟川、华川、杆城一线。同时,敌军发现志愿军二线兵团已经集结,便停止进攻,第四次战役遂告结束。这次战役,中朝人民军队共歼敌7.8万余人,使敌人平均每天前进不到1.5公里,从而为自己赢得了时间,有利于战略预备队的集结,为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次战役,从1951年4月22日开始至6月10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对“联合国军”进行的反击战役。在第四次战役中,“联合国军”即在正面进攻的同时,积极准备在中朝人民军侧后方登陆,企图以此配合正面进攻,将战线向北推进到平壤、元山一线。为粉碎“联合国军”这一企图,夺取战场上的主动权,中朝人民军队一面进行防御作战,一面加紧进行反击作战准备。4月下旬,志愿军第十九、第三兵团先后入朝并完成集结后,中朝人民军队紧接着第四次战役发起反击作战的进攻,举行了第五次战役。战役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4月22日开始,中朝人民军队迅速突破了“联合国军”西线防御阵地,志愿军一个军突入敌防御纵深30公里,于24日到达加平以北地区,将“联合国军”割裂成东西两块,严重威胁其翼侧,其主力被迫后撤。中朝人民军队遂连续进攻作战,4月28日,“联合国军”撤至汉城及昭阳江以南地区重建防线。29日,中朝人民军队即停止进攻。在这期间,中朝人民军队先后歼灭美军第二十四师、英军第二十九旅,南朝鲜军第一、第六、第五师各一部,共2.3万余人。第二阶段,从4月30日开始,“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在东西两线均以部分兵力实施反攻。中朝人

民军队经调整部署后,乘东线南朝鲜军态势突出,翼侧暴露之机,于5月12日以一部兵力对议政府地区实施佯攻,另外集中主力,于5月16日黄昏在东线发起反击。17日,经猛烈进攻,中朝人民军队在于论里、上南里地区击溃南朝鲜军第五、第七两师,歼其五个营,并将南朝鲜军第三、第九两师包围在县里地区,20日将其大部歼灭,缴获了全部重装备。此时,美军第三师已由西线急调至东线,南朝鲜军第八师也调至东线,建立起纵深防御。中朝人民军队于21日停止进攻,结束了第二阶段的作战。这一阶段,中朝人民军队共歼敌1.8万人。第三阶段,从5月23日开始,中朝人民军队为进行休整补充,开始向“三八线”转移。“联合国军”乘机以13个师的兵力分路以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组成“特遣队”向北猛烈反扑。中朝人民军队一度处于被动,东线一个师由于部署不周,遭受重大损失。为取得主动,中朝人民军队迅即展开八个军进行阻击作战,歼敌3.6万余人。6月上旬,“联合国军”在遭到严重损失后,被迫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转入防御。第五次战役至此结束。这次战役,中朝人民军队连续奋战50天,粉碎了“联合国军”把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的计划,歼灭“联合国军”8.2万余人。从此以后,战争双方转入战略对峙,美国统治集团被迫于7月接受停战谈判。

上述五次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其中包括美军8.8万余人,把美李军从中朝边境重新赶回到“三八线”附近,狠狠地打击了美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35 抗美援朝作战方针和指导原则

1951年6月25日,彭德怀撰文《关于持久作战方针和今后作战的指导原则》,就近一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进行了总结,并对以后的战局进行了瞻望。

关于五次战役的基本总结,彭德怀说五次战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把敌人从鸭绿江边打退到汉江,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0几万,其中美军伤亡10万至14万人。这不仅大量消耗了美帝的人力、物力,而且使美军士气降低至一定程度,因而引起美国内部及各帝国主义间的争吵与混乱,促进了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斗争的积极性。同时,朝鲜人民军和我们取得了同现代化军队作战的经验,提高了军事水平,增进了朝鲜和我国的国防力量,奠定了朝鲜战争胜利的基础。

但由于我们在作战指导上犯有若干错误,部队干部军事水平一般不高,缺乏同现代化敌人作战的经验;敌人拥有装备的优势,严重限制了我军的机动;加上朝鲜三面环海,地形狭长,因而在五次作战中,虽已取得伟大胜利,但未能更多地歼灭美帝的有生力量。

彭德怀说由于下述的主客观条件的规定,目前朝鲜战争不能速胜,而必须采取持久作战的方针:

①敌人装备优良。②美英军的士气还未低落到应有的程度。③朝鲜三面环海,海防不强;中间道路少,公路铁路多靠海岸线,在敌海空军威力圈内;地形又不便于大部队高度

机动。④朝鲜物产有限,我军不能就地补给,必须由国内经长距离供应,特别是越南进运输线越长,困难越多。⑤朝鲜群众工作尚未深入,地方群众性武装尚未建立,特务、反革命在内地到处活动,不仅容易暴露我军行动,且必须分兵控制,巩固后方。⑥我军参加朝鲜战争是被迫仓促应战,装备技术、运输工具、物资补给、后备兵力组训以及各种组织等,都缺乏应有的准备。⑦我们部队干部军事水平一般不高,必须亲自经历,才能逐渐积累经验,逐步提高,所以许多别人已犯过的错误总会重犯后才能纠正。

由于上述各种原因,并且经过了五次战役的证明,目前想一下消灭美英军几个师是不可能的。美英军主力尚在,朝鲜战争的结束是很困难的。因此,必须给敌人以相当的消耗削弱,争取时间加速我军的必要准备,以逐渐改变主客观情况,而后才能大量歼灭敌人。因此,朝鲜战争不可能速胜而必须采取持久作战的方针。

关于今后作战的指导原则,彭德怀说主要有:①有阵地地稳步前进,不要冒进。②不断轮番,各个歼敌。③反复拉锯,逐渐消耗敌人有生力量。④做好必要的准备再战,不打仓促无准备的仗。⑤由小敲小打,争取逐渐发展到大打。⑥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有重点地钳击敌人。⑦机动灵活,量力而行。⑧攻防密切结合,双管齐下。⑨战略上的持久战,战斗上的速决战。⑩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正面作战。⑪大力开展敌军工作,切实作好瓦解美伪军的政治工作。

关于朝鲜战争发展的前途,彭德怀认为有以下7点:

一、由于美帝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与世界人民为敌的,而朝鲜人民与我们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代表人民愿望的,这个战争的性质就决定了这个战争发展的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
9
5
1
年
的
故
事

全部规律。

二、敌军士气虽尚未低落到应有的程度,但由于所进行的战争本质是侵略性的,无论任何欺骗压制,它的士气是无法长期维持的。在我们继续打击消耗敌人,加紧对敌瓦解工作,以及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对下,必将使敌军士气加速降低下去。

另一方面,我们和朝鲜人民军目前虽遇到一些可以克服而尚未来得及克服的困难,影响了部队一些思想情绪;但是只要讲清道理,适当解决部队的实际问题,人民军和我们部队的士气是会越打越高的。

三、美帝目前拥有优势装备,占着许多便宜,严重限制着我军的机动。但是在我军整理与掌握了过去这段斗争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军事水平,改善了可能的条件,如:增加反坦克火器,建设步兵随伴炮兵,增加高射火器、自动火器,加强运输工具,提高技术,以及改进后勤工作,保证部队必要的适时供应等,必将可更迅速地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四、美帝国主义侵略战线太长太宽,被迫兵力分散,因而人力物力日益陷于困难,特别是它的侵略野心同它的实际力量是很不相称的。这种情况从下面事例可以表现出来:

①6月1日美国政府训令美国代表奥斯汀通知联合国,声明由于“美国全部可用的军事力量现在都钳制在朝鲜和西欧”,目前不能为计划中的联合国“集体安全部队”提供任何军队。

②塔夫脱曾宣布,如果美国国防预算超过700亿,那就是冒极大风险。可是华盛顿6月8日电,接近杜鲁门的人士说:“美国国防预算目前达每年600亿美元,但并未包括朝鲜战费在内。”而“朝鲜战争预算就需100亿至150亿美元,甚至

需 200 亿美元。”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刊论文：“美国在侵朝战争中损失的人员和金钱已比 1942 年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所损失的还要大。”“一年内死伤总数已达 7 万多人（此数已被大大缩减），而对日战争第一年只死伤 5.7 万人。”“花费的金钱比太平洋战争的一年所花费的多一倍。目前已运往朝鲜的军事装备 1500 万吨，而 1942 年送往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装备仅为 650 万吨。”

③朝鲜战争已经把美国推到不可救药的危机之中。杜鲁门 6 月 13 日广播，将继续采取“管制”办法以抑制日益加深的通货膨胀。并且指出，将进一步“增加捐税”，剥削人民。

《人民日报》社论指出，1951 年每一个美国人民所负担的战争支出已达 300 美元，比 1938 年增加了 100 倍。

而我军则拥有大量的后备力量，足够的必需的物资供应（当然由于我们开国不久，各种潜在的资源尚待开发），这是决定战争胜利的基本因素之一。

五、从过去事实证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打一次败仗，就引起美国内部和各帝国主义间的一次争吵与混乱。这种争吵与混乱，一次比一次厉害。美帝国主义陷入长期的消耗战，败仗将日益加多和加大，美帝内部矛盾就必然日益扩大且加深起来。特别是美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的斗争，必将随着战争的持久而日益发展扩大起来。这就将使美帝侵略集团不仅在国际间日益孤立，而且在美国亦必然日益孤立。如最反动的麦克阿瑟也不得不声言，中国有强大的后备力量，是不可能战胜的，承认美国的侵略战争“并没有使他们遭受致命的损害，而我们自己却在遭受重大的损失”。魏德迈哀鸣，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希望。原来支持美帝的一小撮国家,越来越不肯“卖力”了。国内人民的和平运动已变得更有组织了,如东部各州本月内就要举行 500 个集会,纽约从 6 月 15 日至 20 日要举行 100 个集会,另纽约州将举行 200 个集会。

相反,我们在朝鲜战场上每打一次胜仗,就有力地推动着世界和平民主斗争向前发展,国际声援加大,国内人民情绪高涨,因而支援战争更加积极。

六、从第一次到第五次战役经验证明:我们虽然是在缺乏各种应有和可能的准备情况下,被迫仓促应战;虽然是初次出国,缺乏以劣势装备对现代化装备之敌作战的经验,但却能够亲密配合人民军作战,把美英帝国主义从鸭绿江打退到江汉,消灭敌人二十几万,奠定朝鲜战争胜利的基础。今后主客观条件的发展日益对我有利,我们要进一步坚持努力,艰苦奋斗,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七、从上面各种事实和分析,朝鲜战争的必然胜利可说是已成定局了,但实现这个伟大的胜利不是唾手可得的。因为从长远来看,帝国主义虽已是腐朽的、垂死的制度,它必然要走进坟墓;但是它决不会自己走进去,而必然要做疯狂的垂死的挣扎。从当前来看,美帝这个野兽虽在战场上负了重伤,但是,他反咬我们几口的力气仍然是有的,而且它阴险狡诈,随时都准备狠狠地咬我们几口。所以,我们无论从长远的对帝国主义斗争,或是从当前的对帝国主义战争来讲,不经过艰苦复杂、持久顽强的斗争,要想坐等胜利,或随便就可胜利,是完全错误的,是幼稚无知的。特别是如果不百倍提高警惕,随时注意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和甜言蜜语,是会上帝国主义的当的。只有我们具有最大的勇气和毅力,高度的机智和灵活,熬得过最艰苦、最困难的过程,并能寻找有利时

机给这个负伤的野兽以惨重的打击,才会使它知难而退,偃旗息鼓。到那时,最后胜利才会到来,和平才有保障。

彭德怀认真总结了将近一年的战争,提出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和指导原则,尤其是他对战争前途的分析,增强中国人民取胜的信心和勇气。

36 板门店谈判

中朝两国人民军队经过5次重大战役,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三八线”附近,恢复了朝鲜半岛北半部领土。至此,战争双方的军事力量趋于平衡,战线相对稳定,形成了战争相持局面。按照1951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以充分准备持久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作为总的战争指导方针,就是要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双管齐下,打谈结合,以打促谈,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结束朝鲜战争。由于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可能把主要人力、物力长期陷在朝鲜战场,它在遭受打击后,兵力不足,加之远离后方,对能否打赢这场战争失去了信心,只得转攻为守,寻求政治解决朝鲜战争的途径。于是美国开始谋求停战谈判,企图采取军事和政治并用的两手策略达到缔结停战协定、保证“三八线”附近的防线和“强化韩国军队”的目的。

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了“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的建议。中朝两国政府表示赞同。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谈话,表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7月10日,谈判在开城举行。关于谈判议程至7月26日才达成协议。朝中方面组成以朝鲜人民军南日为首席代表的谈判代表团,其中志愿军代表为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根据毛泽东指示,李克农

1951 年的故事

率领一个谈判工作班子前往开城，负责领导整个谈判工作。

彭德怀在一份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指出，朝鲜停战谈判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谈判。它既不是帝国主义者征服了别的国家、强迫别国接受投降条件的停战谈判，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间争夺兼并、相持不决，只好以妥协瓜分殖民地谋得短暂和平的停战谈判，而是一个妄图独霸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在侵略战争中遭受到年轻的新兴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反抗并遏制之后，不得不罢手而勉强接受的停战谈判。所以，美国并不甘心。在战争双方军事力量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美国不愿意公平解决朝鲜问题，而蓄意破坏谈判。所以，从1951年7月起，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开始了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立足于打、以打促谈、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交织进行的尖锐复杂的长期斗争。志愿军领导深深懂得，只有将政治上的揭露与军事上的打击紧密结合，尤其是军事上予以沉重打击，才能迫使美国知难而退，使停战谈判按照有利于朝中人民的方向发展。

开始谈判后，美方大谈其海、空军优势，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种无理要求遭朝中方面坚决拒绝和据理驳斥。美方代表公然进行军事讹诈，扬言要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紧接着“联合国军”于8月18日发动了夏季攻势，并在我后方交通线实施所谓“绞杀战”，企图以军事压力夺取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同时对开城中立区进行挑衅活动。“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被粉碎后，又于9月29日发动了秋季攻势。志愿军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毙伤俘敌军7.9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攻势。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夏、秋季防御作战中，广大指战员充分表现了无比英勇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不怕牺牲的坚强决心，连续粉碎敌人的攻势，取得了歼敌 15.7 万余人的胜利。连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也认为这种攻势在战略上是失败的。此后，“联合国军”在长期对峙作战中，再也不敢冒险发动大规模进攻了，又返回谈判会场。

由于“联合国军”不断在中立区制造事端，所以恢复谈判的会场改设在板门店双方前线之间，会场区由双方军事警察共同维持安全和秩序。10 月 25 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恢复，继续讨论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11 月 27 日，双方就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达成协议。随后进入在朝鲜境内实行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的讨论。1951 年 12 月 11 日，开始讨论战俘安排问题。朝中方面一开始即提出双方停战以后迅速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而美方则一直违反日内瓦公约，坚持强迫扣留朝中被俘人员。1952 年 1 月 2 日，美方提出了“自愿遣返”的原则，企图强迫扣留 10 万余朝中被俘人员作为人质。为达此目的，美方还在战俘营中对战俘进行所谓“甄别”，逼迫战俘拒绝遣返。并且以“就地释放”为名，在 7 月至 10 月间“释放”了 2.8 万人。为推动谈判进展，10 月 8 日，朝中方面提出一个遣返战俘新方案，美方竟拒绝讨论协商，并片面宣布无限期休会，停战谈判陷入了僵局。由于美方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坚持无理的态度，使停战协定的签字推迟了近一年时间。

为尽快地促进停战的实现，志愿军和人民军在 1952 年秋季全线性反击战和上甘岭防御战胜利之后，又在 1953 年夏季举行反击战役，给“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当局以沉重打击，加速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但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却在 1953 年 6 月 17 日起，强行扣留 2.7 万名朝鲜人民军战俘，把他们

中的许多人强行编入南朝鲜军队,公开反对签订停战协定。

彭德怀从北京重返朝鲜前线后,6月20日致电毛泽东,建议推迟签字时间,再次给南朝鲜军以打击。毛泽东认为此举极为必要,复电同意。7月13日起,志愿军发起金城战役,毙伤俘敌7.8万人,攻占金城以南178平方公里土地,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在战役胜利发展中,“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请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疯狂反对停战的李承晚,不得不向美方表示准备实施停战协定的条款。7月19日,双方代表团进入停战协定签字前的各项准备工作。7月24日,谈判双方校正了军事分界线。最后划定的军事分界线,比6月17日南朝鲜当局强迫扣留战俘事件前划定的军事分界线又向南推进了192.6平方公里。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历经两年的板门店谈判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也胜利结束。

37 取缔“圣母军”

所谓“圣母军”是指天主教内部的国际性的反动组织，又叫“圣母御侍团”。新中国成立前，打着“罗马教廷公使”的名义在中国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和他的助手在天津、南京等地的天主教内部秘密建立和发展圣母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天津等地的圣母军在黎培里的指挥下，进行了各种破坏活动，他们大量吸收逃亡地主、恶霸、土匪、特务分子，搜集情报，传布反革命谣言，出版和散布反动书刊，破坏天主教三自革新运动，以欺骗、威吓、暗杀等手段，危害爱国教徒、扰乱社会治安。

1951年天津市公安局侦悉了以天主教荷兰籍神父满世济为首的圣母御侍团的恐怖阴谋活动，6月下旬，于该犯等准备向爱国教徒投掷尖刀进行暗害的前夜，逮捕了圣母御侍团中的反革命分子，将该组织破获。7月13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宣布取缔帝国主义操纵的反动秘密组织“圣母军”的布告后，上海、太原、石家庄、长沙、重庆等地都先后宣布取缔“圣母军”。人民政府对于“圣母军”中的首恶分子，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予以惩办，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在其向政府登记坦白交代，并保证今后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以后，予以宽大处理，对于因受欺骗、威胁而加入的成员，在他们声明退出反动组织之后，不予追究。1951年9月4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根据黎培里秘密组织非法团体圣

母军,以及指使和掩护间谍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的罪行,将其驱逐出境。

通过取缔圣母军和驱逐黎培里,打击了帝国主义以宗教为掩护进行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保障了人民正当的宗教信仰自由。

38 爱国公约运动

1951年6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在总结了人民群众自发地团结和教育自己以支援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后,发出了普遍开展爱国公约运动的号召。从而使这种自发的爱国群众运动逐渐发展成为有领导、有计划的群众运动。

随着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的普遍和深入,订立爱国公约的范围也逐步扩大。为了使运动进一步普及和深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又于1951年7月4日发出文告,号召全国各地普遍检查爱国公约的执行情况。通过检查,提高了广大人民订立和执行爱国公约的积极性,引导广大人民把反帝爱国的斗争意志和热情灌注到各种实际工作中去,更加积极地参加抗美援朝、巩固国防、镇压反革命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订立爱国公约的成千成万的劳动者提出:祖国要什么,我们有什么,前后方一致行动起来就能打败美国鬼子。大批的运输工人、农民和医务工作者纷纷到朝鲜前线去服务,各地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数大大超过前线的需要。许多学生在爱国公约上写着:“学好本领,锻炼身体,随时响应祖国号召。”当增产捐献运动蓬勃开展后,人民群众又纷纷修订爱国公约,把具体的增产捐献计划列为公约的重要内容。

全国有223万以上的工人在订立爱国公约后,改善劳动态度,不断提高技术,积极为国家增加财富。爱国公约也保证了农民们丰产计划的完成。爱国公约运动对于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39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

1950 年 6 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提出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的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51 年至 1953 年,对旧的高等教育制度、教学组织进行的重大改革。1951 年开始对全国的高等院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工作。

对高等院校的院系进行调整的目的是,使高等教育适应国家各项建设的需要,特别是适应国家即将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将高等教育纳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轨道,以培养出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国家建设人才。为此,必须改变旧中国高等教育畸形的学科结构,即文科多而工科少、重工业和制造业更少的状态;改变旧中国高等教育在全国不合理的分布结构,既设校设科无计划、院系重复和人力物力分散的状况。同时,要对高等院校那种仿效欧美的院校体制予以改革。

这样,为了实现这些目的,经中共中央确定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调整的主要原则是:基本取消原有系科庞杂,不能适应培养国家建设干部需要的旧制大学,改造成为培养目标明确的新制大学;为国家建设所迫切需要的系科专业,予以分别集中或独立,建立新的专门学院,使之在师资、设备上更好地发挥潜力,在培养干部的质量上更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将原来设置过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多、过散的摊子,予以适当集中,以便整顿。学校条件太差,一时难以加强,不宜继续办下去的,予以撤销或归并。到1953年底,除农林、医药的系科专业设置尚需继续调整外,全国一般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基本完成。

通过院系调整,极大地改变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面貌,调整工作取得的主要成就是:(1)在改革旧的高等教育制度的同时,建立了高等教育的新体制。新体制的特点:一是本科高等院校固定划分为三类,即文理科的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多科性理工学院校;单科性院校;二是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归教育部门管理;多科性和单科性院校一般归中央有关业务部门管理,少数由教育部门管理;三是取消了旧大学校与系之间的院一级体制,把原来的校(大学)一院一系一组四级教学行政组织,改为校(大学或学院)一系两级教学行政组织,系以下按专业设立的教研室(组),不作为一级行政组织;四是改变了旧大学只设系科不设专业的制度,由教育行政领导部门确定各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许多专业是同国民经济的业务部门对口设立的,高等院校则按专业培养人才。(2)改变了旧高等教育的结构,形成了我国高等院校的分类与地区分布的基本格局。到1954年初,全国原有的211所高等院校调整为182所,大体均衡地分布在当时的六大行政区内。(3)改变了旧高等教育重文理轻工科的状况;保证了当时为奠定我国的工业基础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发展普通教育对专门人才的需要。但是在调整过程中出现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调整过程中出现要求过急、摊子铺得过大等冒进现象;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过于强调学习苏联经验,在实际工作中有不结合我国实际简单照搬的现象。

40 中国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

二战结束后,在处理日本的问题上,盟国之间出现了两种政策:一种主张实行日本民主化,肃清日本军国主义,缔结真正的由一切有关国家参加的对日和约,并撤退一切外国占领军队,以保证日本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平的国家。这一政策包括在联合国宣言、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1945 年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设立盟国对日委员会的决定,以及远东委员会对投降后日本的基本政策的决议等有关国际协议中。而另一种与之相反的政策是美国主张的,强行制造一个把中国和苏联排斥在外的单独对日和约。中国站和平民主政策一边,坚决遵守一切有关日本的国际协定,主张实现日本民主化,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缔结真正的、由一切有关国家参加的对日和约,并从日本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就对日和约问题曾于 1950 年 12 月 4 日发表声明,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应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台湾当局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对日和约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中国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从而表明了中国人民在对日问题上的鲜明立场。

1951 年 7 月 12 日,美在华盛顿和伦敦同时公布对日和平条约草案。美国政府又于 7 月 20 日发出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通知,准备签订对日单独和约。8 月 15 日,周恩来外长发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美英两国政府所提出的对日和约草案是一件破坏国际协定、不能被接受的草案,而将于9月4日由美国政府强制召开、排斥中国在内的旧金山会议也是一个背弃国际义务基本上不能被承认的会议。声明说,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经过了最长期的艰苦奋斗,牺牲最大、贡献最多,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对日和约问题上是最有合法权利的发言者。可是,美英对日和约草案竟把中国排斥在外,而在它关于处理盟国及其国民于战争时期在日本的财产和权益的条文中,规定起讫日期为1941年12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将1941年12月7日以前中国人民独力进行抗日那一时期完全抹煞。美英两国政府这种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敌视中国人民的非法蛮横行为,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并将坚决反对到底的。关于领土问题,对日和约草案虽然规定日本放弃其对于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一切权益,但并未规定应遵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其目的是为美国长期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但中国人民却绝对不能容许这种侵占。同时,和约草案又故意规定日本放弃对南威岛和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而亦不提归还主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此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威岛和西沙群岛之不可侵犯的主权,不论美英对日和约草案有无规定及如何规定,均不受任何影响。声明还指出,对日和约的最主要目标,是使日本成为爱好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国家,并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以保证日本不再度成为威胁亚洲与世界和平安全的侵略国家。但是,草案不仅对此毫无保证,它还破坏了波茨坦公告及远东委员会对投降后日本的基本政策中关于这类问

题的规定。草案在安全和政治条款上,对于日本军队没有任何限制,对于残存的和复活的军国主义团体没有规定取缔,对于人民民主权利没有任何保障。美国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控制日本,而且更加紧对日本的经济控制。然而,由于草案是敌视中苏和威胁亚洲国家的对日单独和约,所以它的经济条款也就是排除中苏的,并且是排除不能接受这一和约草案的许多国家的;同时,美国政府更可利用它经过美国公司在日本经济中已经取得的特权及它对于日本和平经济的各种限制,使这些经济条款更适应于它的垄断要求。关于赔偿问题,原则上草案承认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及痛苦给予赔偿,但又说如欲维持健全的经济,则日本缺乏赔偿能力和履行其他义务能力。声明指出,美国不让其他曾受日本侵略损害的国家向日本要求赔偿,就是为保存日本的赔偿能力和履行其他义务的能力,继续供给美国独占资本的榨取。只要美国遵守国际协定的义务,在和约签订后早日撤退占领军,放弃重新武装日本和恢复日本军事工业的计划,取消美国公司在日本经济中的特权,取得对日本和平经济及日本对外正常贸易的限制,则日本经济就会真正健全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意看到日本能够健全地发展和平经济,并恢复和发展中日两国间的正常贸易关系,使日本人民的生活不再受战争的威胁和损害而得到真正改善的可能。同时,那些曾被日本占领、遭受损害甚大而自己又很难恢复的国家应该保有要求赔偿的权利。声明强调说,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完全破坏国际协定,损害对日盟国利益,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并不利于日本人民,所以这个和约草案是中国人民及曾被日本侵略的亚洲人民所绝对不能接受的。美国政府为了便于迅速签订对日单独和约,于是在召开旧金山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会议的通知中，也公开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旧金山会议是不可能签订对日共同和约的，即使美国及其附庸国家径自签订了对日单独和约，也是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承认的。

9月8日，美国政府在旧金山会议上签订了对日单独和约。18日，周恩来外长再次声明：“美国政府在旧金山会议中强制签订的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对日单独和约，不仅不是全面和约，而且完全不是真正和约，这只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中国政府绝对不承认旧金山对日和约。

1952年4月28日，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同时宣布旧金山对日和约自该日起正式生效。同日，日本政府和台湾签订了所谓《和平条约》。5月5日，周恩来外长发表关于美国宣布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生效的声明。声明重申，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坚决不予承认，并坚决反对公开侮辱和敌视中国人民的日台所谓的“和约”。

41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

中国革命胜利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帝国主义在亚太地区加紧建立军事同盟，用以包围中国和镇压亚太地区的民族民主运动。美国就安全问题与澳、新两国草签条约后，这引起了菲律宾对美国的强烈不满。菲律宾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样，害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当美国打算搞一个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太平洋地区集体防务安排时，菲律宾自然是乐意参加的。后来这种安排未能实行，美国要同澳新、同日本分别签订防务条约，把菲律宾撇在一边，菲律宾便愤愤不平了。7月17日，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在接见美国驻菲大使科文时，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要求与美国正式结盟。

鉴于这种形势，杜勒斯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一起商讨对策。布雷德利表示，军方原先反对政府再与菲律宾签订条约的理由不充分，他说，如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必须改变美国单方面为菲律宾承担义务的做法，参谋长联席会议将不会反对。杜勒斯认为，只要菲律宾同意签署对日和约，美国再与菲律宾签订一个双边共同防务条约是可取和恰当的。新的条约将不影响现有的美菲军事协定，也不建立交换情报和联合制订军事计划的机构。在这以后，国务院经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等各方磋商，同意在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之前先解决与菲律宾签约的问题。8月9日，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腊斯克把美菲谈判签订双边防务条约的情况告诉澳大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利亚驻美大使斯彭德。斯彭德说,澳大利亚赞成美菲缔约,但是,如果美菲条约在承担义务方面比澳新美条约表达得更明确,将会在澳大利亚引起不良反应。腊斯克表示,美国正在考虑的美菲条约的内容是不会超过澳新美安全条约的。在美菲两国讨论条约草案的过程中,美国坚持不使条文“与澳、新、美条约有实质性差别”,甚至条约的名称也要“与澳、新、美安全条约一样”。后来菲律宾要求在名称上突出它作为主权国家与美国保持平等的地位,美国才同意菲律宾的建议,采用了共同防御条约的提法。8月16日,美菲两国就条约草案达成一致意见。

1950年8月30日,经过多次谈判与协商,菲律宾外交部长卡洛斯·罗慕洛同美国国务卿顾问杜勒斯代表各自政府在共同防御条约上正式签字。

42 中华全国学生第十五届代表大会

中华全国学生第十五届代表大会于 1951 年 7 月 20 日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中国学生代表大会。这作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总结了上届会议以来的中国学生运动的经验,确定了中国学生运动的任务,修改了中国学联章程,改选了执行委员会。

中国学联是中国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学生会的联合组织,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学联共召开过 14 次全国代表大会。1919 年 5 月 6 日,即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三天,北平的大、中学生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同年 6 月 16 日,在上海大东旅社召开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成立大会,有 21 个省区的 60 多位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组织和发动了全国学生拒绝和约签字的运动,为五四运动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学联组织全国青年、学生进行了许多革命活动,如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继承德国在东北的侵略特权,1920 年 4 月全国学联决定罢课,要求废除 21 条,收回青岛、山东的一切权利,1925 年的“五卅”运动等等。1929 年 10 月,国民党勒令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停止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学生运动又进入高潮。1935 年进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行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春第十一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召开,重新成立了中国学生联合会,并根据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提出了“勇敢领导全国学生走向民族解放的征途,进一步团结无数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粉碎民族敌人的堡垒”的任务。在解放战争时期,学联号召全国学生反饥饿、争取生存;反内战,争取和平;反迫害,争取自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1949年3月1日—6日在北平,召开了第十四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建立了包括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在内的统一的中国学生组织和它的领导机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

新中国成立后,到1990年8月19日学联第二十一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学联共召开过7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各时期的不同特点,15—20届全国代表大会,对学联章程作了6次修改。1983年8月召开的第20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共4章、15条。新章程在原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对学联组织的领导,强调了共青团对学生会的指导帮助关系。章程强调了学联组织要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的必要性,章程以爱国主义、共产主义为指导,以培养人材、振兴中华为出发点,更准确、鲜明地提出了学联组织的宗旨和任务。章程规定了学联的任务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进同学德、智、体全面发展,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帮助同学进步和成长,做党和政府联系同学的桥梁和纽带,在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同时,维护同学的正当权益等。

全国学联实行团体会员制,凡承认全国学联章程的高等和中等学校学生会,均可成为全国学联会员。

43 第一期治淮工程完工

第一期治淮工程以控制淮河干流洪水的润河集分水闸工程于 1951 年 7 月 20 日胜利完工。

淮河发源于河南的桐柏山区,经河南、皖北、苏北 3 个省区而入长江,全长约 1100 多公里,流域面积约 21 万平方公里。历史上淮河经常泛滥成灾,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1950 年 6 月下旬至 7 月中旬,淮河流域连降暴雨,造成严重水灾,受灾面积 4350 万亩,灾民 1300 万。1950 年 7 月 20 日,毛泽东作出了根治淮河的批示,他指出:“除目前防救外,必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以免去明年水患。”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0 年 10 月 14 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明确提出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和上中下游统筹兼顾以防洪为主的原则。以曾山为主任的治淮委员会于 1950 年 11 月 6 日成立加强对治淮工作的统一领导。

1950 年 11 月中旬,上游、中游和下游的治淮工程先后动工,在这一工程中,先后动员民工 220 多万人,从全国各地前往参加治淮工程有 16000 多人的水利专家、工程师以及各种技术人员。为保证所需物资的及时供应,治淮委员会派出数千名工作干部在水陆交通线上组织了庞大的运输网,仅皖北一区动员来运输治淮器材的船只就有 8000 多艘,大小车辆 7400 多辆。为完成治淮任务,中央人民政府还拨出 10 万万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斤粮食作治淮经费。从1950年11月下旬到1951年7月20日,经过9个月的奋战,第一期治淮工程胜利完工。这一工程除了完成可控制淮河干流72万立方米洪水的润河集蓄洪分水闸和可灌溉9万亩耕地的石漫滩山谷水库外,还修筑堤防2191公里,疏浚河道861公里,湖泊洼地蓄洪工程12处,大小闸坝涵洞92座。共计完成土方工程1.95亿立方米,把这样多的土方筑成高、宽各1米的土墙,有20万公里长,可环绕地球赤道5圈。此外,还完成石工12.6万立方米,混凝土工3万多立方米。

从此以后,结束了淮河流域“大雨大灾,小雨小灾”的历史,一般可达到“大雨小灾,小雨免灾”的目的,初步解除了淮河流域严重水灾的威胁,并为以后进一步根治淮河积累了经验和打下了初步基础。1951年11月,治淮第二期工程开始动工,通过几年治理,淮河地区的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

44 “钢铁”运输线

由于朝鲜人民经受敌人的严重摧残，生活困苦，所需粮食、弹药及一切物资，中国人民志愿军不能就地获取给养。敌人被歼或撤走以后，敌机将遗弃的武器装备和粮食炸掉，因此，志愿军又难取之于敌。志愿军粮弹装备，几乎全靠国内供应，因而运输线上反轰炸斗争的成败，关系到整个战争的胜负。

侵朝美军的战略目标是依仗其优势空军力量，把志愿军的交通运输线切断，割断志愿军的前方与后方，仅 1951 年 7 月，美国空军投入战场的各类飞机、由战争开始时的 500 架增加到约 1700 架。8 月，美军制定了“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计划，企图用 3 个月时间摧毁朝鲜北部的铁路系统，窒息中朝的作战力量，配合停战谈判。8 月 18 日，美军开始实施“绞杀战”，重点轰炸铁路桥梁。9 月起，美国空军把轰炸重点转向朝鲜北部铁路运输枢纽，即清川江以南的新安州——西浦——介川“三角地区”。9 月至 12 月，敌军在“三角地区”几段仅 73.5 公里的线路上，投掷炸弹 3.8 万余枚，使该地区 80% 的时间不能通车。但是，美国空军的“绞杀战”，在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有力打击下，未能达到预期目的。1952 年 1 月，美军放弃对“三角地区”的昼夜轰炸，采取机动地重点轰炸铁路线的两头，封锁中朝军队作战物资的来路和去路。3 月以后，美军又采取所谓“饱和轰炸”战术，即一天 24 小时不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
9
5
1
年
的
故
事

停地集中对铁路线上某些小段实施轮番攻击。美军在封锁铁路线的同时,也加紧破坏公路运输线,采取点与线相结合的办法。在“点”上投照明弹彻夜不停,在“线”上见汽车灯即派飞机袭扰。在公路线上投掷大量的定时炸弹、蝴蝶弹和三角钉等,企图阻止汽车运输。

针对运输线上加快的激烈战斗,1951年1月下旬志愿军就召开了第一届后勤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增调铁道兵、工程兵及二线部队迅速抢修铁路、公路,充实兵站、运输、装卸力量,加紧储备作战物资;同时派空军和高射炮部队对后方实施掩护。会后,志愿军后方部队决定在反轰炸斗争中,建设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驻扎安东的志愿军一个大队在1951年1月下旬首次空战中,首次击落美国飞机。3月中旬,志愿军成立了空军指挥机构。高射炮部队从1月份起也陆续得到加强,到7月下旬已有4个师又3个团另50个独立营。为了对付美国空军对铁路、公路的封锁破坏,志愿军还不断增加抢建抢修力量。到1951年6月底,铁道兵部队已增加到4个师又1个团,还有一个援朝铁路工程总队。工程总部队也增加到8个团又2个营。经过抢建抢修,可以通行的铁路线已由志愿军入朝时的107公里增加到1200多公里。为了加强运输,志愿军还在后方建立了固定的兵站运输线,沿公路干线设置了对空监视哨。监视哨的主要任务是监视敌机的活动,发现敌机临空即鸣枪警报。汽车司机闻警后马上闭灯行驶或就近隐蔽,待敌机过后再开灯速行。以减少车辆的损失和后勤保障力量。

1951年8月到1952年6月,志愿军后方部队和朝鲜军民一道,进行了英勇的反“绞杀战”斗争,志愿军将防空武器,摆在运输上和仓库区,将当时掩护运输的高射炮兵,集中保

卫重点桥梁 铁道兵采取各种技术手段,集中兵力重点抢修大同江、清川江和沸流江上被破坏的几座铁路桥梁 工程兵、汽车运输部队和装卸部队,在桥梁、线路被破坏地点组织漕渡或实施分段倒运,以保持运输不中断。为了争取夜间火车通车时间志愿军抢修简易铁路桥梁。由于简易桥梁承载力不足,于是群众创造了“顶牛过桥法”,即火车头不过桥,将一列车皮顶到桥上和对岸,由对岸另一火车头将它拉走。群众还创造了“爬行桥”,降低桥的高度以缩短桥的长度。有的甚至将桥的高度降到水面以下,成为敌机看不到的“水下桥”。有的桥在通车后立即拆除重要部件,夜晚再搭上,成为昼拆夜架的活动便桥。

从1951年9月至12月,反“绞杀战”斗争全面展开,为打破美军对清川江南“三角地区”的重点封锁,志愿军担负保护平壤以北主要交通线和掩护安州地区机场的任务,采取轮番作战方针,陆续投入作战。到12月底,志愿军共出动5个师,飞机3526架次,击落敌机70架,击伤25架。美军战斗机的活动空域被迫缩至清川江以南,B-29型战略轰炸机从10月起转入夜间活动。为加强铁路和江桥的防空力量,志愿军采取“集中兵力,重点保卫”的方针,将70%的高射炮兵部队用以掩护铁路运输。仅在12月份,高射炮部队就击落敌机106架。为在有限通车时间内通过更多的列车,志愿军采取了“列车片面续行法”,即在一个或几个区段上,组织两列以上列车取一定间隔,连续向一个方向运行,不对开。这就显著地提高了运输效率。在公路运输方面,工程兵普遍加固加宽了原有公路,并开辟了一些新公路。这样,到12月底,志愿军终于打破了美军对“三角地区”的重点封锁。

1952年春,志愿军空军继续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掩护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清川江以北铁路运输线。在2月10日的空战中,张积慧大队长把号称“王牌飞行员”戴维斯及其僚机击落了。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哀叹,这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志愿军的高射炮兵,1至6月共击落敌机198架,击伤779架。抢修部队在重要桥梁、车站和地段修建大迂回线和便线便桥,及时清除敌机投掷的定时炸弹,以保证交通无阻。铁路运输部门与装卸部队密切配合,实行“分散甩车,多点装卸”的方法,抢运快卸。由于对美国空军采取了一系列斗争,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后方交通运输状况大大改善,有力地保证了军需民用。到1952年6月,侵朝美军的“绞杀战”终于被粉碎。

这样志愿军和人民军在反“绞杀战”斗争中,建成了以兵站为中心、铁路和公路相结合、前后贯通、纵横交错的兵站运输网,形成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基本上解决了作战物资的补给问题,取得了战略上的一个重大胜利。为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45 美军飞机侵入中立区

1951 年 8 月 23 日,就美方飞机侵入开城中立区,轰炸扫射朝中方面代表住所,金日成和彭德怀向美方提出严重抗议,并声明从 23 日起停止谈判,以待美方作出处理。

22 日 22 时 20 分,突有美机侵入会议地区上空,先后盘旋 5 周,投弹两次,扫射 1 次,然后向东南方向飞去。当美机突然轰炸与扫射时,附近居民从酣睡中惊醒,纷纷奔向防空洞躲避。事件发生后,朝中代表团联络官当即于 22 时 35 分通知美方代表团联络官前来会同调查,美方联络官肯耐上校、穆莱上校偕翻译 2 人于 23 时 25 分到达指定地点,随即同赴落弹处调查。调查结果,发现敌机两次共投掷炸弹 9 枚,其中 6 枚系杀伤弹,3 枚为燃烧弹,在朝中方面停战谈判代表团驻地以北百米左右处,以至代表团住宅及停放于门前的南日将军的坐车内,均落有杀伤弹弹片。有 1 枚燃烧弹落在谈判会议会场通往美方代表团宿舍的公路上,公路右侧两米处有一弹坑,已燃烧的弹壳落于路面。另两枚燃烧弹落在直升飞机机场以西千米以外的高地山坡上,其中一个爆炸燃烧,另一个爆炸后未燃烧,其弹片与汽油体仍保持在弹坑附近。

李奇微于 25 日复电金日成和彭德怀将军,答复他们于 23 日向李奇微提出的关于美方轰炸开城中立区的严重抗议。李奇微在这个复电中说这次事件本身就是子虚乌有。

46 塘沽新港一期工程完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南北物资交流和对外贸易也迅速开展。同时，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封锁和经济禁运，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转向苏联和东欧。这些情况都使塘沽港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建设塘沽新港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政务院第九十九次会议于1951年8月24日通过了《关于成立塘沽建港委员会的决定》。决定规定：（一）成立塘沽建港委员会，直属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领导。（二）塘沽建港委员会由章伯钧、黄敬等14人为委员组成，以章伯钧为主任委员，黄敬、靖任秋、高原为副主任委员。（三）加强新港工程局的领导，调李安为新港工程局局长，周纶为副局长。（四）中央人民政府所属之海河工程处由天津市人民政府代管，其建制仍属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除完成海河疏浚、破冰和放淤等任务外，兼顾塘沽建港工程，发挥船只的最大效率，完成筑港任务。

决定公布之后，参加新港建设的全体人员紧密合作，战胜重重困难，保证了施工任务顺利进行。在施工中，工人和技术人员曾提出了1949项合理化建议，创造了1280项新纪录。在管理方面，他们建立了各种责任制312项，技术作业规程103项，完善定额516项。在任务下达后的第三季度，建港

人员还推行了小组核算,加强了计划管理和成本管理,打下了初步经济核算制的基础。经过全体建港人员的努力,终于提前两个半月完成了塘沽新港第一期工程任务,并为国家节省了 142 亿元(旧人民币)的资金。

1952 年 10 月 27 日塘沽新港在港口第一号码头举行了开港典礼。天津市副市长吴德生主持大会。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副部长王首道、中央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杨放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黄火清、天津市副市长周叔、天津工商界联合会主任李烛尘等及参加建港工程的职工 4600 多人,参加了典礼。章伯钧在大会讲话中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天津市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和新港全体职工致敬。他说,新港开港后,必将对今后南北物资交流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以及华北、西北资源的开发有重大影响。这是中国和平建设伟大力量的表现。他号召新港全体职工再接再厉、不骄不懈,继续发挥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完成新港第二期建港工程。大会还通过了新港全体职工上毛主席书,报告新港第一期建港工程的完成情况。工人们在信中说:以自己的能力建筑海港。还宣布,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但能够在这里建筑起自己的海港,并且还要在祖国的其它海岸上建筑起更多的海港。

17 日下午 1 时 10 分,“长春”号万吨级轮船,由 5 艘彩船导引下向新港驶来。参加开港典礼的各界代表在章伯钧率领下,在第一号码头热烈欢迎第一艘万吨巨轮的到来。“长春”号巨轮一驶入港内,顿时岸上、船上,欢呼声、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章伯钧部长主持完剪彩仪式后,人们将一群鸽子放飞海空,象征着新中国和平建设的伟大胜利。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
9
5
1
年
的
故
事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特为新港的建成题词：“庆祝新港开港，望继续为建港计划的完成和实施奋斗。”塘沽新港是中国人民以自己的力量修建起来的第一个规模宏大的商港。

47 “一个车轮上的许多轮轴”

美帝国主义为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控制,1951 年 8 月 30 日,同菲律宾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之后第二天,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三国政府代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国务卿顾问杜勒斯、参议员亚历山大·维利、参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参议员约翰·斯巴克曼、澳大利亚驻美大使斯彭德、新西兰驻美大使贝伦森在旧金山的要塞金门古堡,正式签署澳新美安全条约。

这个条约除一个不长的序言外,共有 11 项条款。其特点是吸收了北大西洋公约的一些写法,有几条内容甚至完全相同。序言一开头重申它们对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的信念,正文第一条是缔约国保证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以和平方法解决可能有关它们的任何国际争端,以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并在它们的国际关系上不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方式使用威胁与武力。第六条又是本条约不影响、也不得解释为影响缔约国在联合国宪章下所有的权利和义务或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三国条约中举足轻重的第二、第三条,与北大西洋公约第三、第四条也基本相同。第二条说,为了更有效地实现本条约的目标,缔约国将单独地和共同地用继续的和有效的自助和互援的办法来保持及发展它们单独和集体的抵抗武装攻击的能力。第三条规定,当缔约国任何一国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在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太平洋受到威胁时,缔约国应共同进行磋商。这两条之所以仍和北约措词相仿,是因为美国想继续从中体现“范登堡决议”的精神,强调“自助与互援”,避免承担过多的义务。

该条约还有另一个特点是,关于义务方面的措词比北约更笼统。在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凯西称之为“条约的核心”的第四条中写道每一缔约国都认为在太平洋地区对任何一缔约国的武装攻击都将危及它自己的和平与安全,并宣布它将按照它的宪法程序采取行动去应付共同的危险。这样的说法,按杜勒斯在1952年1月7日向艾奇逊汇报时所作的说明,是为了充分尊重和保持美国现行宪法的限制,实质上是为了进退自如,在承担义务时有更大的选择余地。所以,澳大利亚工党副领袖阿瑟·卡尔韦尔曾在议会上猛烈地抨击了三国安全条约,并说它作出的惟一保障就是缔约国可以共同进行磋商,没有规定真正的义务,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不订条约倒可能好一些。

条约第五条从地理意义上确定了条约实施的范围:“对任何一缔约国的武装进攻”,“也应认为是对任何一缔约国的本土或它在太平洋上所管辖的岛屿领土,或它在太平洋上的武装部队、公有船只或飞机的武装进攻。”这一条的提法主要对美国有好处。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1952年2月14日报告承认,就美国的利益而言,这一条条文的含义特别广泛,假如我们在日本的占领军受到武装攻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样有义务根据条约第四条采取适当行动。三国安全条约在内容上与北约的异同,反映了美国对义务的承担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的实质。

根据条约第七条规定,缔约国应设立一个由它们的外交部长或其助理组成的理事会,考虑本条约的实施问题。理事

会之组织方式应以能随时举行会议为准。所以,1952年8月7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凯西和新西兰外交部长克里夫顿·韦布带了各自的顾问,在美国夏威夷开会,正式建立起这个机构,并举行了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理事会由三国外交部长组成,每年开会一次,轮流在三国举行。理事会没有常设机构,但三国外交部长可派助理随时在华盛顿举行特别会议,不断保持磋商联系。此外,三国政府还可指派各自的军事代表向理事会提供咨询。在第一次会议上,美国当即决定派其太平洋部队司令阿瑟·雷德福特海军上将兼任理事会的美方军事代表。澳、新、美理事会比起后来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在有些方面更能发挥作用。它可以讨论某些不适合纳入东南亚条约范围内的问题。到60年代,根据该理事会磋商的结果,美国与澳大利亚签订了关于在澳大利亚建立海军通讯站的协定。有些学者认为,这个协定是把澳新美安全条约延伸和扩大了,反过来也增加了安全条约的重要性。这个条约使澳新获得了安全感,澳新美理事会又使澳新获得了了解美国意向和发表自己观点的渠道,而美国通过这个条约在西南太平洋获得了牢靠的战略后方。

澳新美安全条约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日安全条约一起,“就像一个车轮上的许多轮轴那样”,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初步建立起遏制共产主义的纵深体系。

48 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

1951年9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2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

条例分通则、县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署的工作关系及附则，共6章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县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各民族自治区域，依其具体情况，设立相当于各该级人民政府的法院。人民法院执行审判刑事案件，惩罚危害国家、破坏社会秩序、侵犯国家、团体和个人合法权益的罪犯，审判刑事案件，解决机关、企业、团体、个人等相互间的权益纠纷等任务。人民法院基本上实行三级两审制，以县级人民法院为基本的第一审法院，省级人民法院为基本的第二审法院。一般以二审为终审，特殊情况下，得以三审或一审为终审。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的领导和监督，其司法行政由上级司法部门领导。各级人民法院为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受同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省级人民法院的分院分庭受其所在区专员的指导。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是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并负责领导和监督全国各级审判机关的审判工作。人民检察署对其提起公诉的案件，应由检察人员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参加，对于人民法院依法进行调查、审判的刑事案件或重要民事案件，亦得参加。人民检察署为执行检察职务得向人民法院调

阅案卷。人民法院接到人民检察署起诉的案件,如认为有重新补充材料之必要时,应退回原检察署请予补充检察材料。人民检察署如认为人民法院的判决确有错误,得提起抗诉,由原人民法院将抗诉书连同案卷,送上级人民法院审判。条例具体规定了各级人民法院所辖案件的类型及上下级人民法院的工作及所属关系。

该条例是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性质、职权、各级人民法院所辖案件、审判程序等的法规,它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和一切合法权益。

49 对日和会与对日和约

1951年9月4日至8日,美国不顾中国、苏联和亚洲许多国家反对,在旧金山歌剧院召开了对日媾和会议。

在这之前,美国进行了一番紧张的会前活动,主要是使日本在赔偿等问题上向一些亚洲国家作出愿意谈判的姿态;在领土问题上,则要日本放弃主权但不提归属,并再一次向日本保证美国对琉球等西南诸岛并无领土野心。还有,杜勒斯和艾奇逊还拟定了议事规则。会议的临时主席由美国代表团团长艾奇逊担任。有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英国、美国、苏联等51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日本派吉田茂为代表出席和会。南斯拉夫、印度和缅甸拒绝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代表出席会议。9月4日晚上的第1次会议由大会主席艾奇逊和美国总统杜鲁门致词后结束。9月5日,正式会议开始,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发言,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的政府,同准备对日和约及远东持久和平有特殊的利害关系,要求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和会。艾奇逊对苏联动议没有讨论。

杜勒斯代表草案起草国对和约草案逐一作了说明。尤其是关于领土问题,他说哪些领土应置于日本主权之下,认为只有波茨坦公告的投降条款对日本和各盟国具有约束力。而在盟国之间的单方面协定则对日本没有约束力。因此,和约草案按照投降条款把日本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

1951 年的故事

国及其它几个比较小的岛屿。和约草案第2章第2条关于日本放弃主权的叙述是严格按照投降条款规定的。千岛群岛不包括齿舞诸岛。杜勒斯还对保安问题及中国参加和约问题进行了解释。

菲律宾、印尼等国在大会发言中,对赔偿问题提出强烈的要求,埃及建议删去美军留驻日本领土的内容,得到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代表的支持。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则谴责美国策划的单独媾和。大会最后一天,吉田茂代表日本作了接受和约的演说,并对中国没有代表出席会议“甚表遗憾”。

8日,美、英、法等国签订了对日和约。主要内容有: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和要求;日本放弃对南威岛及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和要求;日本同意将琉球群岛及小笠原群岛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而以美国为惟一管理当局;日本“得自愿加入集体安全协定”;“盟国”可同日本缔结双边协定,在日本驻军;承认日本对领土及领海的主权。和约不提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甚至企图抹杀有关国家对日本的赔偿要求。

苏联虽然参加了会议,但在会上批判了美国单独的对日和约方案,同时也提出了苏联的方案。因为美国拒绝讨论苏联的方案,所以,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没有在美国炮制的对日和约上签字。由此可见这次“和会”以及在“和会”上签订的“和约”是片面的、非法的。1951年9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他说:“美国政府在旧金山会议中强制签订的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对日单独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美、日在签订“和约”的同时,还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约》。包括序言和正文两部分,全文共5条。条约规定:“美国陆、空、海军在日本国内及周围”有“驻扎之权利”。驻扎美军除了“用以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和“日本免受外来武装进攻之安全”外,并包括根据“日本政府的明显要求”,用以“援助”日本政府,“镇压”“在日本引起的大规模暴动和骚乱”。条约还规定:未经美国事先同意,日本“不得将任何基地给予任何第三国,亦不得将基地上或与基地有关之任何权利或权限或陆、空、海军驻防、演习或过境之权利给予任何第三国”。条约中没有明白规定美军驻扎日本的期限,实质上是一个美国独占日本的条约。

50 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

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局、省委的代表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会议讨论、起草了《中央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会议认为,农民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发扬起来的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积极性,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根据我国的经济条件,农民的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大量存在的,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但是,要使广大贫困农民能够迅速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能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它工业原料,同时为了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市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会议提出,农村互助合作有三种形式,即季节性的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和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议根据互助合作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需要,提出党在目前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是,根据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具体要求是,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新解放区和互助运动薄弱的地区,有领导地大量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种形式 ;在有初步互助运动的基础地区,有领导地逐步推广第二种形式 ;在群众有比较丰富的互助经验,而又有比较坚强的领导骨干的地区,有领导地同时又有重点地发展第三种形式。

会议指出,在领导互助合作运动中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互助合作运动,看不出这是我党领导广大农民群众从小生产个体经济逐渐走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否认它们带有社会主义因素 ;另一种是采取急躁态度,不顾农民自愿和经济条件,过早的不适宜地企图在现在就否定或限制参加合作社的农民的私有财产,或者企图对于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或者企图很快地举办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

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为土地改革后的农村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对建国初期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51 改造知识分子思想

旧中国科学文化落后,知识分子很少。根据建国初期的粗略统计,全国大约有各类知识分子 200 万人,仅占全国总人口 5.4 亿人的 0.37%。这种比例处于世界上最后行列。

从 1951 年秋季开始,人民政府有组织有计划的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开展了一个学习和改造思想的运动,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次学习运动,是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在北京大学教师中首先发起的。马寅初在谈起他发起和组织北京大学教职员学习和改造思想的经过时说,北京大学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深感广大教职员工愿意接受新思想,愿意把一所旧型的大学改造成为新型的人民大学。但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遇到院系调整、课程改革,以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和阻力。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提高教员的政治水准问题,使他们适应新的形势。马寅初先生说,自己深深地体会到,要把旧北大改造为新北大,一个最主要的键,就是要使全校师生自觉自愿地进行思想改造,使自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鉴于暑期组织职员学习提高了工作效率的经验,决定在全校教职员中发动一次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他说这次学习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思想改造来推动学校的改造,为国家培养出既能掌握技术,又能站稳立场,真正能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学习的方法是听报告、学文件、展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

马寅初在北大的活动,受到中央人民政府和周恩来总理的赞扬和支持,并决定把这一学习运动推广到京津的所有高校,经过试验,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周恩来还主持了会议,对这次学习的目的和内容作了指导。为了统一领导京津两地的高校学习,教育部成立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各大学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分会。参加此次学习的京津两市的高等学校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辅仁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华北大学工学院、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津沽大学、中国矿业学院、河北师范学院、河北医学院、河北水产学校、外国语学校、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共20所院校。

周恩来总理在9月29日下午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向3000余名高等学校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报告共分:(一)立场问题;(二)态度问题;(三)为谁服务问题;(四)思想问题;(五)知识问题;(六)民主问题;(七)批评和自我批评7个部分。在报告中周恩来总理就知识分子如何正确认识思想改造,取得革命立场、观点、方法等问题谈了自己的切身体会。周恩来说,他30多年来就是不断进步,不断改造的过程。30多年中,他犯过许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认识得不清楚,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行不通。因此,就必须向进步的理论求教,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道理。这样作了,就有了力量,就行得通了,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了。他说,现在自己虽然担负了政府的领导工作,但是

还是要学习和改造,因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他要求知识分子应该首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立场,然后再经过学习、实践和锻炼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他恳切希望教师们认真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他要求大家建立这样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是怎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京津高校教师听取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以后,一个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情况,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肃清封建买办思想,批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推动教育改革的学习运动在京津两地各高校展开。11月2日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在京召开各校学习委员会扩大联席会议,清华大学介绍了组织领导学习的经验,北京大学介绍了如何开好小组会的经验。11月25日,教育部发出通报,向全国教育系统介绍了京津高校教师的学习情况和初步经验。于是从京津高等学校发起的知识分子学习和改造思想的运动逐步推广到全国各地的高等学校、中等学校的教师中。全国高等学校教职员的91%,大学生的80%,中等学校教职员的75%参加了这次运动。

1952年初“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进一步推动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知识分子的学习运动,并丰富了学习的内容。各学校都结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师生中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腐蚀和揭发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斗争。“三反”、“五反”斗争的实践,使知识分子受到了一场生动的阶级教育。在此期间,人民政府还分期分批组织高等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到农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深入实际了解社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会,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鉴于文艺界也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而文艺工作在领导方面存在着一种忽视思想、脱离政治、脱离群众,对各种错误思想无原则迁就的倾向。在部分文艺干部中也存在着某些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中宣部向党中央作了《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决定通过整风学习,澄清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想,认真建立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有效领导。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错误思想,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1951年11月24日,北京市文艺界召开了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会上胡乔木、周扬、丁玲分别作了发言。大会之后,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正式开始,参加这次整风学习的有文化部所属文艺部门、文艺组织、文艺学校、文艺报刊等单位1200余名文艺工作者。通过整风学习,基本上划清或初步划清了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小资产阶级文艺的界限,并对文艺团体、文艺机构、文艺刊物进行了整顿。

1952年1月7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并成立了学习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各党派民主人士,各级政府、人民团体和协商机关中的无党派人士,政府和企业中的专家、工商界人士、宗教界人士的学习。决定规定,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各地协商委员会,目前应以组织领导各界人士学习为主要任务。参加学习均以自愿为原则。学习的内容包括三项 ①学习理论,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

学习毛泽东思想,以求了解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得正确的革命的观点 ;②学习政策,即学习《共同纲领》,中央和各大区的政策文件 ;③整风,即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纠正违反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革命利益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这样从北京高等学校开始的以改造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学习运动,逐步普及到全国各界知识分子中去,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学习运动,直到 1952 年秋基本结束。

52 “自由世界的共同安全”

随着美、苏“冷战”加剧,1950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第68号文件,要求“加紧步伐”、“大量增加军事援助计划”。趁着美国发动侵朝战争的势头,杜鲁门于1950年10月提出新的对外援助原则。杜鲁门还要求对外军援范围扩大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印度支那、泰国、印尼、缅甸等。美国对外援助发生重要变化,经援优于军援、援助地区主要限于欧洲的方针开始改变。为了调整援外政策,以总统特别助理戈登·格雷为首的委员会于1950年11月10日提出《关于对外经济政策给总统的报告》。11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又提出一份关于对外援助计划的备忘录。杜鲁门“新的对外援助原则”已酝酿成熟。

杜鲁门于1951年5月24日向国会提出共同安全计划咨文。他说,共同安全计划是把美国的各种援外计划合并在一起。根据共同安全计划,美国援外“将以军事装备为主”,其中大部分援助北约组织缔约国,并向亚洲和中东国家提供军援。美国继续向欧洲及世界其它地区提供经援,并指明:“这种经援将使受援国实施大规模的防务计划”。杜鲁门提出了马歇尔计划的新目标。咨文认为,援助中东是“消除”苏联的压力,援助亚洲是“同多种形式的共产主义侵略作斗争”。咨文要求1952年财政年度援外拨款为85亿美元,其中军援62.5亿美元,经援22.5亿美元。杜鲁门的共同安全计划,是

1951 年的故事

把军援优于经援、经援为了“防务”的援外方针定为美国国策,并将援外的范围扩向全球,这是符合当时美国对外全面扩张的需要的。

1951 年 10 月 5 日和 8 日,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1951 年共同安全法》,10 日由杜鲁门总统签署生效。国会批准援款总额为 74.83 亿美元。共同安全法明确宣称,国会宣布本法的宗旨是:通过援助对友好国家提供军事、经济和技术援助,以增强自由世界的共同安全、个别防务与集体防务,从而维护美国的安全并推进其对外政策,为了这些国家的安全和独立以及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开发它们的资源;有助于这些国家实际有效地参加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系。根据共同安全法,撤销经济合作署,设立共同安全署主管援外事宜。随即,美国国会又通过《共同防御援助控制法》,作为《1951 年共同安全法》的补充法案。该法主要内容是规定以向苏联禁运作为提供援助的条件。

1951 年 11 月 21 日,苏联向美国提交抗议照会。强烈谴责美国《1951 年共同安全法》。照会说,“美国通过这样一项法案是国际关系中史无前例的行动,构成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内政的粗暴干涉”,“该法的通过只能被看作是旨在使美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并使国际形势恶化的侵略性行动。”

在共同安全法通过前后,美国转移了援外重点。在对欧洲的援助中,1951 年财政年度的“马歇尔计划”援额减为 23.1 亿美元,但军援上升为 52.2 亿美元。马歇尔计划实施的后两年,也日益转向防务目标。武装中的联邦德国成为重点受援国。1951 年间,经济合作署主要资助可以转为防务的工业设施项目,并扩大了西欧国家海外属地战略物资生产的援助。美国从复兴欧洲转为武装欧洲。以技术援助为主的第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
9
5
1
年
的
故
事

四点计划也服从于“自由世界的共同安全”的目标。共同安全法实质上加速了美国缔结双边军事协定和建立地区性军事集团的步伐。

53 中美洲国家组织

中美洲国家的外长于 1951 年 10 月在萨尔瓦多签署了《萨尔瓦多宪章》，宣告中美洲国家组织成立。

它的成员国包括：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五国。宗旨是巩固中美洲国家的密切关系，确保和平解决争端，相互援助并协同解决共同的问题，促进成员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最高领导机构是不定期举行的成员国首脑会议。主要领导机构是每年召开的外长会议。常设机构是执委会，由成员国外长或其特派代表组成。下设立法、经济、文教、劳工和社会保障等委员会及中美洲卫生保健委员会、旅游委员会和中美洲法院等。总部设在圣萨尔瓦多。

该组织成立后，1958 年五成员国在洪都拉斯签署了《中美洲经济一体化和多边自由贸易条约》。1960 年，危地马拉、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四国签署了《中美洲一体化总条约》。1962 年 8 月，哥斯达黎加也加入，与其它四个成员国在圣约瑟签订了《建立中美洲共同市场协议》，并成立了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等。1964 年，中美洲四国（除哥斯达黎加外）国防部长签署了《中美洲防务委员会宪章》，成立防务委员会。次年，成立了中美洲共同部队。1969 年，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边界冲突后，两国中断外交和贸易关系，该组织的活动受到较大的影响。1980 年 3 月 15 日，中美洲外长会议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
9
5
1
年
的
故
事

签署《圣约瑟声明》，反对把该地区变成任何强国的势力范围。80年代，特别是1987年以后，随着中美洲和平进程的发展，该组织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

1992年6月，中美洲首脑会议发表了《马那瓜声明》，总结了该组织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又重新制定了指导未来中美洲地区的和平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各种对策。

54 兴建官厅水库

人民政府为根绝永定河水患，除了在下游修堤防治以外，早在 1949 年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召开的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上，就决定要在永定河上游和中游修建石匣里、官厅、马各庄等三个大型水库，并决定先修官厅水库。1949 年底官厅水库工程处正式成立，并着手进行建库的一切准备工作。

1951 年 10 月官厅水库正式开工。到 1953 年 6 月 29 日，拦河坝工程已筑到实高 35 米，胜利完成了在伏汛前开始拦蓄洪水的任务。在这一年零八个月里，除了修筑拦河坝工程外，同时还修建了长达 495 米的泄水隧洞和溢洪道等主要工程。共计开挖土石方 48 万立方，浇筑混凝土 3.2 万立方，钻孔共深 4000 多米，并灌浆 770 多孔。拦河坝稳立在官厅山峡的进口，使永定河的巨流驯服地通过泄水隧洞顺流而下，即使永定河再发生 1939 年那样大的洪水，两岸人民也不会再遭受洪水的灾害。

规模巨大的官厅水库建成后能蓄水 20.9 亿立方米，是我国当时第一座大型水库。

55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出版

毛泽东一生文章著述很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已出过不少版本,主要可分为五个系统的版本。1944年6月在晋察冀根据地由晋察冀日报社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全国解放前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没有经过毛泽东本人审定,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也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在访苏期间,斯大林向毛泽东建议编一部毛泽东选集,以帮助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的经验。1950年春天,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斯大林的这个建议,决定立即着手编辑。5月成立了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是在毛泽东直接主持下进行的。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是参加编辑工作的主要成员。

195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持选编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这一卷包括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共计16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两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14篇,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

1951 年的故事

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实践论》。

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之后，1952年4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发行。这一卷包括毛泽东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至1941年5月打退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期的著作，共计41篇，其中的重要著作有：《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反对自由主义》、《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青年运动的方向》、《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共产党人）发刊词》、《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矛盾论》等。

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发行。这一卷包括毛泽东从1941年3月至1945年8月的重要著作，共计31篇，主要著作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习和时局》、《论联合政府》等。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发行。收入《毛选》第四卷的,是毛泽东从1945年8月到1949年9月即抗日战争结束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著作。这个时期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是我国武装的革命和武装的反革命决战的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规模空前的国内战争,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毛选》第四卷是这个伟大胜利的纪录。《毛选》第四卷共收录毛泽东著作70篇。其中主要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史观的破产》等篇章。

《毛泽东选集》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革命斗争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奋斗的智慧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文献。它一出版,很快被译成俄、英、法、日等20多种文字,介绍到许多国家,有力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随着《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陆续出版,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56 推广郝建秀工作法

纺织工业部于 1951 年 10 月 15 日发出《关于普遍开展郝建秀工作法的指示》，从此以后全国各工厂企业开始普遍推广郝建秀工作法。

郝建秀 1935 年生，山东青岛人，1949 年进国营青岛第六棉纺织厂当工人。1950 年红五月竞赛时，该厂建立了细纱皮辊花个人过磅记录制度，发现郝建秀的皮辊花出得最少，引起领导的重视，并加强了对她的技术指导。此后几个月，郝建秀进一步研究如何计划和组织工作时间，把各项工作适当分配在每一次巡回中做，终于创造了一套比较科学的细纱工作法。

这个工作法有三项基本内容：第一，工作主动，有规律，有计划，有预见性，运用了运筹学的一些原理。由人支配机器，而不是机器支配人。其它工人劳动强度虽然也很高，人不离车档，来回忙接头，工作处于被动，做了一些无用功，工作效率不见很高，人累得不得了。郝建秀则不然，她按照一定的规律工作，一切争取主动。比如她巡回时后面断了头，她并不回来接，仍然按计划进行工作，直到回来时再把头接上。第二，劳动时动作合理，也可以说是生产合理化。她把几种工作结合起来做。在巡回时就附带打擦板、扫地，同时眼睛看到两面，断了头就接，粗纱完了就换。巡回一次做了几种工作，既省力气又省时间。第三，抓住了细纱工作的主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要环节——清洁工作,因她工作有规律,动作合理,她就有时间做好清洁工作。在清洁工作上她花的时间很多。清洁工作做好了,断头就少,皮辊花出得少,产量就高,质量就好。郝建秀工作法不但可以提高产量,而且可以节省原料,降低成本,延长机器寿命。同时还可节省社会劳动力,提高工人看台能力。另外也为劳动定额打下基础,从而为经济核算创造了条件。

郝建秀由于掌握了机器性能,减少了细纱机的断头,缩短了断头的延续时间,使皮辊花率达到 30.25% (为青岛纺织企业平均数的 $\frac{1}{6}$) 的全国纪录。值车能力 (20 支纱) 由 300 锭逐渐提高到 600 锭。倘全国皮辊花率降到郝建秀达到的皮辊花率,全国可多产 44460 件纱。

1951 年 2 月,山东工矿检查团了解这些情况后,要求总结其经验。在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的指导下,6 月初,在青岛成立了由工程师、优秀细纱工作者及领导干部组成的“郝建秀工作法研究委员会”,对郝建秀创造的工作法进行测定和总结,使它更加条理化、科学化,形成了“郝建秀工作法”。这种工作法是环绕着减少断头和缩短断头时间进行的,基本特点是,工作主动、动作合理,善于计划工作时间,把各项工作适当分配在每一落纱和每一次巡回中做,抓住细纱工作主要环节,做好清洁工作。青岛各棉纺厂推广这种工作法后,根据 8 个棉纺厂推广 3 个月后的统计,皮辊花平均降低了 51.7%,看锭数提高 $\frac{1}{3}$ 左右。

1951 年 8 月,在中国纺织工会、纺织部等单位联合召开“青岛市棉纺织职工代表会议”。全国各地的细纱工人代表、劳动模范、技术人员等出席了会议。9 月 13 日,纺织部通报各地大力推行郝建秀工作法,并与纺织工会组成工作组推动

该工作。从此,郝建秀工作法开始推向全国,并取得较大的效果。11月1日,在天津召开全国织布工作会议,以郝建秀工作法为基础,集中了青岛、上海、天津与东北织布先进操作经验和理论,总结出全国统一先进的“1951 织布工作法”,简称“五一织布法”。

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是中国纺织生产工作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使此后的生产竞赛走向体力与智力相结合的阶段。并推动纺织行业其它工种工作法的总结、推广和提高。并为广大纺织工人提供了坚守工作岗位,掌握先进技术,进行科学操作,完成生产任务的榜样。

57 增产节约运动

1951年10月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在工业和农业战线上正在开展着的爱国增产运动。只要我们善于团结、教育和依靠工人和农民,我国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普遍高涨的爱国增产运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项工作报告的决议》中提出:“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向全国人民指出的“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后,中国人民积极响应,一个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起来。

在西北,习仲勋在《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而奋斗》的报告中,批判了西北经济落后,增产节约可能性不大的说法,并提出西北开展这一运动的六项方针。在华东,各界动员为完成和超额增产节约3500亿元的计划而努力。在中南,邓子恢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中,指出了这一运动的重大政治意义和在中南开展这一运动的方向与办法。在贸易部门,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决定在全国国营贸易企业中,争取实现增产节约。人民日报1951年11月20日发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的社论。社论提出:为了进一步加强抗美援朝的力量,在保持国内物价稳定和不过分加重人民负担的条件下,保证对前方的物资供应,这就只有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更重要的是,为了准备今后国家大规

模的经济建设,为国家工业化积累大量资金,全国人民也必须加倍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社论还强调:我们积累资金的方法,不能采用资本主义国家所用的掠夺殖民地或通过侵略战争取得“赔款”等强盗式的方法,基本上只能依靠人民内部力量,这就必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所以应该认识“增产节约”绝不是为了解决临时困难的措施,而是关系国家建设的一项极其重要的经常性的政策,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持久的群众性的运动来推动。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涌现出大批革新能手、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大大提高了技术,刷新了生产纪录。如“郝建秀工作法”、“张淑工作法”等破土而出。

1952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注意两点问题:
(一)增产节约运动要在“三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依靠广大职工的全面的觉悟程度和劳动积极性,不仅要努力完成今年的生产财务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而且要改进生产管理,改善劳动组织和提高技术,打下经济核算制的必要基础,从而结束将旧企业转变为新企业的改造过程,使我们能掌握成套的新的经营管理的经验,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任务。因为,除了制订增产节约的奋斗目标,并动员和组织广大职工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外,必须注意经营管理工作的改进。其次,在组织增产节约运动和劳动竞赛运动时,应注意根据各种产品供销的不同情况分别地、具体地规定各个厂矿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的具体奋斗目标和竞赛重点,凡原料足、销路好的厂矿,应该首先注意增产,并在增产中力求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二)在私营企业中,当前任务是巩固“五反”运动的胜利,迅速结合生产与生活,建立正常的劳资关系,团结资方及时转入生产。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各地在增产节约的同时,还发动群众,充分揭露一切浪费和无效能的现象。与此同时,群众性的生产竞赛运动和改进生产技术活动深入开展。国家机关将可用可省的开支全部加以节省,就是该用的费用也要找出节约的办法。不急的事务和设备,必须停办,重叠臃肿的机构加以裁减。

到1952年底,增产节约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由于建国初期各地区情况不同,因此增产节约运动发展也不平衡,解放早的地区的企业及国营企业开展较好,解放较晚的地区的企业相对差一些。工业企业开展较好,其它财经部门开展较差。在这一运动,有些地方存在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单纯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倾向。为使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中央财委会曾提出必须加强生产管理,改善劳动组织,推广先进经验,改良生产技术,注意工人安全福利,为今后推行经济核算打下基础。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斗争的同时,也促进了经营管理的改善,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指出:“实行增产节约这一方针,具有重大积极意义。它是既保证朝鲜战争能够胜利又保证国内物价继续稳定的方针,这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它又是整肃党纪,提高工作效率和转移社会风气的方针。总而言之,它是带动我们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局都将迅速进步,并奠定将来伟大建设基础的方针。”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都发现了大量的惊人的浪费、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察觉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从而发起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58 美“共同防御援助控制法”

美国 1951 年共同安全法通过之后,美国会又通过了“共同防御援助控制法”,并且在 1951 年 10 月 26 日由杜鲁门总统签署生效。

该法是对“1951 年共同安全法”的补充,其主要内容是以向苏联禁运作为提供援助的必要条件。该法称,美国的政策是,武器弹药、军事装备、原子能原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材料,以及用于武器弹药、军事装备等具有头等战略重要性的物资,不得运输给威胁美国安全的某国或某几个国家,其中包括苏联及其统治下的国家,以便达到 ①增强美国及其合作的国家的实力 ②削弱威胁美国安全的国家进行军事活动的能力 ③帮助在外国侵略者统治下的国家的人民重建自由。美国将实施如下政策:受援国“对威胁美国安全的国家,包括苏联及其统治下的国家,应实行禁运,不然美国将不向这些国家提供军事、经济和财政的援助”。该法第 103 条说,至于哪些物资属于禁运项目,则由美国决定后通知受援国,并可随时进行调整。该法还称,如果受援国违反禁运规定,则可中止援助。假如停止援助显然有损于美国安全,总统在考虑到该国对自由世界共同安全的贡献,考虑到这种援助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考虑到从苏联集团国家进口商品的战略意义,在该国对于向苏联集团国家出口战略物资作了恰当控制后,总统可下令继续对该国进行援助,允许其向苏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
9
5
1
年
的
故
事

联集团国家运输除了武器弹药、军事装备和原子能原料以外的其它物资。

该法“除了规定禁运战略物资外，还对其他物资的禁运也作了规定。如第 201 条写道，美国国会进一步宣布，在向威胁美国安全的国家，其中包括苏联及其统治下的所有国家，出口除战略物资以外的商品时，对这些出口商品清单进行调整，是美国的政策。这是为了加强美国和自由世界其他盟国的力量，反对和抵消威胁到美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非军事性的行动。至于这些禁运物资项目的确定，该法第 202 条写道，美国将与获得军事、经济和财政援助的国家磋商安排，由受援国控制不在战略物资禁运范围内的出口项目。

为确保这一立法的实施，该法明确规定，当总统断定受援国“既没有有效地与美国合作；又未能向美国提供足够情报，使总统判断该国是否有效地与美国合作时，一切军事、经济和财政援助均可中止。

因此，“1951 年共同安全法”的制定，标志着美国的对外援助从主要在欧洲扩展到全球，从以经援为主转变为以军援为主。

59 丘吉尔再次组阁

在 1951 年 10 月英国大选中，保守党获得了胜利。该党领袖温斯顿·伦纳德·斯潘塞·丘吉尔再次出任首相并兼任国防大臣，组织保守党内阁。

1874 年 11 月 30 日，丘吉尔生于牛津郡的贵族家庭，毕业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服役后参加过英帝国在印度、苏丹和南非等地的殖民战争。1900 年起被选为议员，他先后担任过贸易、内政、海军、军需、陆军、空军、殖民和财政大臣等要职。1939 年二战爆发后，他出任海军大臣。1940 年 5 月 10 日，正当西线德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面临危亡，波兰、丹麦和挪威已被德军占领的危急时刻，张伯伦政府因推行绥靖政策倒台，丘吉尔以保守党主战派领袖身分组织了战时联合内阁。他声明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他强烈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虽然他是公开主张把苏维埃俄国“扼杀在它的摇篮里”的，此时他却主张联合苏联抗击德国。大战期间他参加了美、英、苏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的首脑会议，1945 年 7 月，他在英国大选失败后下台。战后他倡导英美、英联邦和西欧的“三环外交政策”。1946 年 3 月 5 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铁幕”演说，成为美帝国主义发动“冷战”的前奏曲。丘吉尔还是著名的著作家，1953 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并著有：《马拉坎德远征史》、《河上战争》、《世界危机》、《第二次世界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大战回忆录》等。

1951年丘吉尔组织的内阁,内阁大臣有19名曾担任过大公司的董事,有14名出身于贵族或与贵族联姻。为此,有人把这届内阁称为“富豪和贵族的内阁”。本届政府面对财政经济的恶化,不去触动大资产者,而是削减社会保险、国民教育和住宅建筑的开支,采取“冻结”工资的政策,而军费支出却继续增加。1952至1953年度的国防经费增到14亿英镑,1955年英国决定制造氢弹,走上了核武器军备竞赛的道路。1954至1955年度因降低超额利润所得税而使垄断资本获得额外利润1.5亿英镑。在对外政策方面,英国对美国既依靠又矛盾,以英美联盟为基础,同时又要执行“独立”的政策。

1955年4月丘吉尔退休,1965年1月24日逝世。

60 郭沫若获斯大林国际金奖

1951 年 12 月，“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决定把 1951 年度的奖金授予郭沫若。该委员会主席斯科贝尔琴发表谈话，赞誉“郭沫若的全部活动生动地证明了他对全世界和平事业和全世界人民的进步和自由事业的忠诚贡献”。郭沫若得知获奖消息后，发表书面谈话：“请允许我（对获奖）作这样的解释 这并不是给予我个人，而是给予全中国人民。我们全中国人民的人民革命的胜利，抗美援朝的胜利以及各方面建设事业的胜利，对于‘加强国际和平’的事业是有贡献的，我只是作为一个代理者，代替中国人民接受了这一次应该属于全国人民的最高荣誉。这对于我们全中国人民是很大的鼓励，而对于我个人尤其是大到无以复加的鼓励。”

郭沫若 1892 年 11 月 16 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剧作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早在“五四”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他创作的历史剧，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他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郭沫若还是革命的政治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并于 1927 年奋笔疾书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及时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人民之真面目。大革命失败后他英勇地加入到南昌起义的行列，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不得不亡命日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别妇抛雏”，归国请缨，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流。抗战胜利后为我国和平民主奔走呼号。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他还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他不仅担负着繁重的国家事务、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领导工作，还多次去苏联、欧洲出席世界和平运动的重要会议，阐述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主张。他的许多讲话和演说，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郭沫若接受奖金典礼于1952年4月9日下午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郭沫若在致答词时朗诵了诗作《光荣与使命》，并宣布10万卢布奖金，决定全部捐献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和平的奖金为和平而用，是最好的用途。

61 统一币制

由于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中国货币制度极其混乱。1935 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于 11 月 4 日发行“法币”，并利用它收兑银元和民间藏银。法币从发行之日起就开始贬值，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实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更急剧贬值，不得不于 1948 年 8 月 19 日发行“金圆券”以取代法币，以 1 元金圆券兑换 300 万元法币，并强收民间金银外币。金圆券发行后，币值继续下跌。仅 9 个月时间，发行额达 98041 亿元，比原规定的 20 亿元金圆券的本位币，增加了 4900 多倍。1949 年 7 月 3 日，逃至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又决定发行“银圆券”兑换金圆券，但这时银圆券几乎已无人接受。由于国民党发行的纸币几同废纸，金、银、外币等硬通货就在金融市场广为流通，仅银元就有“袁大头”、“孙小头”、龙洋、鹰洋等多种。

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和解放区都成立了自己的银行，并发行各自的货币。如 1937 年 10 月在其前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基础上于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陕甘宁边币；1938 年 3 月成立于山西五台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了晋察冀边币；1938 年 8 月成立于山东掖县的北海银行，发行了北海币；1939 年 10 月成立于山西黎城的冀南银行，发行了冀南币；1940 年 5 月成立于山西兴县的西北农民银行，发行了西北农民币；此外还有抗币、浙东币及东北、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内蒙等地方流通券。

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大局已定的情况下,1948年12月1日,在各解放区联合财政会议上,决定由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设在石家庄。后迁至北平。同日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券——人民币,作为华北、西北、华东三区之本位货币。1949年3月,人民币与中州市按1:3的比价在中原解放区混合通用。5月,中国人民银行通令收兑各解放区银行发行的旧币。这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全国的货币已经逐步走向统一。

在统一货币的过程中,对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金圆券、银圆券,采取了坚决、迅速、彻底肃清的方针,严格禁止流通,并规定比价,限期兑换。同时,坚决取缔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货币和垄断中国外汇经营的特权,并禁止一切外币在我国流通和私相买卖,由国家银行规定合理的汇率予以收兑。另外又实行了取缔金银市场,禁止金银计价流通,严禁私相买卖的政策。打击金银投机活动,整顿金、银饰品行业。个人可以持有金银,但实行低价冻结。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15日全部收回流通在粤赣湘边区的南方银行券。东北地区于1946年在哈尔滨成立了东北银行,发行了东北地方流通券。建国前后,东北地区币制并没有与人民币统一,这是根据当时情况采取的一项有针对性的措施。因为东北地区解放较早,物价已首先稳定,而此时关内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稳定物价尚需作出很大努力。为了使东北地区不受关内物价不稳的影响,能够及早恢复生产进行建设,以便更好地在财政经济上支援全国,故在那时保持了东北原来的独立币制。1951年,全国物价已然稳定,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人民购买力普遍提高,全国物资迫

切需要广泛交流。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1年3月20日发布了关于收回东北银行和内蒙古人民银行所发行的地方流通券的命令。根据命令，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4月1日起以人民币收兑回东北币及内蒙古地方流通券。为照顾内蒙古人民，还特印制了一部分有蒙古文字的人民币在内蒙古地区流通。东北银行总行和内蒙古人民银行总行也遵令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东北区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1951年11月1日，政务院又决定在新疆发行印有维吾尔文人民币，限期以人民币收回新疆省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到此为止，全国币制基本统一，一个独立的、统一的人民币市场在中国初步形成。

62 文艺工作者为何要改造思想

1951年11月24日,胡乔木在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讲演,他重点谈了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问题。

他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决定领导北京文艺工作者进行一次关于文艺工作方向问题的学习,借以改造思想,改进工作。这个学习是迫切需要的。文艺界既然提出了方向问题,可见至少在文艺界的一部分领导工作人员中,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坚决的明确的答复。

当然,两年来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有不小的成绩,这是不能怀疑的,但是这一点我不打算在这里多说,因为这不是今天的会议的任务。今天我们需要多看看另外一方面的事情。我们今天普遍感觉作品的不足,而已有的作品,多数不能和劳动人民的新生活互相呼应,这些作品往往缺少新的人物,新的事件,新的感情,新的主题,并且往往因为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和斗争,或者因为把劳动人民的形象和斗争抽象化公式化了,成为反现实主义的东西(在描写历史的时候就成为反历史主义的东西)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同这种现象相联系的,是许多作家同劳动人民缺少联系,对于劳动人民的事业抱着淡漠态度,在创作上表现怠工,粗制滥造,或者放弃创作而醉心于行政事务和交际活动,个别的甚至简直饱食终日,行为放荡;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仍然是同这种现象

相联系的,是许多或者所有文学艺术团体,自从1949年成立以来,就没有认真地组织过作家的创作活动,也没有认真地组织过作家参加人民群众的斗争,也没有认真地组织过作家的学习,无论是政治的或是艺术的学习,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人们说,批评得太多啦,太严厉啦,作家不敢动笔啦。但是事实怎么样呢?完全相反,所有上述的一切现象,都不是在批评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而是在批评极端不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说到批评,我们不能不说到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在《武训传》的批评以后,文学艺术界的批评是比较活跃了,但是至今除了一些文艺刊物的编辑部以外,也仍然没有一个文学艺术团体,把经常组织批评和自我批评当做自己的任务。这种现象难道是可以忍受的吗?但是为什么这种现象竟可以存在两年之久呢?

文学艺术界的许多领导工作人员,也显然忘记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基本指示。毛泽东同志在这个座谈会上指出:文学艺术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了正确地完成文学艺术的这个任务,文艺工作者就必须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那些还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就必须竭力改造自己,以便“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毛泽东同志说:“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座谈会上的结论的末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了尖锐地指出了这个思想改造的原则意义：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向敌人，向朋友，向同志，向自己，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今天难道不是同样地适用吗？在今天的革命文学艺术界，难道不是存在着更大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包围吗？今天的中国是人民民主主义的中国，就是说今天的民主主义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工人阶级的领导可以自然而然地存在着，更不是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能够停止它们的依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活动，不，这是不可能的。无论在文艺战线上，或是在其他的思想意识战线上，工人阶级必须在联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同时，力争自己的领导地位，必须在承认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今天的社会上的合法地位的同时，批评这些思想的错误，指出这些思想之决不能够担当改造世界的领导责任。工人阶级必须坚持依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来改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不允许降低自己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水平来为他们“服务”。

因此,对于我国人民精神生活发挥着重大的领导作用的文艺工作者,不能不力求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不能不力求和劳动人民建立亲密的联系。只有抱着革命态度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充分地了解群众的生活、斗争、思想、感情,才能带着创作的要求、想像、主题、题材从群众中来,然后才能写出真实的革命的作品,让作品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服务。

由此可见,目前文学艺术工作中的首要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和帮助广大的非工人阶级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其他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的。

胡乔木最后指出,什么是目前的文学艺术界的出路呢?

出路就是,第一,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认真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这次全国文联指定了几种适当的文件,并且规定了学习时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以便于文艺工作者分清是非,确定立场,这是很好的。我们希望这个学习能够认真地进行,作为许多文艺工作者脱离非工人阶级立场而取得工人阶级立场的一个开端。

第二,充分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批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使大家彻底认识文学艺术事业是工人阶级阶级斗争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不可能对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事业漠不关心,或者对于各个阶级一视同仁,而必须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强大武器;使大家彻底认识文艺工作者必须和劳动人民密切联系,从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中找到创作的源泉。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第三,整顿文学艺术事业的领导。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既然是工人阶级的思想斗争事业,那么它的领导就不能不是思想的领导,不能不是创作和批评的领导。因此,我们就必须反对文艺领导工作中的那种庸俗的自由主义和事务主义的作风,就必须扩大和加强创作和批评的领导,减少一切可以减少的行政事务。

第四,整顿文学艺术团体,使每一个确有存在必要的文学艺术团体都能够成为战斗的组织,都能够切实地帮助文艺工作者和劳动人民结合,组织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批评和学习的活动。不能够这样作的文艺团体应该宣告解散;不能够实际从事文艺劳动的“文艺工作者”应该被所属的文艺团体除名。

第五,整顿文学艺术出版物,首先是整顿文学艺术的期刊。全国文联已经作出了整顿文艺期刊的勇敢的决定,希望这个决定能够坚决地迅速地实施,并且希望今后的文艺期刊能够为反对粗制滥造、提高文艺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斗争。

第六,要求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文艺工作者在所有上述各项活动中成为模范,就是说,成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模范,成为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模范,成为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模范,和成为文艺劳动的模范,反对党员文艺工作者的任何无纪律现象。

他最后满怀信心地说,只要我们认真地采取这些步骤,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让我们团结一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艺术的旗帜更高地举起来吧!

63 艾登——艾奇逊巴黎会谈

1951 年 11 月,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丘吉尔任首相,艾登为外交大臣。英国在中东及伊朗面临困境,促使保守党政府反省其中东政策。英国曾对哈里曼斡旋持消极态度,在英伊谈判中不肯让步,甚至向国际法庭和安理会控告伊朗,但这一切均无补于事,反使英国在中东处境更为困难。同时,英国传统势力范围埃及也掀起反英浪潮,甚至发展到袭击英军。这些问题,艾登认为根源乃是石油问题。他深感英国在中东及伊朗问题上必须取得美国的谅解和支持,而美国拒绝摩萨台在华盛顿提出的贷款要求也颇合英国心意。于是,艾登主动向艾奇逊建议,乘巴黎召开联合国大会之机,就伊朗问题举行双边会谈。

美国对于艾登建议自有一番考虑。自哈里曼奔走德黑兰与伦敦之间以来,苏联报刊即揭露美国欲在伊朗取英国而代之。1951 年 7 月 26 日,苏联报刊称哈里曼为华尔街的使者,说他正对伊朗政府施加最无理的压力,竭力增强美国垄断集团在伊朗的地位与影响。10 月 22 日,苏《真理报》指责哈里曼调停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美国石油财团分享伊朗石油利益。该报还援引《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话说:“哈里曼的真正使命在于向华盛顿汇报:为了填补由于英国军事政治实力衰落而在那里造成的‘真空’,美援应具有什么样的规模和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无论如何,英国不会再在中东起领导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作用,但它可以成为美国的小伙伴。”美国为了消除英国的猜疑,同时也担心英国在伊朗硬顶会酿成大祸,干扰美国的全球战略,艾奇逊遂同意和艾登会谈。

1951年11月4日艾登与艾奇逊在巴黎就伊朗问题举行了五次会谈。这也是就英伊争端英美双方举行的首次外长级会谈。美方参加会谈的有哈里曼和驻英大使华尔特·吉福德。美方指出,伊朗局势非常紧急,伊朗首相摩萨台已在德黑兰实行戒严。美国从遏制苏联战略角度出发,认为应该在财政上和其它方面尽量支持摩萨台,以便在伊朗保持一个稳定的政府,假如听任局势恶化下去,那是一种轻率的政策,如果让摩萨台孤立无助,伊朗可能崩溃。艾登却认为,如果摩萨台垮台,他的位置很可能由一个比较通情达理的政府来接替,从而就可能同它签订一项令人满意的协定。英方在会谈时,反复强调共产主义并不是代替摩萨台的惟一抉择。在11月14日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双方表示两国对伊朗前途的看法虽有差异,但彼此不仅愿意弥合分歧,而且愿意采取携手合作的实际步骤。会议决定,美英将通过世界银行联合解决英伊争端。

依照巴黎会谈的安排,世界银行开始其活动。世行首先挑选无利害关系的巴基斯坦作为中间人,然后在年底派遣代表团赴德黑兰。在这以前,12月28日,世界银行曾致函摩萨台,称它将避免评论英伊石油纠纷的是非曲直,仅提出临时安排,以求早日恢复伊朗的石油营业。银行将负责物色一个中立的管理委员会经营石油业务。为了通过已有的分销机构出售它的石油,银行将订立整批出口合同,利润分成三份,一份归伊朗,一份给外国的整批购买者,另一份则由银行保存作为后备金。

摩萨台在 1952 年 1 月 3 日接见了银行代表团,明确告诉代表团,银行所提出的任何建议必须纳入国有化的范围。他强调伊朗决不会同意和石油购买者分享利润。2 月 11 日,世界银行副董事长加纳亲自赴德黑兰会谈,并于 16 日提出了一些建议:总经理为非英国籍人士,其他人士应尽量为非英国籍人士;银行管理业务只限于两年;石油售价按墨西哥湾价格,伊朗只能得到 15—18%。3 月 16 日,伊朗政府和银行发表公报宣布,在几个重要问题上无法达成协议。4 月 7 日,世界银行宣布谈判“休会”。世界银行干预英伊石油纠纷的举动彻底失败。

64 “阿登纳滚回去”

1951年12月3日—8日。西德总理阿登纳访问英国，这是1931年德国总理布吕宁访英以来的又一次正式访问。

抵英后的第2天，阿登纳同丘吉尔、艾登讨论欧洲问题和德国参加欧洲防务问题。阿登纳力图促使英国积极参加欧洲统一事业。丘吉尔说英国的外交政策是保持均衡，德国比法国强大，法国极其担心德国的侵略，英国将站在法国一边，欧洲在英国的帮助下将能取得平衡。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表示，英国将站在欧洲军一边，但同它并不完全一致。丘吉尔还表示，在不以牺牲德国为代价的前提下，英国将力图同苏联达成谅解。

阿登纳到访却受到英国群众的抗议。英国和平委员会要求英国人民“以一切可用的方式”来抗议阿登纳的访问。3日，阿登纳一下飞机就看到一个不受欢迎的场面，他是在英空军宪兵的护卫下走出机场的。第二天，当阿登纳应丘吉尔的邀请到唐宁街十号英国首相官邸去吃饭的时候，大批示威者向阿登纳高呼：“阿登纳回德国去！”、“我们不再想有纳粹军队！”5日，英国政府招待阿登纳去参观牛津大学，学生们向他齐喊“滚回去！”早在阿登纳来访之前，学生们就在夜间用石灰水在墙上写了许多抗议的标语，学校当局曾特别派人洗刷，但在阿登纳走过奥里欧学院时，仍然看到有一个窗口下挂着一巨幅标语：“不许拿武器去重新武装德国！阿登纳，滚

回去！”7 日，伦敦有 30 多个退伍军人拿着“反对武装纳粹”的标语牌一直走进了阿登纳所住的旅馆。8 日，阿登纳在军警的特别警戒下离开伦敦返回了波恩。

65 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

1951年12月26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马叙伦任主任委员,吴玉章为副主任委员,胡乔木、丁西林等人为委员。

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着手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文字改革工作。1950年6月,中央教育部进行常用字的选定和汉字简化的研究。1951年毛泽东对文字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作了明确的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他还指出,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整理汉字并提出简化方案;二是研究并提出新的中国拼音文字方案。经过三年的积极准备,于1955年1月提出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经全国文字学家,各省市学校的语文教师以及部队、工会的文教工作者,约二十万人参加讨论,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中央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解决目前文字改革工作中的两个迫切

的具体问题 简化汉字和推广汉民族的共同语——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会议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确定了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的方针、步骤，并对根本改革汉字的准备工作交换了意见。

1956 年 1 月 28 日，政务院第二十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决议指出，汉字简化方案已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完毕。汉字简化方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即汉字简化第一表所列简化汉字大部分报纸杂志已经试用，应从 1956 年 2 月 1 日起，在全国印刷的和书写的文件上一律通用。除翻印古籍和有其他特殊原因以外，原来的繁体字应该在印刷物上停止使用。第二部分，即汉字简化第二表所列简化汉字二百八十五个。第三部分即汉字偏旁简化表所列简化偏旁五十四个，也都已经经过有关各方面详细讨论，认为适当，现在为慎重起见，特先行公布试用，征求意见，以便根据多数意见，再作某些必要的修正，然后正式分批推行。

66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建国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下，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经济部门中滋长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这不仅给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严重地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腐蚀了少数干部。中共中央根据同年秋季全国工农业战线开展的爱国增产运动中揭发出的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向全党指出：“必须严肃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发和惩处，并须当做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普遍地检查浪费现象。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此后，一个全国规模的“三反”运动普遍地开展起来。

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1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按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检查和揭发的高潮，“三反”运

动进入高潮。中共中央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建立了以薄一波为主任的中央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并在党政军三个系统成立了各级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连续批转了各级党委的报告,阐明了中央的方针和政策,总结并推广了各地经验,为运动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在运动中,各地揭露了一批严重的贪污盗窃案件,并先后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或公审大会,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于严重的犯罪分子,则依法严惩。对于其他贪污分子则根据罪恶轻重,分别判处徒刑,对于能够坦白并有立功表现的,宣布免除刑事处分。从1952年4月开始,“三反”运动进入核实定案处理阶段。3月,中共中央相继发出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的五项决定》;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各级地方组织,根据上述文件所规定的关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般从宽,恶劣从严”等方针和政策,对于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犯有贪污、浪费错误的人员,分别作出不同处理。但在运动高潮期间,一些地区和单位曾发生逼供信的现象,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这些问题在甄别定案时基本上得到了纠正。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结束“三反”的报告,“三反”运动宣告结束。

“三反”运动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严重斗争,这场运动的胜利,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些干部,提高了干部和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增强了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抵抗力,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尚,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建设。

67 劳模李顺达

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1915年生。原籍河南省林县,1932年逃荒到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西沟村是个山高石厚,土地瘠薄的偏僻小山沟。当时全村20户,分散住在四个沟里。全村农民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困苦生活。1942年,平顺县遭了旱灾,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当时李顺达响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组织起来,生产自救”的号召,在1943年春组织了一个六人的互助组,后来发展到16户,共分三组,李顺达被选为大队长。他积极领导农民开荒生产,使全村农民顺利度过了荒年。从此互助组在西沟村日益巩固下来。1947年以后他领导农民精耕细作、改良技术。

1950年,他向山西全省劳动模范和农民提出了开展爱国主义冬季生产竞赛。这一年他还出席了山西省工农业劳动模范大会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曾得到“模范互助组”的光荣称号,并获得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生产战线上的模范”的奖状。1951年3月6日,李顺达互助组又首先响应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关于开展全国性爱国丰产运动的号召,向全国各地互助组提出保证当年农作物丰产的挑战。他的挑战得到了全国各地劳动模范和互助组的热烈应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规模的农业战线的生产劳动竞赛。到1951年,西沟村已呈现出梯田层层,树木成片,牛羊成群,处处是新房屋的新景象。这年国庆节,李顺达作为农业劳动模范参加了北

京天安门前的国庆观礼，并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1952 年李顺达获农业部颁发的爱国生产金星奖章，后为历届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代表，曾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共第九、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83 年 7 月 1 日逝世。

68 “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虽然在新解放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斗争，在城市中开展了搜捕特务和登记反动党团分子的工作，并在部分地区进行了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工作。可是，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中国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还相当大。仅西南地区就有土匪 100 万、特务 8 万，还有一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反动党团骨干、恶霸分子以及反动会道门头子。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被推翻以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大量地存在着，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每日每时都企图在中国复辟。

早在 1950 年 3 月，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中央指出，各地必须严厉及时地镇压反革命，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但有不少干部和党委在革命胜利之后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以致把统一战线中的反对关门主义问题与在对敌斗争中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问题相混淆，把正确的严厉镇压反革命与乱打乱杀相混淆。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倾偏向，以致大批怙恶不悛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人民责备共产党“宽大无边”、“有边无法”，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人民政府什么都好，就是对坏人这样客气，看着坏人残害老百姓，不给老

百姓作主，不好。”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潜伏于中国大陆的美国、台湾蒋介石集团的特务以及国内反革命势力，自以为美国已将战火烧到中国国门，“三次大战，反攻大陆”的时机到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就要回来复辟了。他们撕下伪装悔改的面具，跳出来明目张胆地向人民进攻。他们阴谋破坏铁路、桥梁、工厂、矿山，烧毁仓库资财；有些地方，反革命分子组织了反革命地下军；有些地主以“蒋介石来了要杀头”来威胁农民，破坏土改。有些地方村干部全家被杀，为人民解放军运输军粮的民夫整队被残杀。据统计，从1950年春天到秋天的半年多时间里，就有近4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遭到反革命分子杀害，仅广西一省就达7000余人。隐藏在北京电车公司的特务分子，一次放火烧毁电车59辆。汉口等地的反革命分子制造了纵火案。美国间谍分子李安东等密谋在1950年国庆节时炮击天安门检阅台，企图谋杀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一切都说明，不开展一次全国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民主专政便不能巩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以及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无法顺利进行，人民的安定生活也没有保障。

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于1950年7月公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示指出积极地领导人民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地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及各项必要的社会改革，成为各级人民政府当前重要的任务之一。指示要求对一切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的及时的镇压，而在实行镇压和处理一切反革命案件中，必须贯彻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团结人民，孤立反革命分子。10月10日，中共中央也就此发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示。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右的偏向,按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审慎研究处理;反右的同时注意防止“左”,反对逼供信,禁止肉刑,必须注意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在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市、区党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准,其中如有特别重要分子则须报告中央批准。对外国人的处理,必须经过政务院批准。根据中央和政务院指示,从1950年12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

1951年春,在全国形成了检举、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的高潮,为指导运动健康发展,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要求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坚持党委领导,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公安机关和广大群众相结合,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持反对草率从事倾向。镇压反革命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运动的重点是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就如何处理反革命问题作了明确的全面的规定。《条例》规定,对各种反革命的首要分子,解放后继续组织和参加反革命活动的,受国内外敌人派遣潜伏活动的,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后仍然继续参加反革命活动的从严处理;对于自动向人民政府真诚自首悔过的,被反革命分子胁迫、欺骗、确非自愿的,解放后确已悔改的,特别是立功的从宽处理。使镇压反革命斗争有了法律武器。

在镇反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监督、清查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先后召开了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着重研究和处理运动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1951年5月10日至16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

议,会议通过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决议》规定从即日起,镇压反革命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精力处理积案。对于有血债或其它严重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的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程度,而又该处死者,采取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为防止运动高潮发生“左”的偏向,自1951年6月1日起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归地委专署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归省一级。对隐藏在军政机关和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开始有计划地加以清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对镇压反革命运动健康发展起了重大指导作用。这次会议后,镇压反革命运动逐步转入对已查出的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处理和在党政军机关开始清查阶段。

这场运动历时3年,到1953年上半年结束。运动中共破获了600余起特务案件,肃清200余万国民党残余武装,查清很多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很多在解放前杀害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历史反革命被抓获,如制造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血案的一批特务凶手被处决。1943年杀害中共中央委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的凶手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伏法。但是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中,一些地区曾出现草率现象,运动后期逐步加以纠正。1956年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彻底解决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遗留问题。

69 人民法院

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为国家的审判机关,统一行使国家的审判权。我国的人民法院是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总结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的司法、审判经验的基础上,为适应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需要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共同纲领》关于建立人民司法制度的规定,开始在全国建立人民法院。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第一部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统一了人民法院的组织和职权。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法院的性质、任务、组织及其活动的基本原则和制度。1979年五届人大第十二次会议和1983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先后对人民法院组织法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使各级人民法院的建设从此全面走上了法制轨道。

我国人民法院的组织体系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各类专门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省辖市(自治州、直辖市的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县、区级的基层人民法院。专门法院只在特定的区域或部门设立,包括军事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等。在各

级人民法院内部,均没有民事、刑事、执行等审判庭。中级、高级法院,近年来增设了行政审判庭、经济审判庭、申诉告诉庭,以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根据法院组织法,基层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地区、人口和案件分布情况,设立若干人民法庭,承担当地的审判工作。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我国审判机关的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审判权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各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各民族一律平等;审判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活动必须执行公开审判制度、辩护制度、回避制度、合议制度、审判委员会制度、两审终审制度、死刑复核制度和审判监督制度。

70 丁玲获斯大林科学和文艺奖

1951年丁玲以其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科学和文学艺术斯大林奖金。

丁玲，字冰之。湖南临澧人。1922年到上海入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校。1923年进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读了一年左右转赴北京，结识胡也频，并与之结为夫妇。1927年12月、1928年2月，发表的小说《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大胆地揭露旧中国黑暗现实，表现五四运动后觉醒的知识青年的痛苦与追求，反响很大。1930年5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左联”组织部长和工农文学会负责人，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第二年，“一·二八”事变后，与鲁迅、茅盾等四十余名进步作家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左联”党团书记。这期间她创作了《韦护》、《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创作实绩。1933年5月，被国民党逮捕，由于党组织的帮助，在1936年逃离南京，秘密经上海、北平、西安抵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丁玲一到保安，中央宣传部就专门开会欢迎她。毛泽东1936年写有《临江仙》一词赠与丁玲：“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51 年的故事

在陕北,她历任苏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地区文协副主任等职,创作了《彭德怀速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新的信念》、《夜》和影响很大的争论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杂文《“三八节”有感》。1942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她撰写了《田保霖》、《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二十把板斧》等十多篇报告文学。同年与陈明结婚。1945 年到晋察冀解放区主编文学杂志《长城》。

1946 年到 1948 年到农村参加土改,写了以华北地区土地改革斗争为题材的优秀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于 1948 年 9 月东北光华书店初版。1952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中国人民文学丛书”之一印行。这部小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是深刻地反映了土改中农村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显示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是一部艺术上具有创造性、有一定真实性的史诗性的作品。丁玲的这部作品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无可争议的巨大影响,而且把她的名字送上了世界文坛,这部作品也恰好是她革命生涯的里程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妇联常委、全国文联委员、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同时创作了大量散文、评论和小说,反映中国人民的新生活。1955 年和 1957 年,她先后被错误地划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迫害。1979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作协对于丁玲右派问题进行复查后作出撤销 1958 年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1951年的故事

划定的“右派分子”的结论。1984年7月,中央组织部发出为丁玲恢复名誉的通知,对“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叛徒”的错误结论作出改正,恢复丁玲的党籍和政治名誉,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晚年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兼任文化组组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等职。1986年3月4日,在北京逝世。